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文学艺术家卷

# 普希金

朱宪生编著



Puxijin

辽海出版社 ●

## 引言

如果说所谓“诗国”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产生出许多大诗人，而且还意味着诗歌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的话，那么，俄罗斯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国”。

一个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感受，恐怕很难相信俄罗斯人民和诗会有如此深厚和紧密的联系。

我在俄罗斯期间，从事俄罗斯诗歌史的学习和研究。说实在的，起初我只是在诗人们浩瀚的作品中徜徉，在汗牛充栋的学术专著中探寻，而几乎忽略了身边活生生的诗。使我大为触动的是今年2月间人民纪念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动人情景。

我且不去细说那时前苏联官方是如何隆重纪念普希金。不过，单从包括《真理报》在内的各家大报连续数天头版头条刊载长篇社论、文章和图片来看，单从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都端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来看，也可粗略知道普希金在苏联社会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要知道，这不是在纪念一位思想家或政治家，这是在纪念一位诗人。

我这里要说的是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

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也是苏联的诗人节。这一天是个大晴天，但气温也有零下20多度。一大早我就出了门，当我走出普希金广场地铁站的出站口、向左拐向坐落在高尔基大街旁的普希金广场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我从未见过的激动人心的情景：

这是一个花的世界！在被白雪装点的银色背景上，普希金的塑像被无数鲜花簇拥着，花束、花圈、花篮，五颜六色、争奇斗艳。怪不得这几天老听见人们说，买花的人排成长串，鲜花的价格看涨，一束郁金香竟卖到四五个卢布。原来，它们多半被“集中”到这里来了。

这又是一个诗的世界！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在争先恐后地给诗人献上自己的诗篇。一个人朗诵完了，另一个人马上就接上；准备好的诗朗诵完了，即兴而作的诗又涌出来了，就这样不断地朗诵下去。不管是有名的诗人也好，还是无名的诗人好，谁也不客气，谁也不谦让。

普希金的塑像耸立在人群之中，他那鬃曲的头发仿佛在微风中飘动；他那深邃的眼睛好像在注视着人们，又好像在沉思默想。和平鸽在广场上空飞舞，有的还停落在诗人的头上、肩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步履蹒跚，慢慢向诗人塑像走去，人们给她让开了道。她走到塑像前，从怀里拿出两支蜡烛，安放在塑像前，用颤抖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蜡烛，向诗人深深地弯下了腰，双唇颤抖着，像在向诗人诉说着什么。一位盛装的少女，捧着一大把鲜花走到塑像前，带着一种虔诚的神情献上了鲜花，向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隐没在人群里。还有一个高个子男青年，奋力挤到塑像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打开、摊平，轻轻地放在鲜花上。不少人俯首去看，有的还拿出笔和小本去抄。我挤上前一看，原来这是青年向诗人献上的一首诗。

我在人群中流连忘返，眼前的情景令我激动不已，思绪万千。这位生于18世纪最后一年的诗人，为什么今天仍能得到人民如此深切的爱？

---

按当时官方的比价，四五个卢布要值六七个美元。

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史和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吗？或者，仅仅是因为别林斯基所指出的他的创作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吗？除了文学上的原因以外，这之中显然还有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和民族性格等多方面的因素。

苏联人民这样热爱诗，这样热爱诗人，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不多见。当你看到人们如醉如痴地在普希金塑像前膜拜时，请不要忘记平日里人们在图书馆里，在公园中，在电车和地铁上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情景；请不要忘记这个国家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几大架子书；请不要忘记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包括党政军各级官员在内，无一不是被普希金开创的俄罗斯文学和诗歌所熏陶出来的；请不要忘记这个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远远高出其他的国家。当我们在街头看见人们彬彬有礼、互相谦让；当我们看到小汽车常常停下来，给老人和孩子们让路；当我们在胡同里迷失了方向，总会有陌生人主动给我们带路；当我们在树林里散步，常常会遇到陌生的青年或妇女，把你当成朋友一样向你诉说他们家中发生的事情。当你经历了这一切，你就会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这样热爱诗歌，热爱这文学王国的骄子，热爱自己的诗人，热爱普希金……

## 总 序

郭锴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普希金

## 第一章 世纪的嘱托

这是一个辽阔的国度，幅员广大，横跨欧亚。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森林茂密，平原宽广。这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比起我们古老的炎黄子孙，它还只能算一个小弟弟；但在美洲的一些民族面前，它又是一个兄长。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年轻的时候，便处在异族人的铁蹄之下；它成年的时候，又被野蛮的农奴制度所困扰。

深重的苦难磨炼了俄罗斯民族，美丽的大自然陶冶了俄罗斯民族，她既能忍辱负重，又真诚而开朗；既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又目光远大、热情奔放；较之于法兰西民族，她要显得更为稳重和沉着；较之于日耳曼民族，她又显得更为谦逊和热情；而较之于不列颠民族，她似乎更富于灵气和活力。她好像介于东西方民族之间，兼容东西方民族的特点。

她和我们中华民族一样，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语言在劳动中生就，在斗争中成长；深沉的民族性格滋润着它，美丽的大自然哺育着它。一位诗人曾这样描述它：

我们的语言华美辉煌，其中  
有河流的辽阔和草原的苍茫，  
有雄鹰的啼鸣和狼群的嚎叫，  
有朝圣的歌曲、钟声和烟香。

——巴尔蒙特

马克思曾这样感叹：“俄语是多么的美，它有德语的一切优点，然而没有德语可怕的粗鲁。……俄语是最有力和最丰富的活生生的语言之一。”按理说来，这个国家就其民族的生命历程和拥有的语言潜在能量而言，本应能出现文化巨人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封建农奴制度使得俄罗斯长期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欧隔绝，这就导致了俄罗斯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从文学上说，除了一部俄罗斯古代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可以进入欧洲中古文学之林之外，在19世纪之前，她确实还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人物和作品。

自然，后来一些俄罗斯文学史学者也按照欧洲文学的发展模式，为俄罗斯诗歌“规划”出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如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之类，但这些“发展阶段”不但在历史进程上与欧洲不符，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倒是青年别林斯基说了句实话，当他以一个批评家的深刻的洞察力回顾和考察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时，断然指出：我们没有文学。

自然，别林斯基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具有俄罗斯民族精神、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

这样说并非把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视为一片空白，而是说到19世纪以前，俄罗斯还没有出现一位这样的文学巨人，其意义相当于但丁之于意大利，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莫里哀之于法兰西，歌德之于德意志，乃至荷马之于古希腊。

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比如说，罗蒙诺索夫（1711—1765）和杰尔查文（1743—1816）两位作家，他们在18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把他们放到同一个时期的欧洲文学中，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能体现出什么样的俄罗斯的精神呢？除了他们的作品是用俄语（并且还不是后来被公认的成熟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写就的这一点之外，他们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法国古典主义是多么地雷同，且不说在艺术成就上远不及后者，仅从内容上说，它们几乎把欧洲古典主义的思想锋芒消磨殆尽。再比如说卡拉姆辛（1766—1826）和茹科夫斯基（1783—1852）这两位作家，他们在18世纪末乃至19世纪初，在文学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可是，在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登上文坛后，他们立刻被他的光芒所掩盖，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是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便是在这位“后来者”面前公开认输。

1799年5月26日，在莫斯科涅麦茨卡亚街（现改名为巴乌曼大街）的一座平常的房子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这就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时间本身也许就包含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者说颇有些诗意。这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渴求产生文学巨匠的俄罗斯仿佛憋足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力量催生了普希金，或者说，在这个世纪之末，普希金是带着整个18世纪的嘱托跨入19世纪的。俄罗斯太需要她的文学巨人了，她已做了几个世纪的准备。而在18世纪，在她的怀抱里已出现了一些先兆，她已感受到缪斯那频频投来的目光。她带着激动和喜悦注视着这个皮肤黝黑、双眼明亮的孩子。要知道，这个孩子的降临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吉祥的兆头。事实上，在普希金出生后不到30个年头的的时间里，在俄罗斯诞生了多少文学大师：1803年——丘特切夫；1809年——柯尔卓夫和果戈理；1811年——别林斯基；1812年——赫尔岑和冈察洛夫；1814年——莱蒙托夫；1818年——屠格涅夫；1821年——涅克拉索夫；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2年——费特；1823年——奥斯特洛夫斯基；182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

而5月26日对俄罗斯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普希金的诞辰日，同时又是普希金的作品的最深刻的理解者和评论者别林斯基（1811—1848）的忌日。命运和缪斯就是这样把这两位对俄罗斯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联系在一起。

这个孩子——未来诗人的姓名是纯俄罗斯的，然而他的皮肤、眼睛以及那厚厚的嘴唇却又透露出另一种信息，他身上似乎有别一种血缘，让我们由近及远看一看他的列祖列宗。

从他的父名来看，他的父亲应该叫谢尔盖·普希金。1786年夏天，近卫军青年军官谢尔盖·普希金在彼得堡结识了他的一个远房表妹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汉尼拔，俩人一见钟情。这位少女有一种独特的美，微黑的皮肤，略长的眼睛，鹰一般的侧影，这样的面貌和身姿在一般俄罗斯少女中是很出众的。人们送她一个“美丽的混血儿”的绰号，而她自己一点儿也不忌讳这一点。其实，她的姓氏就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非俄罗斯国有的外来的姓氏——汉尼拔，这个姓氏在人类的古代社会早已如雷贯耳，那位曾经征服过罗马的迦太基人的统帅便是这个姓氏。纳杰

日达·奥西波芙娜的祖父是阿比西尼亚黑人，这样，在她身上就有四分之一的非洲人血统，推算下来，普希金身上则有八分之一的非洲人血统。

阿比西尼亚人是怎样来到俄罗斯的呢？这还要从彼得大帝时期说起。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祖父原名叫依勃拉吉姆，本是阿比西尼亚一个小王子的公子。在他出生不久，阿比西尼亚遭到土耳其人的入侵，他便作为人质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此间，恰逢彼得大帝派人到土耳其，物色几个聪明伶俐的黑人小孩作为宫廷侍从，年仅 8 岁的依勃拉吉姆又被带到了俄国。依勃拉吉姆到俄国后改名为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此后他的生活充满戏剧性，由于他才智超群，被彼得大帝看中，此后他官运亨通，从皇帝的贴身侍从到私人秘书，以准将职衔升任为俄国工程师总长。虽说他在婚姻上出现一些纠葛，但这对他的仕途却无太大影响。在彼得皇帝去世后，他又受到伊丽莎白女皇的恩宠，1746 年，女皇封给他一大片领地，即包括后来为人熟知的著名的“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在内的位于普斯科夫省奥波切茨县的庄园，同时他还获得 500 名农奴。1781 年，汉尼拔以 84 岁的高龄去世，此后他的后代就世居在这块领地上。

老汉尼拔留下 11 个子女，虽说他的后代显然没有他那样光耀的历史，但至少有两人也功名不俗。一是长子伊凡·汉尼拔；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即普希金亲外祖父奥普西·汉尼拔，虽说他的业绩要远逊于他的兄长，但他却因他的亲外孙普希金而扬名史册。

普希金的父系的家族史也值得一书。这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家族，其远祖曾有过英雄业绩，但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它长期未进入上层贵族的行列。直到 18 世纪中叶，即这个家族发展到诗人的祖父这一辈分上，才在政治上获得一些声望。到普希金父亲这一辈人上，这个一贯在军界或政界中为官的家族，第一次转向了艺术。普希金的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在当年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与当时的一些有名的文学家都有密切的交往。而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一直热爱诗歌艺术，到晚年都还写诗。虽说他们在文学上都未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但他们热衷于缪斯的气质和他们营造的生活氛围多少也会给后代一定的影响。

小普希金就诞生于这样一个家庭。在他身上流淌着俄罗斯艺术家的血液，而在这血液中，又有非洲冒险家的因子。如果说东西文化板块的碰撞会孕育出新的文化的火星，那么，南北血缘的交融会不会产生奇迹呢？

此刻，初临人世的未来诗人躺在摇篮里，他嗷嗷待哺，是谁要用乳汁来养育这个天才呢？缪斯选择谁来看护这个诗歌的宠儿呢？



## 第二章 “我怎能把我的好奶妈忘在一边”

普希金出世之时，正逢暴君保罗一世的恐怖统治面临崩溃之际。关于这个暴君，普希金后来写道：“我一生见过三个皇帝，第一位是保罗一世，他命令保姆给我摘下帽子，他不能训斥我，却把保姆训斥了一通。”据说，在保罗一世在位时，他所到之处，人们都要向他鞠躬敬礼，连当年刚满一岁的小普希金，也不能例外。其暴虐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801年，保罗一世被刺，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上台，采取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了书刊检查，特别是放松了对外国书刊进入俄罗斯的检查，开办了一些新的高等学校。自然，这些措施是表面化的，但文学却“乘隙而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大量涌入的欧洲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一走进19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复兴”。

普希金童年可以说是在充满着诗歌和文学的氛围中度过的。在社会上，是一片“复兴”的景象，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如茹科夫斯基、巴丘希科夫、维亚泽姆斯基等，克雷洛夫又开始发表作品，文学杂志也不断出现。

和许多俄罗斯的贵族之家一样，普希金的家庭也弥漫着浓重的文化气氛。父亲谢尔盖·普希金爱好文学，尤其崇尚法国文学，对莫里哀还颇有研究。他精通诗歌和戏剧，甚至能出口成章，是一个写“即兴诗”能手。但在普希金的亲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要算他的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如果说普希金的父亲还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顶多是一个业余高手，那么他的伯父的一只脚可以说已跨进了职业诗人的行列。他关心侄儿的成长，教他写诗，用普希金自己的话说，伯父是他的“诗父”。

瓦西里·普希金研究过各种诗歌的体裁，作为抒情诗人，他的才赋并不算很高，但他的语言却很规范，这一点甚至得到当时的大诗人茹科夫斯基的赞赏。此外，他的长处在于那种“写实”的风格，在于那种语言的明白、准确和流畅，这些特点在当时以抒情为时髦的“前浪漫主义”时期，显然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但对初学者来说却十分必要。也许是受到伯父的这种特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是普希金的本身的个性一开始就十分顽强，未来的诗人在开始学诗时，尽管他曾努力地学习过茹科夫斯基的格调，但他始终和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格格不入。

普希金家庭的文学氛围还表现在频繁的文学沙龙上。由于父辈们都热爱文学，一些文学家和诗人常常光顾他家的客厅，当大人们在高谈阔论时，小普希金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倾听着。据普希金的父亲回忆，一次，当时的大作家卡拉姆辛来访，与他聊了很久。而此时，小普希金认真地听着卡拉姆辛的谈话，两眼直盯着他。

除了喜欢听大人們的谈话以外，小普希金也特别喜欢他父亲的书房，在那里他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法国文学作品。虽说有些书他似懂非懂，但也读得津津有味，就是伏尔泰的著作，他也照读不误。后来，在一首诗里，普希金这样谈到了他童年对伏尔泰的印象：

---

茹科夫斯基（1783—1852）、巴丘希科夫（1787—1855）、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和克雷洛夫（1769—1844）均系俄国诗人和作家。

在很久以前，  
在我那无知的童年，  
有一个秃头老汉，  
他嘴唇微闭，目光闪闪，  
微笑时就皱纹满面。

据普希金的弟弟列夫回忆，他的哥哥在 11 岁时，就记住了全部法国文学作品。

普希金一诞生到人世，就赶上了一个对文学家的成长来说是最好的时机，普希金真可以说是“生得逢时”。他沐浴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文学之光，感受着父辈们营造的诗歌的氛围，徜徉于书的海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天才会得到蓬勃的发展，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改变他的志向，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肯定能够成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他肯定要远远地超过他的父辈，甚至有可能成为卡拉姆辛或茹科夫斯基那样的作家。至于他能否有更远大前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因为滋养这颗天才的种子的土壤虽说也算丰富，但总有些先天的不足，或者说它先天缺“钙”，而没有这种“钙”，任何再优良的品种，也不会长成参天大树。这“钙”就是——人民的情感和精神。

俄罗斯贵族社会是建立在人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和农奴的血汗上面的，俄罗斯贵族地主的残酷和奢华并不亚于其他的国度。他们居住在城市，靠从农奴身上榨取得来的资财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在 19 世纪初期，贵族社会中弥漫着模仿西欧、追求享乐之风，几乎在每一个贵族之家，都有外籍家庭教师特别是法国家庭教师，谁家要是没有法国教师，那简直是一种耻辱。当时只要是法国人，不论有无文化素养，哪怕是巴黎来的仆人，在莫斯科也会被名门望族争相聘请。据说，当时莫斯科的一家报刊上，曾登载过一则这样的求职启事：“一位德籍的养狗员欲求本职或充任家庭教师。”

此外，在每个贵族家庭里，都少不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少女们讲法语远比讲俄语流利，小伙子能纯熟地背诵法国诗人的诗句，却不会用俄语写一张便条。与此同时，这些家庭都规模巨大、成员众多、奴仆成群，有的大户人家要养活两三千人之多。据说，当时在一位伯爵的饭桌上，竟有半数客人是陌生人。在欧洲，斯拉夫人素以好客和慷慨著称，这话看来并无多少虚假。

普希金的家庭也难越这一樊篱。普希金的父母热衷于社交，把教育子女的工作交给家庭教师，把抚育他们的事情则交给保姆。再加上小普希金长得呆头呆脑，不讨母亲的欢喜，因此在家庭里备受冷遇。

在今天看来，普希金的幸运不仅在于他“生得逢时”，也在于他在儿时遇上了一个好奶妈，这个来自生活底层的俄罗斯妇女，生性快活，感情纯朴善良，阅历丰厚，并且她还富于艺术家的气质和才华。她语言丰富、生动，满脑子都是民间传说和故事，她在用乳汁和肉汤哺育小普

---

伏尔泰（1649—1778）、卢梭（1671—1741）和孟德斯鸠（1689—1755）都是 18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

希金的时候，也在不知不觉地用民间文学的养料浇灌着未来诗人的心田。

奶妈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是一个农奴的女儿，她刚满一岁的时候就成为那个“阿比西尼亚黑人”汉尼拔的奴隶，此后就作为这个家庭的“私有财产”遗传到普希金的母亲的手下，成为这个家族第三代人的奶妈。

每当小普希金被母亲训斥得无所适从时，奶妈就会悄悄地把她领走。常常，在奶妈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光线昏暗的卧室里，小普希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留雪白胡子的魔术师，有身材如胡蜂一般的王子，有脚登软底鞋、身挎弯刀、高衣领上绣有花边的游侠骑士，有奇形怪状、行走如飞的各种妖精，有身披黑袍、口中念念有词的巫婆，有灯火通明的宫殿，有幽暗恐怖的古堡……奶妈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用生动的语言讲述着，孩子用纯朴的心灵感受着，他的想象力随着奶妈声调的起落而飞翔，他的理解力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中悄悄增长。

普希金后来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所留下的印象时，写下过这样几句话：“我记忆中最早的事件和人物是：尤索波夫家的花园；地震；奶妈……”可见奶妈在他童年生活中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另外，他记住的惟一的地方，也是他常同奶妈一起散步的那座尤索波夫家的花园。至于地震，指的是他三岁多的时候莫斯科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小普希金在慢慢地长大，也变得越来越调皮了。他的家庭教师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有的是主动辞职，有的则是胜任不了这个调皮的但聪明绝顶的孩子的教育。普希金10岁时，父母不让他留在奶妈身边，而把他交给他们的贴身男仆尼基塔·克兹洛夫照料。这个满脸胡须的庄稼汉，带着普希金到处游玩，从伊凡大帝的钟楼到市民居住的小街小巷，从宫廷仪仗队表演的教堂一直到民间艺人演出的广场，整个莫斯科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样的生活给普希金的成长带来不少益处，而最大的益处就是使他接触了人民的生活和语言。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长久，父母打算把普希金送进学校读书。1811年，沙皇下诏要在彼得堡建立一所皇村中学（现为“普希金城”），按照沙皇的规定，这所学校主要招收“将要担负重任的年轻人，这些人要从大户里选拔”。普希金的父亲和伯父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让12岁的普希金进了这所学校。1811年9月22日，沙皇亚历山大批准了皇村中学首届学员名单，名单中一共有30人，普希金的名字列在其中。10月13日，普希金正式入学，一位学监把普希金领到一间宿舍门前，门上写着：“14号，亚历山大·普希金。”

### 第三章 “十月十九日”

1811年10月19日，皇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普希金正式成为了这所贵族学校的学生，而这个日子也被他铭记在心中。

开学典礼举行得十分隆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出席了开学典礼。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点到普希金的名字时，只见一个“活泼、鬈发、眼睛机灵的男孩”从一群学童中走了出来。这是亚历山大一世第一次看到普希金。

普希金进入皇村中学的第二年，俄罗斯取得了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是普希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普希金和皇村中学的学生们一道，欢送过开往前线的部队，也为拿破仑火烧莫斯科城惊恐不已，更为俄罗斯的胜利而热泪盈眶。当俄罗斯一批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贵族军官随着俄国大军越过蓝色的多瑙河进入巴黎时，他们在欢呼胜利的同时，也看到了眼前呈现出的一派他们不曾见过的景象，那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繁荣。后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面对满目疮痍的俄罗斯，他们的胜利的喜悦顿时化为乌有，而代之以一种忧愤和悲哀，这忧愤和悲哀中潜藏着某种反抗的火花，它在迅速地生长、蔓延。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这也是少年普希金和他的伙伴们当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时代气氛。

皇村中学，它却是当时最先进的学校之一。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人民情绪高昂，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与此同时，西欧的进步思潮也大量涌入。而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特别是转战欧洲、亲眼看见和亲身感受到欧洲文明的一批青年贵族军官，便很自然地成为进步思潮的传播者。在皇村中学，普希金接受了进步教师所传播的先进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

在学校的进步教师当中，对普希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是库尼金和加里奇。普希金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多次写到他们。

库尼金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副教授，他同时还教授道德、自然法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在皇村中学开学典礼上，他曾以一席热情洋溢的讲演，赢得一片掌声。当着沙皇和各级官员的面。他只字不提皇帝陛下，而是号召同学们热爱祖国，去争取荣誉。这丝毫没有官方的陈规俗套的讲话，给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学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普希金后来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心，美酒，  
献给库尼金，  
他培育了我们，  
他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种！

由于库尼金在课堂上宣讲自由思想，抨击农奴制，遭到校方的迫害，最后他被迫辞职。这引起普希金的愤慨，他给1822年皇村中学的学监写了一封诗体信：

你为所欲为，指鹿为马，  
说讽刺就等于诬陷，

说讲理同煽动是一家，  
说作诗是恶习，说库尼金就是马拉！

加里奇也是普希金热爱的老师之一，他教授拉丁文和俄文。加里奇崇尚德国哲学家康德和谢林，对哲学和美学都颇有研究，写过两本著作：《哲学体系史稿》和《美学试论》。他心地善良，平易近人，和学生的关系是朋友式的。他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组织文学朗诵会，鼓励普希金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由于他的著作被人指控宣传无神论，他后来被校方除名，最后在贫困中死去。

同时，普希金还结识了驻扎在皇村学校附近的一些军官，其中对普希金影响最大的是察尔达耶夫（1794—1856），普希金后来为他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抒情诗《致察尔达耶夫》（1818）。据普希金一位同时代人的看法，察尔达耶夫在政治上对普希金的影响甚至要比整个皇村中学期间他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

皇村学校也是少年普希金的诗歌摇篮。他和他的同学们一道开始写诗，而流传在学校中的手抄刊物便是他们诗作的园地。在皇村中学，普希金的诗才日益蓬勃地显露和发展着，很快地从一大批学生诗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最有才华的诗人。1914年，在第一首正式发表的诗作《致诗友》中，15岁的普希金就认定写诗是他终身的事业：

我一旦作出决定，就不再变心，  
要知道，我是命中注定，才选择了竖琴。  
就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好了——  
生气也好，谩骂也好，反正我是诗人。

1815年1月8日，学校举行升级公开考试，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杰尔查文也应邀前来。关于这次考试，普希金后来有过详尽的描述：“我一生只见过杰尔查文一面，但我终生难忘。……杰尔查文显得老态龙钟，他身穿军服，足登软底鞋。考核工作使他显得十分疲劳。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头，满脸皱纹，看不出是什么表情。他目光迷离，嘴唇下垂。他那张身穿睡衣、头戴便帽的正面画像和他本人十分相像。他坐在那里打瞌睡，直到俄国文学答辩开始。这时，他醒了，两眼放光，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然，我们是在朗读他的诗作，然后进行分析，并加以赞扬。他十分仔细地听着，后来，轮到我了，我站在离杰尔查文两步远的地方朗读我的《皇村的回忆》……”

沉郁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微睡的天穹……

刚读几句，也许是那洪亮的声音打动了杰尔查文，他抬起了头，注视着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是一个皮肤深黑、鬈发蓬乱的小家伙。诗歌是用“杰尔查文体”写成的，这是当时流行的颂诗体。他听下去，小诗人正在描写皇村花园，就诗的格调来看，他觉得有点熟悉，那正是他

---

马拉（1743—1793），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时期的革命家和学者。

自己的风格。可听着听着，他似乎又觉得这诗有点异样，这诗中有一种谐和感，舒适感，与他的诗的庄严感、高贵感不太一样，但得承认这诗中有一种动人的力量，杰尔查文的脑袋禁不住随着诗的节奏摇晃起来：

杰尔查文……在铿锵的竖琴上，  
曾经歌唱过这些英雄。

当杰尔查文听到小诗人提到他的名字，一下子便兴奋起来，眼睛里闪出光芒。小诗人把他带进了一场战争，一场在不久以前才结束的战争：

在俄罗斯的广阔的原野，  
像急流，驰过了敌人的铁骑。  
幽暗的草原躺在深沉的梦里，  
土地上缭绕着血腥的热气……  
……  
敌人冲撞着——毫无阻拦，  
一切都被破坏，化为灰烬……

杰尔查文的心紧缩起来，他的脑海中出现小诗人描绘的那幅悲惨的情景，还没有哪个诗人的诗句这样深深地打动过他。他自己曾描绘过战争，颂扬过沙皇的战功，但他笔下的战场却没有这样扑面而来的火焰和热浪。这时，诗的调子骤然一变：

战栗吧，异国的铁骑！  
俄罗斯的子孙开始行进。  
无论老少，都奋起迎击强敌，  
复仇的火点燃了他们的心。  
战栗吧，暴君！你的末日已近，  
你将会看见，每一个士兵都是英雄。  
他们不是取得胜利，就是战死沙场，  
为了俄罗斯，为了庙堂的神圣。

以下杰尔查文听到小诗人在歌颂人民的战士，歌颂古老而伟大的莫斯科，甚至还听到了沙皇亚历山大的名字。此时他又开摇头晃脑起来，他感到他面前的小诗人又回到他的风格上来了。听，小家伙又提到我了：

啊，俄罗斯灵感的歌手，  
你歌唱过浩荡的大军，

和杰尔维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致普希金和杰尔维格》一诗中，他称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为“三结盟”，抒写了他对友谊的珍惜和依恋之情：

---

歌颂沙皇亚历山大的诗行后来删去。  
此处指杰尔查文。

我跟你们在一起就会充满遐想，  
就会沉迷在破碎的混乱的梦幻，  
就会把那孤独的生活抛得远远，

……

有你们在，我的热血就会冷静。  
在祖国，我将会暂时忘记  
忧虑、哀愁、寂寞和激动，  
也许啊，我还会忘记爱情！

丘赫尔别凯从皇村中学毕业后，便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活跃在文坛上。他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充实的内容，提倡抒写“高尚和重大的”主题。丘赫尔别凯后来成为了十二月党人。

安东·安东诺维奇·杰尔维格（1798—1831）是与普希金最要好的诗人，他对普希金的诗才非常尊崇。1815年，他在《致普希金》一诗中表达了他对普希金的敬意和赞赏。普希金也一直对杰尔维格满怀深情，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那首著名的《十月十九日》中，有一段是专门献给杰尔维格的：

当命运的震怒对我肆虐不休，  
仿佛无家的孤儿，举目无亲，  
在风暴里我低垂着疲惫的头，  
我等待着你，侍奉诗神的人，请在友人的围聚中，以一颗  
火热的心再弹起你的金琴！  
请再以你和谐的声音把英雄们弹唱，  
你高贵的琴弦会在人心里拨出火焰，  
年轻的战士听着你战斗的颂歌，  
他们的心就会不住地沸腾、抖颤。

当普希金读完最后一行，老杰尔查文已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老泪纵横，晃动着双手，想拥抱和亲吻普希金，可又高兴又害羞的普希金早已跑到花园里去了。杰尔查文感叹：“我不会死，这就是要接替我杰尔查文的人。”

《皇村的回忆》揭开了普希金公民诗的序幕。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颂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是普希金抒情诗中最具“古典主义”的作品。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公民，小诗人的眼中似乎只有俄罗斯子孙的浴血奋战，只有莫斯科的大火，只有拿破仑的“异国的铁骑”的战栗和俄罗斯人民的骄傲。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情感压倒了一切，尚未涉世的少年诗人在回忆人民的光荣历史时，甚至都没有提起过他们的被焚烧的破旧茅屋。诗作所采用的形式也是上一辈诗人常用的颂诗体，虽说其中有些写法也别开生面，但从总体上说仍没有脱尽模仿的痕迹。

在皇村中学里，与普希金同时开始写诗的还有不少人，其中有两位是最出色的，那就是丘赫尔别凯和杰尔维格。

威廉·卡尔洛维奇·丘赫尔别凯（1797—1846）学习成绩优良，博学多识，普希金对他十分敬重，称他为“一部活字典和一个令人鼓舞的评论家”。在皇村中学，丘赫尔别凯与普希金

而你就来了，哦，我的杰尔维格！  
闲适的灵感之子啊，你的声音，  
燃起我久已沉睡的心灵之火，  
你使我又兴奋地颂扬命运。

杰尔维格毕业后，在任公职的同时，从事文学活动，曾编辑出版《北方之花》和《文学报》，并与十二月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杰尔维格于1831年病故，他的死给普希金带来巨大的悲痛。

在皇村中学里，与普希金最亲近的还有普希钦（1798—1859）。他们的宿舍紧挨着，晚上熄灯以后，他们经常脸贴着隔墙板，悄声交谈。普希金后来被囚禁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时，普希钦曾专程去看望过他。普希钦后来成为一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普希金为他写了一首十分动情的诗《致普希钦》：

我最要好的最珍贵的挚友，  
当我这孤独寂寞的庭院里  
堆满了悲凉凄清的白雪，  
想起了你马车的铃声时，  
我感谢命运赐与我的喜悦。  
我虔诚乞求神圣的上帝：  
但愿我的声音能给与  
你的心灵以同样的慰藉，  
但愿它用皇村中学明丽的日子  
照亮你阴郁幽暗的牢狱！

在普希金的心中，在他的同学和诗友的心中，皇村中学，10月19日是神圣的，它象征着青春和激情，象征着友谊和理想，象征着诗歌和灵感，不单是普希金常常抒写这个神圣的日子，其他人也常常咏叹这个日子，在普希金逝世后的1838年，身陷监狱的丘赫尔别凯满怀悲伤，写了一首诗：

我所深爱的诗人，躺进了无底的新坟……  
今天又是皇村中学神圣的日子，  
然而在你们中间却不见了普希金。  
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诗句，  
你们的胸膛也没有因它而战栗，  
他没有同你们干一杯祝贺的酒：  
他已向天外的朋友腾空飞去——  
他如今已同我们的杰尔维格一起宴饮，  
……  
我的心在怀念着他们，怀念着他们，



我急切地将两手向他们伸去……

这首动情的诗的题名也是神圣的“十月十九日”。

## 第四章 自由的颂歌

1817年6月，普希金从皇村中学毕业。在第一届毕业生中，普希金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名列第19。根据当时俄国的行政等级，他只能得到中等秘书的头衔，这是一种文官头衔，相当于陆军或海军中尉。他和同学丘赫尔别凯、普希钦等一道，分配到外交部供职。

普希金到外交部后，无意于仕途的腾达，只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常常沉醉于各种舞会和宴饮，一时间简直落得个“荒唐少年”的称号。不过，他很快从这上流社会的泥潭挣脱出来，反省自己的放纵行为和过失，这在他后来写的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惟一没有中断的便是诗歌创作。离开皇村中学时，他曾对自己的创作作过一番整理和回顾。中学期间，他一共写了120多首诗，他从其中精选了36首，编成一部诗集，在封面上他用遒劲的字体写下：《亚历山大·普希金诗集，1817年》。

随着他踏进社会的门槛，面对着日益黑暗的社会现实，经历了短暂的“沉沦”，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开始成熟起来，他的天才迅速地成长着，很快地脱去了古典气味。其实，早在1815年写作的《致利金尼》一诗中，他就开始告别《皇村的回忆》中的古典情感而转向现实。普希金以古罗马灭亡的历史，来影射当时的俄罗斯：

噢，罗马，荒淫与邪恶的骄傲的国度！

末日就要来了，带来惩罚和报复。

……

“罗马生于自由，而奴役把它毁掉。”

诗人还这样写道：

我有一颗罗马人的心，自由在胸中滚沸，

伟大民族的精神没有在这里沉睡。

这已不是一种隐喻，而是一种大胆的表白，一种坚定的誓言，透露出诗人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新的严峻的公民意识。无怪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普希金的第一首公民诗。

1817年写作的著名的《自由颂》是诗人抒情诗中的重要作品之一，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政治抒情诗”。诗一开头以非同凡响的气势，向诗人向诗歌提出了新的使命：

来吧，请摘下我的桂冠，

打碎这娇弱的七弦琴——

我要向全世界歌唱自由，

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

普希金这里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那就是为了消除“人民苦难的阴影”，必须使“强大的法律”与“神圣的自由”相结合。他用历史上有名的暴

君路易十六和保罗一世都先后遭到惨死作为例子，来警告当今的君王，并呼吁他们服从法律：

君王们！不是自然，是法律  
把王冠和王位给了你们，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永恒的法律却高于你们。

自然，普希金在这里提出的纲领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纲领，但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使沙皇专制政权感到害怕的，是下面的诗句：

战栗吧！世间的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这样的诗在当年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它以手抄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它也是沙皇政权要流放普希金的主要“罪名”。这首诗在 1856 年首次正式发表于国外，而在俄罗斯则到 1905 年才得以发表。

1818 年，普希金创作了《致察尔达耶夫》，这也是他另一首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诗中，普希金提出了消灭专制制度：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酷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等候着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在等候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心灵的美好激情，  
都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政权的废墟上，  
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

这一首赠诗所表达的并非个人的情感，而是一代革命青年的共同心声。

普希金写过为数不少的赠诗，它们多半是表达个人的感情，或者是怀念友谊，或者是表示爱慕，或者是颂扬德行。其中，抒情主人公几乎都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我”出现。自然，“我”所表达的情感也许是典型的带普遍意义的，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的，普希金有不少的赠诗（以及其他的抒情诗）都是这样的。但也有少数作品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一般说来，这其中便显示出作品思想意义的大小和艺术水平的高低了。在《致察尔达耶夫》这首赠诗中，抒情主人公自始至终都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出现，而且表达的感情又是一代青年所熟悉的所拥有的，是他们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或者说是他们无法用如此形象、准确、有力而又深情的语言说出来的。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普希金奏出了时代的主旋律。仅凭这一点，这首诗就是不朽的。更何况诗中形象是这样的鲜明，比喻是这样的贴切，语言是这样的具有感染力，感情是这样的自然。没有夸张，没有虚饰，没有半点高谈阔论，也没有丝毫哗众取宠之心，一切都是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实实在在，那么确定无疑。对即将逝去的青春的追忆之中包含有某种惋惜，但还谈不上是忏悔，谁又能够保证在青春年华不留下一点遗憾？何况这些都“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过去了。重要的是眼前，是现在，是报效祖国，是去争取自由，愿望之强烈，心情之急迫，“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候那真诚的约会”，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跃然纸上。而正因为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献身，祖国未来的天空中必将升起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专制制度”必将被埋葬，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历史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代革命青年要追求的“荣誉”。这首充满激情、富于感召力的抒情诗问世后，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中的一些诗句和词语，如“迷人的幸福的星辰”、“专制制度的废墟”等，便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语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自由和解放的代名词。这首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范例，年仅19岁的普希金能够创作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既取决于他进步的民主思想，也不能不是他卓越的诗才所致。

1919年，普希金创作了另一首有名的诗作《乡村》，在这首诗中，诗人转向了另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即农奴制问题。但作品不是一开始就直奔主题的，它的前半部分极富于牧歌情调：

祝福你，荒远僻野的一角，  
闲适，工作和寄兴的所在，  
是在这里，我的日子悄悄流去了，  
沉湎于快乐和遗忘的襟怀。

……

我是你的：我爱这一座花园，  
幽深，清凉，各样的野花开遍，  
我爱这广阔的绿野，洋溢着禾堆的清香，  
一些明澈的小溪在树丛里潺潺喧响，  
无论放眼哪里，我都会看见生动的画面，

……

啊，到处是劳作和富裕的景象。

诗人在这里描绘的田园风光是充满诗意的，这种视角也十分符合诗人的身份，大自然美丽宁静；“成群的牛羊”，“旋转着的风车”和“谷场冒着的青烟”，勾画出一幅乡村“劳作和富裕的景象”。一方面，诗人的描绘和感受是真实和自然的，而且，这种描绘和感受也感染着读者，唤起读者某种美妙的和美好的期望；另一方面，诗人的描绘和感受又是一种衬托，一种伏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假相”，随着诗人笔触的深入，出现了与前面的景象极不协调的画面：

这里有野蛮的地主，  
一不守法，二无感情，仿佛命中注定  
他们该是人们的灾星，  
对于眼泪和哀求一概不顾，  
只顾用强制的鞭子掠夺  
农民的财产、劳力和时间。  
这里的奴隶听从无情的老爷的皮鞭，  
伛偻在别人的犁上，被牵着绳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残喘。  
这里，一切人毕生是负着重轭的马牛，  
没有希望，谈不到一点心灵的追求，  
就是青春少女的娇艳  
也只供恶棍无情的摧残。

……

这幅“愚昧的令人心痛的情景”才是这块土地上的“真相”，才是诗人要着意描绘的，才是诗人要特别加以强调的。随着诗人的笔触的推进，田园风光顿时失色，牧歌情调也消失殆尽，一种沉重感、压迫感油然而生，而后又代之以疾声的呼吁、抗议和深深的思索。在普希金以前的任何诗人，不论是罗蒙诺索夫还是杰尔查文，既由于思想方面的原因，也由于艺术视野和艺术才华方面的原因，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许茹科夫斯基能写出《乡村》前半部那样的富于牧歌情调的作品来（还未必有普希金的明朗），但他断然写不出下半部富于公民情感的诗行的，这无疑是由诗人的思想高度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处在社会革命前夜的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主精神的公民，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一首风景诗或自然诗写成一首公民诗。

## 第五章 南方

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他写的一些影射沙皇及其宠臣的讽刺短诗，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820年4月，有人向当局写了政治告密信，告发普希金。

不久，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接到命令，要搜查普希金的住处并将他逮捕。但这个总督和茹科夫斯基关系较好，决定暂时不逮捕普希金，而先进行调查，掌握证据。

4月中旬，一个秘密警察来到普希金的家里，找到普希金的仆人尼基塔，愿出50个卢布价钱，要他提供主人的手稿。但遭到尼基塔的拒绝。当天晚上，普希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销毁了所有的手稿。

第二天一早，普希金接到警察局的传票，命令他去见总督米洛拉多维奇。

普希金的朋友、诗人格林卡建议他主动去见总督，他说，您马上去见米洛拉多维奇，别担心，他虽不是诗人，但他有些骑士风度和浪漫情调。他不会滥用您对他的信任。

诗人便去了总督的家。格林卡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次会见：“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以后，我也来到米洛拉多维奇的官邸。我刚一迈进书房的门槛，身裹贵重披巾、躺在自己绿色长沙发上的米洛拉多维奇便冲着我大声嚷道：‘你知道，我的宝贝！普希金刚刚来过我这儿！要知道，我受命逮捕他，拿走他的全部作品。但是，我认为把他请到舍下，从他本人手中把作品要过来，显得更客气一些。这不，他就来了，容光焕发，心情非常安宁，而当我问到作品时，他回答说：‘伯爵，我的诗作统统付之一炬了！我的住所里什么也找不到啦；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用手指点一点自己的脑门儿）。吩咐拿几张纸来，我把我过去写过的统统写下来，并且作出记号，指出哪一篇是我的，哪一篇是用我的名字发表的。’纸拿来了。普希金坐下来了，写呀，写呀……写了整整一本练习簿……瞧，就是那本（指一指窗前的桌子），好好瞧瞧吧……明天我把它呈送给陛下。你知道吗？普希金以其高贵的风度和举止使我折服了。”

亚历山大一世作出决定，给普希金预备上路用品，把他驱逐出去，发给一笔与官衔相称的、尽可能体面的驿马费，派遣他到南方去当差吧。不完全是想“宽恕”这个年轻的诗人，而是考虑到普希金在社会上所获得的普遍的同情。沙皇与皇村中学的校长的谈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沙皇说：“应该把普希金送到西伯利亚去。他的颠覆性的诗句传遍了俄罗斯，青年人都背熟了这些诗句。我欣赏他在米洛拉多维奇总督面前所表现的骑士风度，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普希金要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并非无风起浪。后来在沙皇的决定宣布之前，各个方面的人士通过各种方式为普希金说情，考虑到社会影响，沙皇才最后决定把普希金“流放”到南方。

1820年5月6日，普希金带着1000卢布的旅费和外交部给南方移民监督官英佐夫的信，离开了彼得堡。

5月中旬，普希金到英佐夫将军的驻地卡捷琳诺斯拉夫，在这里他遇见1812年战争的英雄尼·拉耶夫斯基一家，经英佐夫的同意，诗人和这

个对他十分友好的一家游览了高加索和克里米亚。

据说，拿破仑曾说过，拉耶夫斯基将军是个帅才。1812年战争以后，沙皇要授予他伯爵封号，但被他谢绝。普希金对拉耶夫斯基非常尊敬，他曾这样写道：“他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见证，是1812年的活的纪念塔。他是个没有偏见、性格刚毅而又多情的人。他无意之中使那些理解他、崇敬他高贵品质的人更愿意靠近他。”

拉耶夫斯基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普希金与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普希金在给弟弟和朋友的信中，不断地提到他和这一家人的亲密关系。他常与拉耶夫斯基的次子尼古拉一道讨论诗歌，尼古拉还向普希金介绍拜伦和法国诗人谢尼埃的作品。但普希金对拉耶夫斯基的长子亚历山大却是又喜欢又害怕，普希金曾在诗中这样写到他：“同他相见叫我着迷，/他的微笑和迷人的眼神，/还有他那挖苦人的话语，/都令我发冷、呆若木鸡。”亚历山大·拉耶夫斯基的一些观点也给普希金以一定的影响。

但给普希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普希金后来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回忆道：“他的四个女儿都美极了。大小姐是一位非凡的女性。你想我该是幸福的！生活自由，无忧无虑，又住在一个可爱的家庭里。我太喜欢这里的生活了！我还从来没有如此享受过。美丽的南国天空，幽静的环境，令人浮想联翩的自然风光，连绵的群山，还有花园和大海。朋友，我多么渴望再见到南国风光，多么渴望再遇到拉耶夫斯基一家人啊！”

除了对大小姐叶卡捷琳娜·拉耶夫斯卡娅颇为欣赏外，普希金还倾心于三小姐玛丽娅·拉耶夫斯卡娅。据说，普希金一生都在悄悄爱着玛丽娅。玛丽娅嫁给了伏尔康斯基公爵，他是一个有名的十二月党人，后来玛丽娅跟着他去西伯利亚流放。不过，她否认普希金与她有任何超过友谊的关系，她说过这样的话：“作为诗人，普希金认为自己应该热爱所有漂亮的女人及他所遇到的所有女郎。实际上，他钟爱的是诗神缪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写诗！”从普希金一生与女性交往的情形看，这番话确实不无道理。

普希金自己也说过：“我对自己所遇见的漂亮女性，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爱慕之情，但她们都讥笑我。除去一位之外，他们又都向我卖弄风情。”有人以此推想这“除去的一位”是指玛丽娅，但又无从考察。不过人们发现在普希金的不少作品里，例如《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切萨拉依的喷泉》，乃至《叶甫盖尼·奥涅金》，都有玛丽娅的影子。据学者们考证，《波尔塔瓦》就是为玛丽娅而作的，长诗的献辞中有这样的句子：

或许，诗人的这一篇献辞，  
有如他已经逝去了的爱情，  
献给你，却又得不到回答，  
一如往昔，又成过眼烟云？

……

要知道，在分手的日子里，  
你的话语的最后的声音，  
便是我唯一的珍宝、圣物，

我心头的惟一爱恋的幻梦。

长诗中还用这样的诗句赞美玛丽娅的眼睛：

明亮的眸子如同白昼阳光，  
乌黑的眼珠恰似暗夜一样。

普希金初到南方的日子，就是在与拉耶夫斯基一家愉快的相处中度过的。三个月后，他返回了英佐夫新迁的驻地基希尼奥约夫。英佐夫将军像迎接亲生儿子一样迎接青年诗人，当时普希金已身无分文，将军就让他住在自己的府邸，在各个方面都尽量照顾他，并且还为普希金争取到700卢布的月薪。不过，这位善良的将军也暗暗为普希金担心，生怕他又闯出什么新的乱子。

南方的大自然以其雄奇、瑰丽和盎然生气吸引和感染着普希金，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他与南方秘密团体的成员——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结识，更加强了他的反抗情绪。这些思想和感受，在他这个时期的创作特别是抒情诗中得到鲜明反映。在《白昼的太阳熄灭了……》一诗中，诗人以“波动的”和“阴郁的”海的形象寄托了他内心的不安和忧伤；而《致察尔达耶夫》（1821）一诗更是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思绪的真实写照：

在孤寂里，我任性的诗才  
体验到平静的劳作，思想的澎湃。  
我支配白天；心智熟悉了秩序；  
我学会了长时间的思绪。  
在自由的怀抱中，我想要补偿  
那些虚掷的年月，少年的荒唐，  
并在启蒙方面与时代同步。

同年创作的《短剑》一诗，开头四行便“寒光闪闪”：

林诺斯的大神把你锻铸，  
只为了不死的复仇女神的使唤，  
自由的秘密的守卫啊，你可以惩处，  
你是对耻辱和冤仇的最后的裁判。

据说，当时未来的十二月党人都把这首诗理解为杀死沙皇的一种直接号召。

1923年6月，普希金被调到奥德萨，在接替英佐夫的奥德萨总督沃隆佐夫的办公厅任职。沃隆佐夫和英佐夫不太一样，他想充当这位被流放的诗人的保护人的角色，而一心追求独立人格的普希金，当然接受不了沃隆佐夫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以到奥德萨不久，普希金和沃隆佐夫的关系就日益恶化。普希金写过一些短诗来讽刺沃隆佐夫，其中有这样一首：



半个老爷，半个商贾，  
半个聪明人，半个无识之徒，  
半个流氓，但是可以希望：  
他终有一天会兼备全部。

沃隆佐夫把普希金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吏，经常派他去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普希金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应付。一次，普希金被派到各县去调查蝗虫的情况，据说他到四处转了一圈之后，写了这样一个“诗报告”：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讯。

不过，沃隆佐夫的夫人和他丈夫有些不太一样，她生性乐观，很有教养，又爱好艺术，在奥德萨的社交界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据说有一次普希金发现她面对着大海，吟诵茹科夫斯基的诗作，这使得普希金惊叹不已。而这位总督夫人沃隆佐娃也对这个被流放的著名诗人颇感兴趣。据考证，普希金的一组抒情诗就是献给沃隆佐娃的。

1824年，沙皇秘密警察截获普希金的一封私人信件，其中涉及到无神论的观点，这在沙皇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再加上沃隆佐夫多次上书告发普希金，亚历山大一世便对普希金施以更严厉的惩罚：普希金被撤销公职，遣送到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流放，受当地政府、教会以及他父母的监督。同年7月，普希金离开了奥德萨。

南方四年的流放生活，不但没有压垮普希金，反而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对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反抗专制暴政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同时，与生活和大自然的接近，也丰富和充实了诗人的感受，并不断地唤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所以，这四年也是普希金的创作迅速成长的时期。除了写作了大量的抒情诗以外，诗人还创作了多部长诗，其中《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巴赫切萨拉伊的喷泉》（1823）和《茨冈》（1824，这部长诗是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才最后完成的）等作品，是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成就。

## 第六章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当《自由颂》的作者被逐出首都，流放到那遥远的南方时，他不会想到他留下的一部作品《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会在文坛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在欧洲和俄罗斯诗坛上，一个诗人没有创作出大型作品是当不了大诗人的，正如在歌坛上一名歌唱演员不演唱几部经典歌剧是成不了歌唱家的。这种惯例大概与欧洲的诗歌源头有关，在欧洲，最早的诗歌就是史诗，它是一种大型叙事作品，如荷马史诗。小型诗歌作品，如抒情诗，则出现的时间较晚。在俄罗斯诗歌中，最早出现的一部诗歌作品——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同样也是一部叙事诗。后来的一些俄罗斯诗人，也都热衷于大型叙事作品，茹科夫斯基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把写诗视为自己“天职”的普希金，早在皇村中学时期就有过创作一部大型作品的念头，并且对这部作品还有了初步的构思。到外交部后，他一方面频繁地进行社交活动，同时也利用一些零碎时间来写作这部作品。后来，普希金为了集中精力完成这部作品，还隐居到乡下，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这部作品最后于1820年完成，它就是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这是普希金第一部大型作品，也是他早期创作的最大成就。作品充分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大量运用了人民的语言，创造出美丽动人的画面，塑造出鲜明的富于俄罗斯特点的形象。它以别开生面的奇想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框范，又以明朗的生活气息摆脱了浪漫主义的虚幻，给俄罗斯诗坛送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长诗除题词、序诗和尾声外，共分六章。在著名的序诗中，脍炙人口的诗句便把读者引进了一个美妙神奇的童话世界：

海湾上有棵青青的橡树，  
橡树上牢系着一条金链，  
一只博学的猫不分昼夜  
紧跟着金链老来回兜圈，  
向右边走——便唱一首歌子，  
向左边走——便讲一个故事。

这部长诗的序诗在俄罗斯是家喻户晓的，它是普希金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后为长诗补写的。

长诗一开始就告诉读者：  
这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从远古以来就世代相传。  
……  
太阳弗拉基米尔与一群  
健壮的儿子，在高大的  
客厅中宴请他们的友人。  
他把心爱的最小的女儿

嫁给勇敢的公爵鲁斯兰……

可是，就在新婚之夜，“突然一声霹雳，云中电光闪闪”，在一片“天昏地暗”中，公主不见了，原来她被专抢美女的黑海王劫走。于是，按照公主父王的许诺，谁能够把柳德米拉安然无恙地找回来，就可以娶她为妻。长诗的主人公鲁斯兰和另外三个竞争者就分头出发去寻找柳德米拉。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冬天就要来临——鲁斯兰  
向着遥远的北方勇敢地  
继续自己的路。他每天  
要遇到新的障碍和磨难：  
他有时同什么武士格斗，  
有时同妖婆或巨人交手，  
有时仿佛在神奇的雾中，  
在那朦胧的月夜里看见  
有好多美人鱼坐在枝头，  
她们随着微风晃晃悠悠，  
嘴边都挂着狡黠的微笑，  
不说话，只是把勇士引诱……  
但无畏的勇士依然无恙，  
柳德米拉占据他的心头。

就情节而言，《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并无多少新鲜之处，和许多欧洲或俄罗斯的童话一样，它讲述的是一个“英雄救美女”的故事，自然其中还少不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少不了善恶有报，少不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但普希金给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它以新的灵魂，从而点石成金，让它大放异彩。

在俄罗斯诗坛上，像《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样的题材，古典主义诗人一般都会不屑一顾，即使偶尔问津，也只会注目于王权的威严和德行，并要尽量地削弱其中世俗生活的成分。浪漫主义诗人倒是这类故事颇为倾心，但他们多半会强化或夸大其中的神秘因素，并以主观性的幻想给它蒙上一层虚饰，使它变得扑朔迷离。而普希金既把传说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相结合，又剥去故事的神秘色彩，强化其中的世俗生活的成分，使幻想与现实并存、让严肃与戏谑共在，既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又抛弃了浪漫主义的俗套。

自然，就外部情节来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与茹科夫斯基的长诗《十二个睡美人》有相似之处，并且，正是在《十二个睡美人》问世的时候，普希金开始写作《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普希金自己并不忌讳这一点，在长诗第四章一开头，他就直接说明了他这部长诗与《十二个睡美人》的关系。然而宣布了对于茹科夫斯基进行的“讽刺性模拟”后，普希金便亮出了他的“反叛”的旗帜：

你，诗歌的奇异的天才啊，

歌唱神秘的幻象和爱情、  
歌唱幻想和魔鬼的歌手，  
原谅我，北方的俄尔甫斯，  
我在我开心的故事中  
此刻正跟在你后边飞腾，  
而从虚伪的美的掩饰下  
揭穿任性的缪斯的竖琴。

这段诗的前四行都是指茹科夫斯基，后四行则表明普希金的真实意图。事实上，在整部长诗中，无处不显示出普希金的“反叛”和创新，就如下面这样一幅画面吧！这是鲁斯兰救出柳德米拉后来到一条河边所看到的情景：

他突然看见，就在他面前，  
驶来了挂着白帆的小船，  
而在这水流缓缓的河上  
听见一声声渔人的歌唱。  
小船渐渐地靠近了河岸，  
从昏暗的小房里跑出一个  
年轻的姑娘。匀称的身段，  
随意披散的卷卷的头发，  
微微的笑容，宁静的目光，  
袒露的胸口，裸露的臂膀，  
一切都可爱又令人神往。  
这时他们俩拥抱在一起，  
在这清凉的河边坐下来，  
而这无忧的悠闲的时光  
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欢爱。

在这幅世外桃源一般的画面中充满了多么恬静的世俗的生活，画面的主人公——鲁斯兰的三个竞争者之一，如今已放弃了竞争，他在享受着世俗的生活。像这样的画面在长诗中比比皆是。且不说这样的画面所包含的思想，光是画面本身就能说明普希金的“离经叛道”。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而止。在长诗中还出现了更加鲜明更加绚丽的爱情场景，这些画面简直可以让古典主义诗人怒发冲天，令浪漫主义诗人瞠目结舌了。对此，普希金公开申明：

我不是荷马，只有他一人  
用他那美妙的诗句才能  
描写出希腊卫队的午宴，  
描写出杯中的泡沫和响声。  
我愿意步巴尔尼 的后尘，

---

巴尔尼，法国诗人，写过不少爱情诗。

用散漫的竖琴娓娓歌唱  
夜色掩盖下的裸体美人  
和那温馨的爱情的亲吻！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个方面，普希金又让古典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惊讶不已。这就是长诗的第六章，这是普希金自己十分珍视的一章。在这一章里，幻想被历史的真实画面所代替，轻松的基调转换为沉洪的旋律，爱情的角逐者成为祖国的捍卫者。透过主人公解放祖国的战斗画面，响彻着诗人在皇村中学期间所抒写的歌颂卫国战争胜利的热情诗句，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血的战斗已经开场  
战马嗅到死亡，跳跃奔腾，  
刀剑砍向铠甲铿锵作响，  
利箭呼啸着乌云般飞过，  
鲜血染红了整个的战场……  
……就在敌人的阵地上，  
有一个天神一般的武士  
铠甲如同火焰闪闪发光  
如同雷电一般拍马奔驰，  
东奔西突，拼力猛砍猛刺……  
那就是鲁斯兰。我们的勇士  
就像雷神一样降到敌军头上。

这里，古典主义诗人热衷的题材和格调以一种凝重的现实感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深化，而浪漫主义诗人也只能在这样的画面前“望洋兴叹”了。无怪作品问世后便得到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的高度赞扬，而宽厚的茹科夫斯基还亲自向普希金表示衷心的祝贺，茹科夫斯基甚至还送给普希金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有这样的题词：“失败的先生赠给胜利的学生。”这件事早已成为俄罗斯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自然，作品也遭到一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关于这一点，别林斯基后来写道：“普希金的第一篇诗作所激起的热情欢呼和满腔义愤是任何作品都无法相比的。这一幼稚的、才气不大的作品这样成功并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在过去从未见过。捍卫这一作品的人把它视为巨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颂扬普希金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史诗的作者。而反对派的代表——那些崇尚古代文风的人对这一作品的问世非常愤慨。诗中没有提到无神论的话，但他们却十分注意这一点。对诗中所表现的优美诗句、理智、审美观和灵感等，他们却视而不见。”

一个批评者这样写道：“诗歌所歌颂的对象应当是美好的东西，只有歌颂美好的艺术才能赢得诚挚的尊敬和荣誉……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诗句虽优美，但却被庸俗的对比、可恶的魔法、淫荡的画面和让人倒胃口的表白玷污了。”

另一个批评者甚至把这部长诗比作一个大胡子农民进行挖苦：“请

问，如果一个客人满脸络腮胡子，穿着农民的衣服，拖着一双树皮鞋，不知用什么方法偷偷出现在莫斯科高雅的集会上（让我们把不可能的设想为可能的吧！）粗声粗气地喊道：‘好哇，孩子们！’难道大家会欣赏这样一个搞恶作剧的人吗？”

法国作家梅里美的见解是客观的：“在《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尝试从俄罗斯人民的信仰中借来了活力。所以它不像古希腊神话那么陈旧。在 1820 年那个时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传统的偏见认为这一尝试近乎鲁莽。普希金在寻求如何跳出因循守旧的框子。他生活在贵族阶层，但却想了解农民的私生活。”

## 第七章 拥抱自然

南方的大自然，是普希金抒情诗的摇篮。而在这个时期的抒情诗中，最主要的是自然诗。

普希金的自然诗在他的抒情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自然的出色描绘，自然是普希金这一类诗作的显著特点，也是他卓越才华的重要表现。不过，对于普希金来说，他注重忠实地表现大自然外在的美，更甚于探索大自然内在的奥秘（像丘特切夫那样）；同时，他还更注重表现大自然在人的内心世界唤起的情绪及其变化。在普希金那儿，几乎没有纯然描绘大自然景色的诗作，他在描绘大自然的同时，几乎从不会忘记人这个主体。而这一点，正是浪漫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普希金的《风暴》一诗以一幅剪影式的画面仿佛在说明这个特点：人在自然中应该是主角。

你可曾看过岩石上的少女，  
穿着白色衣裙，立于波涛之上，  
当海水在混乱的幽暗里  
和峭石游戏、澎湃和轰响，  
当闪电以它紫红的光线  
不断闪出了她的形象，  
而海风在冲击和飞旋，  
扬起了她的轻飘的衣裳？  
美丽的是这海，狂暴、阴郁，  
闪烁的天空没有一块蔚蓝，  
但相信吧：岩石上的少女  
比波浪、天空、风暴更美观。

这一特点在普希金的名作《致大海》（1824）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这首诗写于诗人第二次流放即离开南方赴原籍米哈依洛夫斯克村之前，是诗人与大海告别时心声的吐露，情感的宣泄，愿望的表达。作品开篇便非同凡响：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好像是朋友的忧郁的怨诉，  
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  
我最后一次在倾听  
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

“自由的元素”是点睛之句。诗人之所以这样热爱大海，这样与大海恋恋难舍，与大海告别便感到这样痛苦，其根本在于大海自由的精神——“你是我心灵的愿望之所在呀！”正是对自由的渴望和执着追求支撑着诗人的流放生活，换句话说，是大海给诗人以力量和信心。这里，大海的形象已不仅仅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诗人的“精神之友”，而诗人

也仅仅在“自由”这特定的范围中描绘大海的性格，展开有关的回忆，抒写自己的情怀。所以诗人突出的也只是大海的任性、狂放、壮阔和“反复无常的激情”，而对大海性格的另一面诸如宁静、温柔等基本没有提及。诗人的回忆也是与大海相联系的：如诗中提及的“隐秘的愿望”就是指诗人曾想从海上偷渡出国。还有两个与大海相关的人物引起普希金“心灵的震惊”，一是曾震撼欧洲的拿破仑，一是诗人拜伦。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虽然用了“光荣的”、“威严的”字眼来写拿破仑，但他的注意的中心是后者，他笔下的拜伦要远高于前者，诗人称拜伦为“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位君王”，他把拜伦和大海联系起来，讴歌拜伦的自由精神：

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  
他是用你的精神塑造成长：  
正像你一样，他威严、深沉和阴沉，

他像你一样，什么都不能使他屈服投降。然而，一想到眼前，一想到自己要去的地方，诗人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感慨，他对拜伦逝世的惋惜，对大海的眷恋，对命运的不平，对现实的失望，种种复杂的思绪都包含在下面深情和富于哲理的诗行之中：

世界空虚了……大海，  
你现在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人们的命运到处都是一样：  
凡是有幸福的地方，那儿早就有人守卫，  
或许是开明的贤者，或许是暴虐的君王。

可是诗人却又不得不离开大海，等待他的是更为严酷的命运，于是他和大海作最后的告别：“哦，再见吧，大海！/我永不会忘记你庄严的容光，/我将长久地、长久地/倾听你在黄昏时的轰响。”

我整个的心灵充满了你，  
我要把你的峭岩，你的海湾，  
你的闪光，你的阴影，还有絮语的波浪，  
带进森林，带到那静寂的荒漠之乡。

也就是说，尽管诗人是不自由的，但他不会忘记对大海的友谊，不会忘记大海的自由的精神，而且他还要把这些带到他要去的的地方，大海这“自由的元素”将永远成为他的精神力量。

《致大海》以其雄浑的画面、恢宏的气势、深沉的风格和奔放的激情谱写了一曲大海的颂歌，一支新的“自由颂”。大自然《大海》本身的真实面貌在诗人的笔下得到充分的展现，大自然之中所蕴藏的博大和崇高的精神在诗人的主观精神的照耀之下更是喷发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从思想高度来看，还是从艺术表现来看，这首诗都可称为普希金和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作，它和雪莱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创作的著名的诗作



《西风颂》（1819）相映成趣，大有同工异曲之妙，堪称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金光灿烂的双璧。与茹科夫斯基的代表作《海》相比，虽然这两首诗在艺术表现上各有特点（茹科夫斯基的作品拟人化的隐喻的因素更加突出，而普希金的作品直抒的成分更多），但普希金的《致大海》的思想境界无疑要比《海》高出许多，艺术感染力也更为强烈。这一点不言自明。而正是这一点成为普希金的自然诗的显著特点，即诗人高度的思想境界几乎是全方位地打通了个人情感与公民情感之间的通道，从而使二者常常融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普希金的公民诗和个人诗之间会存在着一种“模糊性”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普希金来说，无所谓公民诗或个人诗，事实上普希金的作品都是他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公民的情感和个人的情感是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有由于诱发的对象或时机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结果（作品）。他的公民诗中常常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对自然的思考和感受，一如他的自然诗甚至爱情诗中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公民意识或与人民的相通的思想。

学术界有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致大海》是普希金与浪漫主义的告别之作，也就是说诗人在创作了这首诗以后，便开始转向现实主义。从作为诗人——小说家的普希金的整个创作道路看，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自然也不无商榷之处），因为在这以后普希金创作了一系列叙事诗，特别是开始创作诗体长篇小说及一系列散文作品。但如果认为这以后的抒情诗创作也转向了现实主义，那就难以苟同了。因为抒情诗（甚至诗歌）本身，便决定了它的浪漫主义性质。作为抒情诗人，普希金始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尽管他后来的抒情诗（特别是自然诗）在风格上有所变化。

普希金 30 年代前后创作的一些自然诗中，对风物的描绘有趋于细致和朴素的倾向，例如《冬天的道路》（1826）、《秋》（1833）、《我又造访了》（1835）等作品。我们在这些诗作里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

我爱大自然凋谢的万种姿色，  
树林披上华衣，紫红和金光闪闪——  
在林荫里，凉风习习，树叶在喧响，  
天空笼罩着一层层轻纱似的幽暗，  
还有那稀见的阳光，寒霜初落：  
苍迈的冬天远远地送来了恫吓。

——《秋》

湖水一片蔚蓝，广阔地展开  
在金黄的田野和绿草原之间；  
一个渔夫正划过莫测的水面，  
身后曳着一只破旧的渔网，  
在倾斜的湖岸上散布着  
一些村庄——村后是一个  
歪歪斜斜的磨坊，它那风车

在风中费力地旋转……

——《我又造访了》

这样较为精细的风物的描写在诗人早期的自然诗中是绝少见到的，它说明诗人向现实主义的转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散文的转化）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这些作品中，诗人的主体仍占主导地位，客观的描绘依然从属于诗人主观情感的表现，这与诗人的自然诗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

别林斯基曾把普希金的自然诗与歌德的自然诗作过一番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指普希金——笔者）异常忠实而生动地观察了自然，但并没有深入它的秘密的语言。因此，他只是刻画它，而没有冥想它。……在歌德看来，自然是一本打开的书，它的内容是思想；在普希金看来，自然是一幅生动的图画，充满了难以描述的、然而却是沉默的美。”在普希金笔下，自然就是自然，它忠实地描绘出它的美，至多让人参与到其中，让自然世界与人的感情世界相互衬托，而无意像歌德那样去沉思它，“冥想”它。这之间无所谓高下和优劣之分，反映了两位诗人不同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个性。我们还可以把普希金的自然诗与另一位也是以描写大自然著称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1803—1873）相比较，从而见出他的自然诗的特点。比如，两位诗人都以喷泉为题材各写过一首诗，普希金是这样写的：

爱情的喷泉，鲜活的喷泉！  
这里是两朵玫瑰，我的礼物。  
我爱你的不停的絮语  
和你诗一般的泪珠。  
你喷出的银白色的水尘  
像寒露一样洒了我一身，  
啊，喷吧，畅快的水泉，  
淙淙地，把你的往事铺陈……

——普希金《致巴奇萨拉宫的喷泉》

丘特切夫是这样写的：

瞧，明亮的喷泉在飞腾，  
像一团活蹦乱跳的云团。  
它那湿漉漉的烟雾，  
在阳光中闪烁、飞舞。  
它的光一直向空中伸去，  
一旦触到那渴慕的高度，  
便又像五彩的尘埃一样  
注定要向大地上洒落。

——丘特切夫《喷泉》

两首诗写到这里，初看起来并无本质的区别，在描绘自然界的喷泉时各

有千秋。可是接下去区别就出来了：普希金的喷泉依然是大自然的喷泉，这“爱情的喷泉”使他想起古代的一个与这喷泉相关的爱情故事。而丘特切夫继续描写的却是另一种喷泉了：

人的命定的思想的喷泉啊，  
你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是什么样的不可解的法则  
使你奔涌，使你飞旋？  
你多么渴望冲向高天！  
可一张无形的宿命的巨手，  
却突然折断你执着的光芒，  
把你从高处打成水沫洒落。

丘特切夫是在把人的思想的喷泉（说更准确些是思维的喷泉）和自然中的喷泉比照着加以描写，他的诗的重心在后面。换了歌德，说不定他要思索这奔涌不断的泉水中所蕴含的哲理呢！

## 第八章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告别了大海，告别了南方，一辆四轮马车载着诗人普希金摇摇晃晃向北方的一个村落——诗人的故土米哈依洛夫斯克村驶去。一个新的更严厉的惩罚降临到诗人的头上——幽禁。

“我的归来十分凄凉。”普希金后来这样写道。在南方，虽说官方的本意是把他流放到这里，但毕竟还保留着“公职”的外衣，他多少还有一点薪金，并且，那里也多少还有一些社交活动，和各个阶层的人还有一些接触，还不至于那么寂寞。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有的是一顶国家要犯的帽子。

普希金刚到家中，全家人都把他当作亲人接待。可等到他说明自己的身份，一家人便陷入忧虑之中。在他父亲看来，儿子被革职，按“皇上”的旨意放到老家来幽禁，是一件有损家门名声的事。普希金感到家中的环境比南方还要沉闷，为了躲避家人的指责和埋怨，他只有经常到荒野中去散步，或者去临近的三山村。

后来普希金的家人都相继离开了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先是他的弟弟，后来是他的姐姐，最后他的父母也放弃了对儿子的“监管”回到了彼得堡。这样，只有普希金一个人留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那所宽大破旧的房子里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消遣的地方，惟有他那善良的奶妈还伴着他，他又和奶妈一同度过了一个个夜晚，奶妈又给他讲述着那古老的故事，在奶妈的故事中，普希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普希金在一封信里写道：“到了晚上，我就听我的奶妈讲故事，……她是我惟一的伴侣，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不会寂寞。”普希金在《冬天的夜晚》一诗中又一次描写了他的勤劳而善良的奶妈：

风暴肆虐，卷扬着雪花，  
迷迷茫茫遮盖了天涯；  
有时它像野兽在嚎叫，  
有时又像婴儿唧唧呀呀。  
有时它钻进破烂的屋顶，  
弄得干草窸窸窣窣，  
有时它又像晚归的旅人，  
来到我们窗前轻敲几下。  
我们这衰败不堪的小屋，  
凄凄惨惨，无光无亮，  
你怎么啦，我的老奶妈呀，  
为什么靠着窗户不声不响？  
我的老伙伴呀，或许是  
风暴的吼叫使你厌倦？  
或许是你手中的纺槌  
营营不休地催你入眠？

他惟一排遣孤独的方法便是读书和创作。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两年时光里，他读了大量的书籍，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他的弟弟给他弄书，我

们摘录一下这个时期他给弟弟的信：

“诗歌，诗歌，还是诗歌！《拜伦谈话录》！瓦尔特·司各特的诗！这是精神食粮……现在托你一事儿，替我找来《斯金卡·拉辛 历史摘录》，他是俄罗斯历史上惟一富有诗意的人物。”

“把勒布伦 的作品给我送来，包括颂歌、哀歌等等。还有《埃麦尔卡·普加乔夫 传》和《姆拉维约夫 达佛里达之行》。”

“《圣经》，《圣经》！但一定要法文版的《圣经》！”

……

而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不论就数量而言，还是从艺术价值来讲，都超过以往任何创作时期。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民族性和人民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可是在这阴暗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明朗的日子，那就是友人的来访。自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来探访普希金这个“要犯”需要一定的勇气，然而正是这种时日的探访，才愈显友情的真诚和宝贵。可是，普希钦，这个诗人皇村中学的同学，后来的十二月党人向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走来了。据说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对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指普希金——笔者）受到警察和教会的双重监视吗？”可普希钦回答：“对这一切，我十分清楚。但我也知道，一别5年，我要去拜访老朋友，别人无权阻拦，况且他目前的处境如此凄惨。”

两位老朋友在这种时刻的见面会是怎样的呢？任何再生动的描写也比不上他们自己的叙述，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普希钦后来所作的一段追忆：

……离渴望的目的地已经不远了。我们终于从大道拐到小路，在森林中沿着山间小道奔驰，可我总感到不够快！我们从山上下来，离庄园已经近了，但由于隔着茂密的松林，看不见庄园。突然，我们的雪橇在坑洼处向一边倾斜，车夫从雪橇上摔下来。我和那位从皇村中学门槛到要塞大门始终与我为伴的阿列克赛勉强支撑在雪橇上，牢牢地握住缰绳。

现在马在雪堆中间急驰，用不着再担惊受怕，因为不会摔到旁边去了。四周是一片森林，积雪贴着马腹，不用驾驭也行。后来我们又沿着蜿蜒的小路向山上驶去。突然一个急转弯，随着一阵叮当的铃声，我们猛地闯进了一扇虚掩的大门。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使马停在台阶前了，雪橇驶过台阶旁，陷在尚未打扫的庭院的积雪中……

我环顾四周：看见普希金站在台阶上，赤着脚，穿一件衬衣，双手高举着。我当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我跳下雪橇，将他紧紧拥抱，把他拖到屋内。室外寒风刺骨，可是在有些时候，人是不会感冒的。我们彼此端详，亲吻，相对无语。他忘了应该穿衣服，我也没有想到要脱下蒙着一层白雪的皮袄和皮帽。

---

斯金卡·拉辛，17世纪俄国农民革命领袖，顿河的哥萨克。

勒布伦（1729—1807），法国诗人。

普加乔夫（1740？—1775），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姆拉维约夫（1794—1866），俄国将军。

这时是早晨八点左右。我记不清当时的情景了。

一位老太太走进来，看见我们还像进屋时那样拥抱着——一个几乎光着身子，另一个满身是雪。热泪终于夺眶而出（即使现在，事过33年，热泪又沾湿了我的镜片，使我难以舍笔），我们的神志清楚过来了。

在这位妇人面前，我们感到很难为情。可是她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知道她把我当作什么人，但她什么也没有问，马上跑过来拥抱我。我立刻猜出，这就是他多次吟诗赞美的善良的奶妈——我热情地拥抱她，差一点使她喘不过气来。

普希钦后来因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被捕判刑，在流放中，是普希金第一个用真挚的语言投书西伯利亚，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首《致普希钦》的诗。用不着怎样去说明，谁都知道，苦难中的友情该是多么地可贵！

后来诗人杰尔维格也来到了米哈依洛夫斯克村，他在这里住了15天。这期间，他们互相阅读对方的作品，互相交换意见，还合作写诗。普希金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正像普希金后来在写给西伯利亚的那首著名的诗中所写的一样，“爱情会穿过牢门”来到这里，一个美丽的女子，也来到这荒僻的乡村，给诗人送来了温馨，并由此引出一首俄罗斯诗歌中最著名的爱情诗的问世，这就是《致凯恩》：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在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  
在喧闹的虚幻的困扰中，  
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影。

许多年代过去了。狂暴的激情  
驱散了往日的梦想，  
于是我忘记了你温柔的声音，  
还有你那天仙似的面影。  
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的生活中，  
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失，  
没有神性，没有灵感，  
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

如今灵魂已开始觉醒：  
这时在我的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我的心狂喜地跳跃，  
为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  
有了神性，有了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安娜·凯恩是普希金的女友，诗人在 1819 年 20 岁时，第一次在彼得堡与她相见，那时，她才 19 岁，但已经嫁给了一个 50 岁的将军。“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指的便是他们在彼得堡的那次相见。1825 年，凯恩来到三山村探望她的亲戚，这样，诗人得以和她再次相见。在凯恩离开三山村的时候，普希金送给了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二章，其中还夹了这首赠诗。后来，俄罗斯著名的音乐家格林卡为这首诗谱了曲，使它成为俄罗斯最有名的情歌之一，至今仍被人们传唱。

在这首诗中，凯恩的形象被理想化，她已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女子的形象，而主要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幻影”，一个“纯洁之美的精灵”，是美的化身，她照亮了诗人被囚禁的“阴暗生活”。在这里，爱情已没有一丝一毫的世俗的成分，而是一种神性、一种灵感乃至整个生命的源泉。它驱散折磨诗人的“无望的忧愁”，于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诗人在诗的结尾中所描写的：“我的心狂喜地跳跃，/为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性，有了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而这一切都是由爱情和美激起的。它是精神境界的升华，是沉睡的心灵的苏醒，是生命的又一次再生，是潜在的生命力的喷发。这就是爱的力量，美的魔力。

普希金在三山村创作的一系列歌咏友情和爱情的抒情诗后来被称为“三山村组诗”，组诗表现了诗人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思绪和情感，大都是献给三山村的女性的。如诗人在写给三山村的女主人的诗《赠奥西波娃》中写道：

也许，我真的不会太久  
在这宁静的地方流放，  
不再感叹那温馨的岁月，  
不再为恬静的乡间诗神  
把无忧无虑的心儿献上。

然而，即使在遥远的异邦，  
我也将把它朝思暮想，  
神游在三山村的近旁，  
在草坪、小溪、山冈上徘徊，  
在家园的菩提树阴下徜徉。

每当白昼逝去，夜幕降临，  
一个怀念家园的孤魂  
会从坟墓里出来翱翔，  
有时飞回自己的故乡，  
向亲友投以深情的目光。

诗人这个时期的思想是忧郁的、伤感的，当奥西波娃在晚秋时节给他送来一束花，他又不由自主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田野里残留的花儿  
比早开的鲜花更可爱。  
它会在我们的心里  
引来更多的幽思和悲哀。  
同样，有时分手的时刻  
比甜蜜的会面更难忘怀。

但普希金乐观的信念永远不会泯灭，即使在这处境艰难的日子，它也会闪耀着一种哲理的光芒，那首著名《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是诗人写在三山村女主人的女儿沃尔夫的纪念册上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着未来，  
而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组诗中不乏抒写爱情的篇章，抒写的对象，除了凯恩之外，还有其他的女子，如《承认》就是献给三山村的女主人的女儿阿琳娜的。

普希金歌咏友谊、特别是歌咏爱情的抒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位高，艺术形式完美。如果说，普希金的公民诗最能体现普希金进步的社会观点和民主精神，那么，以爱情诗为代表的个人诗则最充分地展示了普希金的人性和人情的美和魅力，以及卓越的诗歌才华。

爱情，在普希金看来，永远是一种崇高的神奇的力量，它净化人的灵魂，促进人的精神的提高和发展，激发创作的灵感，尽管它带来的也不尽是欢乐，有时甚至还是忧伤和痛苦，但它永远是一种美好的感情。

普希金早期创作的爱情诗多半属于“轻诗歌”即所谓“阿那克瑞翁体”一类。这类以讴歌美酒、爱情和享乐为主题的作品在当时诗坛上颇为流行，一度给还是学生诗人的普希金以较大影响的诗人巴丘希科夫就擅长写这类诗歌，所以少年普希金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诗风的影响。在献给这位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的诗篇《阿那克瑞翁的坟墓》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世人啊，生命只是虚幻，  
快抓住嬉笑的欢情；  
要把酒杯常常斟满，



尽情享受生命的华筵；  
要让情欲奔放不羁，  
等酒饮完了再去安息！

但普希金很快地摆脱了这种影响，他以他特有的诗人的真诚和坦白，以他独具的高雅的艺术品味，去探求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底蕴，“成为第一个窃得维纳斯腰带的俄国诗人”。

和《致凯恩》一样，《格鲁吉亚的山丘上……》（1829）也描写了爱情的净化作用：

格鲁吉亚的山丘上是夜的幽暗，  
喧腾的阿拉瓜河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忧郁而轻快，我的哀愁是明亮的，  
它充满了对你的思念。  
啊，它充满了你，只有你……  
没有什么使我的相思痛苦或烦乱，  
唉，我的心又在燃烧，又在爱着了，  
因为——它不可能不去爱恋。

一般认为，诗中所说的“你”是指诗人的女友拉耶夫斯卡娅，有的学者则认为“你”是指诗人的未婚妻冈察洛娃。不过，从这首诗的内容和艺术效果看，“你”究竟是指谁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与前面的《致凯恩》不同，这首诗完全是诗人内心感受的直抒，诗中的女子的形象是隐蔽着的，我们感觉不到她的音容笑貌，而诗的目的也不在于此，我们感到的只是她在诗人心中引起的爱情。诗人伫立在山冈上，夜的幽暗遮掩了大自然的美丽，只听得见河水在喧闹不息地流淌，诗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他虽然在思念着他所爱恋着的少女，虽然略带点儿忧郁，但没有一点沉重和压抑之感，他的“哀愁是明亮的”，他的悲哀已经净化，他仿佛在这种相思中得到安慰和满足。这种没有痛苦的爱情已经超脱了世俗的情感而纯然是一种审美的结果。

1832年创作的《美人》一诗也是如此，它是献给莎瓦多夫斯卡娅的。诗人在出色地描绘了她的美之后，写下了下面这样的诗行：

不论你匆忙奔向何方，  
纵然是赴情人的约会；  
不论你的心头隐藏着  
哪一种不愿告人的希望——  
但是，遇见她你就会感到困惑，  
突然间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你将会把你虔诚的崇拜，  
献给这美丽的圣物。

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每首诗的基本情感，就其自身说，都是优美的、雅致的、娴熟的；它不仅是人的情感，而且是作为艺术家的情感。在普

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由此看来，阅读他的作品是培育人的最好方法，对于青年男女有特别的益处。”如著名的《我曾经爱过您》（1829）：

我曾经爱过您：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您，  
我也不想再使您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您，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您，  
但愿上帝保佑您，另一个人爱您，也像我一样。

这里，爱情是建立在希望爱慕对象幸福的基础之上的一种高尚的情感，它已远远超脱了世俗的男女之爱；它既洋溢着真诚和柔情的温馨，又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它以最纯朴的形象、最美好的语言最本质地揭示出爱情的真谛；每一个爱着或爱过的人都能够以自己是否拥有或拥有过这样的情感来检验自己情感世界的纯洁度，都能用它来照亮自己灵魂的深处。像这样的充满无私精神和人道感情的爱情诗，大概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失去它的审美和教育作用的。而这正是普希金的爱情诗的魅力之所在。

## 第九章 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

别林斯基在谈到普希金的诗歌作品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如果评论普希金的作品，就必须严格地按照写作年代的顺序来观察。普希金之所以和他以前的诗人不同，就在于从他的作品的顺序不仅仅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人个性的发展。他在任何一年中所写的诗，不只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和以后一年所写的必然不同。因此，他的诗不能像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巴丘希科夫的诗那样按照类别来印行。”别林斯基这一见解，不仅是对普希金作品的内容而言的，更是对诗人的诗歌艺术特别是抒情诗艺术而发的。

作为一个俄罗斯诗人，即便是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创造者，普希金不可能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位诗坛巨星和诗歌大师的。但无可否认，普希金的诗歌天才是罕见的，再加上他生得逢时，所以他的诗才发展和成熟的速度是惊人的。

“普希金出现的时代，适逢作为艺术的诗在俄罗斯有可能出现的时代。”别林斯基的这一见解中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1812年以后的日益觉醒的俄罗斯社会，为个人感情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的或者说是外部的条件，一是茹科夫斯基的艺术探索和经验，为以往只是作为一种形式的诗向作为艺术的诗的飞跃提供了艺术的或者说是内部的条件。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就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普希金诞生了。我们说，普希金在俄罗斯诗歌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或者说，对于俄罗斯诗歌来说，只可能有一个普希金，普希金是惟一的，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机遇不可能再有了。仅就此而言，这是普希金的幸运，也是其他才华卓著的俄罗斯诗人如莱蒙托夫等诗人的“不幸”。

普希金“中学时代”的诗还不能算是普希金自己的，至少不能完全算他自己的。这些“习作”之中，有前辈诗人特别是茹科夫斯基和巴丘希科夫的影响。但普希金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即使在这样的习作中，就有某些属于他个人的因素和超越前辈的地方，如韵文的美，用词的丰富和大胆等。但“中学时代”的诗中也有少数作品“透露出纯粹的普希金诗的因素”，例如下面这首《窗》（1816）：

不久以前，在薄暮的时刻，  
当天空凄清的月光  
在朦胧的幽径上流过，  
我看见了一个姑娘  
独自守在窗前，沉思郁郁；  
秘密的惊恐使她的胸脯  
呼吸紧促，她激动地  
探望山冈下黑暗的小路。

“我在这儿！”有人低声喊叫。  
于是这姑娘把窗户

悄悄地，颤巍地打开了……  
月亮躲进了夜的帷幕。  
“幸运儿！”我惆怅地想：  
“那等待你的只有欢快。  
等哪一天，快到晚上，  
也有窗子能为我打开？”

这首诗中出现的场景并无多少特别之处，在浪漫主义作品里屡见不鲜，但普希金对这样的处理有独到的地方，其中几乎没有了对茹科夫斯基哀伤情调的模仿，也看不到巴丘希科夫的那种虚华和缥缈的痕迹。“窗”的意义是多重的，即富于神秘的浪漫情调的窗和充满幸福期待的心灵的窗。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的语言明快，简练，流畅，节奏既急速又舒展，有一种一贯到底的气势，显示出普希金在诗歌语言上的才华，无怪别林斯基认为它是诗人早期为数不多的颇有特点的作品。

普希金的诗才迅速地成长和成熟着，很快地就摆脱了茹科夫斯基和巴丘希科夫的影响。当巴丘希科夫读了他的《游动的云层渐渐稀薄》（1820）时，不禁大吃一惊：“好家伙，他居然就这样写了起来！”屠格涅夫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写道：“巴丘希科夫是对的：在俄罗斯还没有人这样写！或许，在说完‘好家伙’之后，巴丘希科夫便不安地预感到，他的另一些诗及其语句构造方式将成为普希金式的……”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

游动的云层渐渐地稀薄；  
忧郁的星星，黄昏的星星，  
你的银辉镀白了凋萎的平原，  
昏睡的河湾，黑色的山巅；  
我爱你在天穹中的一抹幽光，  
它唤醒了我的沉睡着的思想。  
我记得，熟识的星星，你怎样升起  
在和平之乡，那里一切都令我向往，  
挺拔的杨树耸立在山谷中，  
郁郁的柏树，娇嫩的桃金娘，  
南方的海浪发出醉心的喧响，  
我曾在那边山上，满怀诚挚的思想，  
俯瞰着大海，懒散地消磨时光，  
当夜幕降临到农家茅草屋顶，  
那少女在昏暗中把你寻觅，  
呼唤你，就用她自己的芳名。

普希金的这首诗在我们今天看来（特别是在我们阅读了普希金后来的作品之后），也许不一定能算得上最出色的作品，但当年在读者特别是在一度给他以重大影响的巴丘希科夫看来，却是非同寻常甚至“离经叛道”之作。它没有过于华丽的幻想，也没有过分雕琢的忧伤，没有故弄的玄虚和神秘，更没有对于享乐的颂扬。诗中处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表现

出诗人个性化的感受。特别是在诗的语言上，差不多已脱尽了以往那种多半是来自于巴丘希科夫和茹科夫斯基的过于纤丽浮华之气，而代之以自然、纯朴、流畅的风格，这差不多已是普希金自己独特的风格了。无怪巴丘希科夫对此会惊讶不已。在普希金一度对阿那克瑞翁的“轻诗歌”（其实巴丘希科夫自己就神往于这位古罗马诗人）颇感兴趣的时候，巴丘希科夫曾劝说普希金改弦易辙，去模仿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写史诗，但普希金没有接受，在《给巴丘希科夫》一诗中，16岁的普希金明确表示“要摸索自己的路”。而现在，普希金不但告别了阿那克瑞翁，甚至也差不多把巴丘希科夫给撇开了。

普希金还没有脱尽前辈诗人的影响但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的创作时期可称为“过渡时期”，这样的时期并不长，在1825年之后，普希金作为一个独具一格的诗人，已在诗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了。事实上，按照别林斯基的意见，早在1819年，普希金的一部分作品就可算得上“纯粹的普希金的诗了”。

那么，“纯粹的普希金的诗”的特点，或者说普希金抒情诗艺术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

首先是真诚。这不仅是普希金抒情诗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19世纪俄罗斯诗歌和文学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或者说这是普希金开创并赋予整个俄罗斯诗歌和文学的最主要的特点。然而真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主观态度，它不仅是艺术的，更是思想的。普希金抒情诗的这一主要特点恰恰有力地说明了艺术和思想是不可分离的。正是真诚使得普希金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而形成了他的进步的社会观点，也正是真诚使得他无法回避和容忍不合理的野蛮的农奴制度而对其持激烈的否定批判的态度，在他的抒情诗中，这种真诚被艺术化了，它以不同的形态从各个角度得到升华，从而形成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艺术风格。无怪乎许多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一再指出普希金是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别林斯基写道：“我们在普希金之前虽然有过诗人，但没有一个艺术家诗人。”又说：“在他以前，诗只是美丽情感和崇高思想的一种词藻华丽的表现，而这情感没有组成诗的灵魂；诗只是被依附上去，……”这位普希金创作的最深刻的评论者进一步指出：“普希金的诗的特征之一，那使他和以前的诗派严格区别的东西，是他的诚恳。他不夸大，不粉饰，不要弄效果；他从没有派给自己一种辉煌的、但却是他未曾经历过的感情。他到处都显示着本然的样子。”所以别林斯基提出了“真情”这一概念来评论普希金的诗歌。印证上述见解的例子随手可拾，不必说到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充满火一般激情（同时也就是“真情”）的“政治抒情诗”，我们再随便举几首人们不是特别熟悉的爱情诗来作一点说明，因为在爱情这块“试金石”面前，几乎每一个灵魂的崇高或卑劣、纯洁或肮脏（也就是“真情”）不会不、也不可能不得到彻底“曝光”：

天使阿，我不值得你的爱恋，  
请假装一下吧！你的一瞥  
永远能奇妙地倾诉一切！  
唉，骗一骗我并不很难，  
我是多么高兴被你欺骗！

——《默认》（1826）

她以一句失言：以亲热的“你”  
代替了虚假的客气的“您”，  
使美妙的幻想立刻浮起，  
再也捺不住这钟情的心。  
我站在她的面前，郁郁地，  
怎样也不能把目光移开；  
我对她说：“您多么可爱！”  
心里却想：“我多么爱你！”

——《你和您》（1828）

我以前是怎样的，现在还是那样，  
无忧的心，善于钟情。你们早知道，朋友，  
我是否能看到美色而不神魂荡漾——  
我少不了那内心的激动，怯懦的温柔！

——《我以前是怎样的》（1828）

我原以为，这颗心忘了  
轻易感受痛苦的能力；  
我说：那以往的一切  
早已不在，早已过去！  
去了，盲目信任的美梦，  
热情的激动和忧郁……  
可是，来了美的有力统治，  
怎么这颗心又在颤栗！

——《我原以为》（1835）

从诗的角度来说，在普希金之前，没有哪一位俄罗斯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不必说到茹科夫斯基以前的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就是茹科夫斯基本人，即令他生活中经历过类似的感受，他也无法用这种方式抒写出来，要么会赋之以伤感，要么会由此生发出莫名的幻想。巴丘希科夫的诗歌中也许能出现类似的题材，但他的华丽和虚饰肯定会破坏（多半是过分的夸张）这种情感的分寸感。只有普希金才能以这种包含着热烈的冷静和适度的简洁的诗句抒写出这种情感。自然，后来丘特切夫的笔下出现过类似的诗句，不过在风格上已有所变化，但也很难说就完全没有普希金的影响：

灵魂想为她祈祷，  
心儿却禁不住去爱慕。

普希金的真与诚还表现在他的自然诗中，他不会像其他的诗人那样，在描绘俄罗斯大自然时“喜欢给它点缀上原来没有的彩色”，把俄罗斯的大自然变成对意大利或法兰西的大自然的摹仿，而是“异常忠实而生动地”描绘和表现俄罗斯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普希金的真诚或“真情”、诚恳都是充分的执着的。而这一点，正是普希金抒情诗艺术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思想的）显著特色。

与真诚密切相联系，普希金抒情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然、朴素而优雅。从一个方面看，这一点是必然的，因为真和诚不可能不是自然的、朴素的；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自然的和朴素的不一定就是优雅的，但普希金却真正地把它统一在一起。这就是普希金作为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的高超之处。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诗没有奇幻的、空想的、虚伪的、怪诞的理想的东西；它整个浸透着现实。它没有给生活的面貌涂上脂粉，它只把生活本然的真实的美表现出来。”别林斯基在谈到这一点时进一步指出，普希金每首诗的情感，就其自身说，都是优美的，雅致的，它不仅是人的情感，而且是作为艺术家的人的感情。批评家还这样写道：“我们这个论断还需要佐证吗？——几乎普希金的每一首诗都可以作证。”我们姑且以下面一首诗为例：

在一本书里我发现一朵小花，  
它早已枯萎，已失去了芳香；  
于是，在我的心里  
充满了一个奇异的幻想：

它开在哪儿？什么时候？哪一个春天？  
它开得很久吗？是谁摘下来的？  
是陌生的或熟识的人的手？  
为什么会被放到这儿来？

可是为了纪念温存的相会，  
或者是为了命定的别离之情，  
还是为了纪念孤独的漫步——  
在田野的僻静处，在森林之荫？

他是否还活着？她也还活着吗？  
他们现在栖身的一角又在哪儿？  
或者他们都早已枯萎，  
正像这朵无人知道的小花？

——《小花》（1828）

这首诗以一朵被遗忘在书本的小花作为发端，引来诗人一连串“奇异的幻想”，一切都是那样自然，那样顺理成章，没有一点牵强之处；而就“幻想”的具体情境而言，既是那样朴实无华，又是那样亲切、雅致；在最后一节诗中，诗人的想象又十分自然地回到小花上来，略带惆怅的

问句使人遐想联翩，感叹不已。普希金的诗“没有一首诗不是来自于生活”，这首诗自然不会例外，因为“在一本书里发现一朵小花”的事情几乎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由此而写出诗来，就是在普希金，也不是每一生活现象都可以入诗，但他的每一首诗都是来自于生活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他从自己的心灵世界里拿出来的只是那为他所感受的、成熟的诗的幻想，这些幻想自动挣脱了出来，”于是诗就诞生了。普希金的诗不但其本身是这样自然，就连它的产生也是这样自然。这样产生出来的诗也就不可能不是十分淳朴的。用梅里美的话来说，普希金是“按自己的方式讲述平凡的事情”。别林斯基说得好：“在这一方面，可以把普希金的诗比作因感情和思想而变得炯炯有神的眼睛的美，如果您夺去使这双眼睛变得炯炯有神的感情和思想，它们只能是美丽的眼睛，却不再是神奇和秀美的眼睛了。”

不过，普希金抒情诗的“寓诗情于平凡之中”特点，这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符合诗的本质的特点，并不一定为所有读者发现、认同和理解，有些作品，其实是极为精彩的，但有些人却因为它们“仿佛是很普通的”而加以忽视，正如果戈理所指出的：“普希金的短诗——这是一个美丽的合集，他在这里表现了各个方面；而且，显然比他的长篇叙事诗所表现的更为广泛。这些短诗里有几篇是如此突出地光彩夺目，任何人都不难理解；而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作品，也就是最精彩的作品，在广大的读者看来仿佛是很普通的，可是要想理解它们，必须有异常精微的嗅觉，并且要有比只能辨识突出的和强烈的特征更高超的味觉。”果戈理还进一步指出：“这些短诗可以说是一个试金石，可以试出批评者的口味的高低和审美的情绪。”

普希金抒情诗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简洁和独特的音韵美。普希金以前的俄罗斯诗人大都写得繁散，杰尔查文等“古典主义”诗人用词过于古板，套话空话连篇，这是为他们诗歌内容的空洞所决定的，杰尔查文还算好的，但他的诗中也有不少陈词滥调；茹科夫斯基用词有些夸张，感情色彩太浓，因此显得过于细腻和缠绵；至于巴丘希科夫，则是过于华丽和雕琢了。普希金的诗从一开始就克服了上述俄罗斯诗人的这些弊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简练。这也许是和他的自然朴素之风相联系的。果戈理谈到普希金的诗时指出：“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这里只有诗；没有任何虚有其表的炫耀。一切都简朴，一切都雍容大方，一切都充满含而不露的绝不会突然宣泄而出的光彩；一切都符合纯正的诗所永远具有的言简意赅。词语不多，但是它们却能够如此准确地将所要表达的一切都表达出来。每一个词都蕴含着无极限的空间；每一个词都如同诗人一样广阔无垠。”梅里美说普希金的“诗以异常精美的形式从他最冷静的散文中生长出来”，也主要是就语言的朴素和简练而言的。但是，语言的简洁并不意味着简明，他的诗同时又是丰满的充实的深厚的。这里有一个艺术分寸感的问题。“普希金超越了过去诗家最主要的优点之一是：他的诗丰满，完整，含蓄，匀称。普希金的诗从来没有多余或不足的地方，它的一切总是那么适度，那么恰当其位。”别林斯基甚至认为这一点是普希金的诗的特性之一，其原因在于他极强的艺术分寸感。这不仅表现在诗的内容上，同时也表现在诗的语言乃至形式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对希腊艺术的借鉴。普希金的简洁，给后来



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以十分有益的影响。

至于音韵的美，普希金倒是在综合了前辈诗人的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普希金将杰尔查文诗篇所特有的准确的景色描绘和“铿锵的音响”同巴丘希科夫诗作的优美造型以及和谐，同茹科夫斯基诗作“迷人的”音乐性结合在一起。同时，成为这种综合的基础的，即正好成为普希金诗歌语言特性的，就是他的非凡的简洁和表现力。在这方面，我们从他的抒情诗的原文和译文中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不过普希金的同胞的意见是最有说服力的：“普希金的韵文，在他的独创性的诗中，显得仿佛是在俄罗斯诗史上的一个突变，和过去截然分开，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一方面是古代的雕塑的单纯，另一方面是浪漫诗歌音韵的美妙的错综，这两者在他的韵文中融和起来了。它所表现的音调的美和俄罗斯语言的力量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它像海波的絮语一样柔和、优美，像松脂一样浓厚，像闪电一样鲜明，像水晶一样透明、洁净，像春天一样芳芬，像勇士手中的剑击一样有力。”（别林斯基）

普希金的抒情诗在情调和风格上表现出来的又一特点是一种忧郁，这是一种明朗的忧郁，一种“深刻而又明亮的悲哀”。普希金的忧郁，自然与他无时不在感受和思考的社会以及个人的生活相联系。赫尔岑说，普希金的缪斯“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女神，她太富于真实感了，所以无须再寻找虚无缥缈的感情，她的不幸太多了，所以无须再虚构人工的不幸……”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忧郁与哈姆雷特式的忧郁或拜伦式的忧郁不无相通之处，也就是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忧郁。可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忧郁只是一种艺术风格，一种诗意的情调，它虽然与忧愁、哀伤乃至悲惨的生活内容相关，但它仍然主要是一种美学的或者说是一种审美的效果。换句话说，生活中的忧郁在普希金情感的熔炉中经受冶炼以后成为一种美，它远高于那种具体的、世俗的忧愁和哀伤，而且，它唤起的也不仅仅是忧郁，而是思索、力量 and 美感。我们都记得，在那首著名的《格鲁吉亚的山丘上……》中诗人歌咏的哀愁：“我忧郁而轻快，我的哀愁是明亮的。”所以别林斯基认为：“他的忧郁尽管是深沉的，却也异常光亮和透明；它消释灵魂的痛苦，治疗内心的创伤。”他的忧郁“不是哀歌式的忧郁。它甚至不是忧郁，而是受生活考验的天才在生活当中深刻观察到的严肃的思想。”别林斯基下面的这段话则更为深刻：“他笔下的忧愁往往被戏谑、嘲讽所代替，沉痛的悲伤出乎意外地转化为使人精神焕发的幽默。既不能把他只称为悲观的诗人，又不能把他只称为乐观的诗人，既不能把他仅仅称为悲剧作家，又不能把他仅仅称为喜剧作家：他全都是……”

## 第十章 南方叙事诗

普希金从南方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五六年的时间里，除了写作了大量抒情诗以外，还创作了五部长诗，即所谓“南方叙事诗”，这就是《加甫利颂》（1821）、《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切萨拉依的喷泉》（1823）和《茨冈》（1824—1827）。

和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一样，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也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

《高加索的俘虏》情节很简单：一位俄罗斯人被高加索山民抓获，一个契尔克斯女郎爱上了俘虏，偷偷地把他放走，而她自己最后投水自尽。就题材而言，这在一般浪漫主义作品中是常见的。与其说它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不如说它是在传达一种情绪和思想。按照普希金自己的看法，他是要“在这部长诗中描写一种成为19世纪青年特点的、对生活享受的漠不关心和过早的心灵衰老”。从普希金创作这部长诗的思想和境遇来看，俘虏这个人物身上有某些诗人的影子。例如俘虏的命运坎坷，他被朋友出卖，遭人诽谤，又被世俗的烦恼所困扰，这些都与初到南方的诗人的某些思想和情绪是一致的，我们把长诗中一些诗句和诗人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抒情诗比较一下就很清楚：

利禄和浮华已不屑一顾，  
奸黠的诽谤他无法容忍，  
狡猾的流言也使他厌恶，  
他已做够了惯常的牺牲，  
自然的朋友，人世的叛徒，  
他抛开自己可爱的故乡，  
怀着自由的快乐的幻想，  
飞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

……

自由！在这荒漠的人世上，  
他还在寻求的只有一个你。

我们看到，普希金差不多是把某些在自己的心中回响的声音加在了俘虏的身上。自然，俘虏并不等于诗人本人，普希金只在俘虏的身上加上了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而与这一部分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那一部分（而且是更主要的部分）却无法赋予俘虏。所以，这种从理念或主观出发的“拜伦式”方法决定了长诗主人公形象的单薄和内心世界的不完整。换句话说，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创造出的人物在表现当代现实题材方面显得有些无力。普希金后来对此有所认识。在1825年他迷恋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对拜伦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与他（指莎士比亚——笔者）相比，拜伦实在太平庸！拜伦没有写过一个有特色的人物。拜伦只是把自己性格的某一侧面赋予笔下某个人物，把傲气赋予甲，把仇恨加给乙，把忧郁写给丙等等。结果，拜伦把一种仇恨、忧郁又傲气的性格分解开来，变成几种无足轻重的个性。”俘虏形象的单薄和性格的不太明晰，看来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

不过，自然女儿——长诗中那契尔克斯女郎却是一个完美而有力的形象。她的行为和她的性格与养育她的自然是多么地和谐一致，为了爱，为了这种自然的追求她可以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愿爱情的祝福  
每时每刻与你同在。  
永别了！请忘掉我的痛苦，  
最后一次，请把手伸过来。  
……  
万籁俱寂，沉静的河岸上  
只听见凉风轻微的声音，  
而在月下哗哗的水波中  
荡起的浪圈已平复如常。

俘虏眼看着女郎为他死去却无动于衷，相形之下，他的自私和冷漠显而易见。俘虏这个人物，是后来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奥涅金和皮巧林的前驱，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确实存在，普希金的描述并非虚构。然而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来写这个人物，只能够产生浮光掠影的效果，所以后来别林斯基只是说普希金第一个指出了这样的人物，而没有说普希金描写出（更不必说是塑造出）这样的人物。

不过，普希金对自己的这部长诗的某些不足认识得比较清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首诗或故事的欠缺十分明显，所以我一再犹豫，考虑是否将它付印。由于提纲太简单，思路放不开，束缚了手脚。描绘高加索风光的那段是本诗中最好的一段，但没有同主人公的行动联系起来，近似游记文章。主人公只有两个，对他们性格的描写近似小说写法，而不是诗歌的写法。它有什么特色呢？一个没有感情的年轻人遭到不幸，这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吗？在山民的凶残本性面前，在契尔克斯少女的美貌面前，男主人公十分冷漠，无动于衷。这是可能的，但这有什么感人之处呢？用迎合环境的故事使文章变得生动，这并不困难。俘虏俄罗斯同胞的契尔克斯人可能是那位女郎的情人，她的父母和兄弟都可以写进去，而且要写得各具特色，但我却疏忽了。……您可以看出，对自己作品的偏爱并未使我失去理智，在《高加索的俘虏》这首诗中的确如此。但我向您坦白，我十分喜爱这首诗，虽然我并不清楚为什么。这首诗中有些诗句对我十分珍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已意识到长诗写法和人物之间的某些不协调，试图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去写现实中的人物，看来诗人自己并不满意，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表现当代题材的意愿，“迎合”这种浪漫主义气息很浓的场景去编织一些浪漫故事。看来，《高加索的俘虏》显示出普希金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徘徊。然而要完全告别浪漫主义，青年诗人又有些恋恋不舍，在长诗中那些抒情之笔是多么的得心应手，而那些描绘大自然的美妙诗句更是在青年诗人的心中响彻不绝：

冰封雪盖的永恒的宝座，  
它们的山峰看起来像是

白云的长练岿然不动，  
庄严伟大的厄尔布鲁士，  
双头巨人，闪着冰雪冠冕，  
白皑皑地在群山环绕中  
高高耸立在蔚蓝的天空。

……

山脚下只见乌云在弥漫，  
草原上腾起飘忽的烟尘，  
惊慌的牡鹿想寻找一个  
栖身之所，在山间乱奔。  
鹰鹫从悬崖峭壁上飞起，  
在空中盘旋，此呼彼应。  
马群的嘶鸣，牛羊的喧闹，  
已经淹没进风暴的吼声……  
突然，透过闪电，向着山谷，  
骤雨、冰雹穿云倾泻下来。  
雨水的急流翻腾着波浪，  
搜掘着峭壁、峻坡和悬崖，  
把千年古石冲向远方——

这不仅仅是长诗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高加索的大自然，更是普希金自己对高加索的感受，俘虏的心声中包含有诗人自己的心声，这就是普希金如此钟爱这部长诗的原因。

从外部情节上看，《茨冈》似乎与《高加索的俘虏》相似，它们都是在异域的背景上展开的一个俄罗斯青年与一个少数民族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的结局也大同小异，都是少女的死去和青年的离走。可是，这两部叙事长诗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普希金的创作道路的发展方向上看，《茨冈》的确如别林斯基所说，把包括《高加索的俘虏》在内的以往所有的作品“都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

在《高加索的俘虏》中，主人公的形象只是在读者的面前闪现了几下就消失了，读者甚至还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山民的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仅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示。而在《茨冈》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诗人在描述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与吉普赛少女真妃儿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把脱离自然的城市文明与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放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上加以展现，阿乐哥是前者的代表，而老茨冈则是后者的代表。并且，诗人的主观评价乃至批判精神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阿乐哥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他生活在文化较高的城市中，曾过着很富裕的生活。但由于某种原因（官府要抓他），他与他生长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发生了冲突，因而逃到南方，加入了茨冈人的流浪队伍。他对他所来自的那个社会进行了批判：

失去自由的城市令人窒息，

---

厄尔布鲁士，高加索群山的最高峰。

围墙里人们挤得熙熙攘攘，  
无法呼吸到那清晨的凉爽，  
闻不到草地上春天的气息。  
人们都出卖着意志和自由，  
以爱为耻，思想受到压迫，  
对着那死的偶像低垂着头，  
为的就是寻求金钱和枷锁。

阿乐哥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热情来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他得到了茨冈人的喜欢，得到了女主角真妃儿的爱情。他找到了新的家，能够享受到他所渴慕的自由。在茨冈人中，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两年，“没有什么可惜，也没有什么担心。”他似乎与这个新的环境融合了。

可是阿乐哥与茨冈人纯粹是表面上的融合，实际上他仍和过去一样，是私有财产制度以及自私自利本性的代表者。当普希金进一步描写阿乐哥性格的发展时，新的倾向就显露出来了。当真妃儿另有新欢时，阿乐哥感到不安、痛苦和嫉妒，他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通过这一情节，普希金揭示了阿乐哥性格中的悲剧：阿乐哥毕竟是他那个社会的产物，他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他自私自利的本性，他仅仅是为自己而幻想爱情和真正的自由，而把旁人看成是达到自己的幸福的工具，他不能尊重别人的自由。因此，阿乐哥终于和茨冈人原始的自由生活发生了冲突，成了杀人凶手。普希金通过老茨冈的口，批判了阿乐哥的极端个人主义：

你生来就不是这粗野的命，  
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  
你呀，又凶又横，——对不起啊，  
离开我们吧！祝你安宁！

所以，在长诗中，阿乐哥是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而受到裁决，而这种个人主义是同贵族地主制度和寄生文明的社会基础密切相连的。换言之，我们在这长诗中看到了普希金对当时贵族社会的深刻批判。

同时，我们在长诗中也看到了淳朴的原始民族被加以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形象。在普希金所描写的茨冈人的生活画面中，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自由的歌颂。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也指出了这种自由生活的不幸：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儿子！  
在破烂的帐篷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你们那游荡的庇身所

就是在荒野中也逃脱不了不幸。事实上，我们从长诗的画面中也可以窥见到茨冈人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这不过是流浪的自由，挨饿受冻的自由，以及两性关系上的随便结合、随便抛弃的自由。劳动创造的

自由，享受真正爱情的自由，并不在茨冈人的原始的流浪生活中。

《茨冈》吸取了人民口头创作的养料，富于浓郁的浪漫主义的戏剧性，运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习惯手法，如故事场景远离城市，原始的异国情调，茨冈人的生活环境和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也比较模糊等。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长诗的冲突是建立在比较实在的，也可以说是“现实的”的基础之上的：阿乐哥性格的形成是为他来自的那个社会所决定的，这一点十分清晰。另外，诗人在结尾处指出的“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的见解中，包含了一种历史主义因素。基于这两点，可以认为《茨冈》的问世标志着普希金的创作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 第十一章 《鲍里斯·戈都诺夫》

1824年春天，普希金告诉尼古拉·拉耶夫斯基，他准备写一部悲剧。1825年10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朋友，请看一下我最近写的一出浪漫诗剧，主人公是鲍里斯·戈都诺夫。剧本写完之后，我自己高声朗读了一遍，乐得我击掌自庆。我喊道：‘真棒，普希金！……’”

《鲍里斯·戈都诺夫》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幽居在乡村的普希金在进一步接近了人民之后，深感十二月党人运动脱离人民的致命弱点，他试图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中，寻求对当代问题的回答，探索解放运动的动力是什么，人民到底应往何处？作品就是这种探索的回答。

作品取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波兰贵族利用傀儡德米特里一世进占莫斯科为皇的历史事件，中心内容是描写冒名为皇者的格里戈利（楚陀夫修道院的年轻的僧侣）和沙皇鲍里斯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

1589年，伊凡雷帝之子沙皇费陀尔去世，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费陀尔无子，其弟季米特里早年被人杀害。于是费陀尔的妻舅鲍里斯·戈都诺夫登上皇位，继续施行扶植地主的政策，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时，四处流传着季米特里为戈都诺夫谋害的谣言。戈都诺夫坐卧不安，经常梦见季米特里。

莫斯科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小僧，由于忍受不了修道院的寂寞，想出一个大胆的计谋，他逃离出修道院，冒充季米特里，利用想侵略俄国的波兰王，向俄国进攻。

戈都诺夫得知假季米特里出现后，非常惊惶。假季米特里在波兰王的支持下攻入俄国境内，但在初次交锋时失利。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戈都诺夫虽兵强马壮，但他有失于民，特别是他无法战胜所谓“王子”复国的流言，而假王子季米特里一路势如破竹。1605年，冒名皇者胜利进入莫斯科，人民纷纷前来迎接，戈都诺夫服毒自尽。

作品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在戏剧性的冲突中，特别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人民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表现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具备的历史感。他不像古典主义作家那样注目于皇统，也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强调人物之间的性格斗争，而是透过历史事件，透过中央集权与分封贵族的矛盾，得出了“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因素”，“人民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现实主义的论断。

全剧的情节中心虽然在冒名皇者与沙皇鲍里斯之间的争权夺利上，但并未停留在单纯的个人权力的得失上，而突出了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斗争的双方都想得到人民的拥护，都想在人民的公意中为自己寻找支持。作品以此证明人民群众在社会斗争中确实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证明普希金比当时的十二月党人有着更高的民主主义思想。从表层的戏剧冲突看，主角是假冒皇者和沙皇鲍里斯，但真正的主角却是人民。

在第一场戏里，大贵族伏罗敦斯基的一段说白，以及以后许多情节，都证明分封的贵族已丧失独立地位，丧失旧日固有的封建道德准则。人民完全掌握在鲍里斯手里。诗人借他喜爱的人物普希金公爵的口，指出这并非鲍里斯的统治术的高明，而是因为他豢养了大批密探，无情地镇

压敢于抗命的分封贵族。当然，大贵族也从专制的中央集权那里得到了实惠，即可以当宫廷贵族和朝臣大官。鲍里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需要使用非名门贵族的能臣。当巴斯马诺夫受命统帅陆军时，鲍里斯说：“让贵族们为逝去的名门特权而悲哀吧。现在应该轻视名门的不平之鸣，取消这种恶劣的陈规陋习。”尽管分封贵族和中央集权的沙皇的矛盾无可调和，而使分封贵族倒戈转而拥护假季米特里的原因却如普希金公爵这个诗人的祖先所说的：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  
而是公意——是的，  
人民的公意。

诗人在悲剧中广泛地描写了群众的集会，写了各式各样的普通人，有疯僧、乞丐、逃跑的农奴、哥萨克、老妇人、小孩等。写了百姓反鲍里斯的情绪或对谁当沙皇都不关心的漠然态度。尤其是直接写了假季米特里虽在军事上溃败了，却由于人民的拥戴，很快又聚起了力量，整顿了闻风归顺的人，组成向莫斯科进军的队伍。诗人以悲剧的全部形象体系，指出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力量。

当然，普希金也历史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不成熟。例如他们常常是一群乌合之众，对沙皇抱有幻想，在斗争中经常被人利用，到头来仍然不能改变受奴役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艺术地表现了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的过程。悲剧是以这样的情节作结的：

公民们，玛丽娅·戈都诺娃和他儿子已经服毒自尽，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人们一时恐惧，无人吱声)你们为什么默不作声？请高声呼叫：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沙皇万岁！（大家依旧默不作声）假冒皇者要求人们高呼万岁，众百姓却沉默不语。这虽还不能说明人民群众在当时真正认清了统治者的真面目，却也证明诗人对人民是寄予厚望的。

作品的情节是极富于戏剧性的，虽说它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经过悲剧诗人的精心设计和巧妙处理，在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取得了无以伦比的戏剧效果。

戈都诺夫为了夺取国家的权力，欺骗了人民，而现在却是一报还一报，另一个骗子要来欺骗他，两个骗子，两句谎言，扭成了剧本的“结”。而悲剧诗人在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也就是在两个骗子格杀的时候，把人民不知不觉地推到了前台。

作为剧本的中心人物，戈都诺夫的性格是丰满的，多面的。

戈都诺夫在外面是个凶残的暴君，狡猾的阴谋家，但在家中对待儿女态度温和，一点也不像杀人的凶手，而是一位面色略带忧郁的好父亲。这一点正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相似，是一个多面性格的统一体，是

---

夏洛克和麦克白都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前者是著名的吝啬鬼的形象，后者是著名的野心家的形象。



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普希金真实地展露出这个“麦克白\_\_”的内心世界，在假冒皇者出现后，戈都诺夫便惶惶不可终日：

啊，我窒息难忍，胸口发胀，  
放开我，让我恢复正常！  
热血全部涌到了脸上，  
然后再回到身上。  
为什么十三年来，  
被害的儿童经常进入我的梦乡？  
对，对，正是如此，我明白了。  
可是，这个对头到底是什么模样？  
是谁的身影一直徘徊在我的身旁？

而另一个骗子（假冒皇者）也并非心安理得，他也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并且，这种矛盾的“结”又因爱情的“情结”的卷入而“结上加结”、“难分难解”了。

普希金借用一块“试金石”让假冒皇者经受种种心理的冲突和考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戏剧性和人物的性格。这块“试金石”就是美丽、高傲而又野心勃勃的玛丽娜小姐。假冒皇者爱上了她，但她却看不上这个“王子”，但为了实现她当皇后的野心，她还是决定追随“王子”。可这个“假王子”为了爱情，却不想欺骗他所钟情的女子，而想对她袒露真情：

不要折磨我，玛丽娜，我的美人儿，  
请不要说，你爱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地位。  
我在你面前感到幸运，  
你这种话会把我的心撕碎。  
怎么？假如万一……噢，可恶的恐惧心理。  
请告诉我，  
假如我的出身并不高贵，  
假如我并非沙皇伊凡的儿子，  
即被世人遗忘多年的那个孩子，  
那，你照样爱我，是不是？

但这个美人儿回答道：

你肯定是季米特里，  
不会是别人，  
我们喜爱的正是你。

骗子继续说道：

不，这件事情太离奇！  
我不能去同尸体辩理，

我不能继续伪装下去，  
我要对你讲出全部真理。  
听我告诉你，  
季米特里早已死去，  
已经埋入地下，不会重返人世。  
难道你不想知道我是谁？  
请你记住，我是个僧侣，  
因为厌倦寺院生活，刚刚返回凡尘。

.....

玛丽娜，我本不该欺骗你，  
因为你是我心中美丽的化身，  
每句谎言对你都是犯罪，  
然而，盲目和嫉妒的爱情，  
迫使我讲出了真情。

然而高傲的女子却不肯让步，骗子又一改脸孔：

我是沙皇的儿子，  
匍匐在高傲的波兰女郎脚下，我十分羞愧。  
永别了，  
一场血腥的战争和对命运的忧虑，  
会使我很快忘记失恋后的苦闷.....

玛丽娜受到侮辱，她要去揭露事情的真相：

假如我不及时揭开你的真面目，你的谎言是否会叫所有相信你的  
人感到耻辱？

于是温存的爱情被凶狠的威胁所代替：

你想干什么？是想让我怕你？  
你相信哪一位？是风流的波兰女子，  
还是俄罗斯沙皇的儿子？  
你可知道，国王、教皇和大臣，  
都没有被我的谎言所蒙蔽。  
我是不是季米特里，对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他们争斗和打仗的工具，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请记住，你这个叛臣逆子，  
他们有办法叫你闭嘴！

玛丽娜口气软了，爱情在野心面前屈服：

请别走，沙皇的儿子，

你已不再是孩子，而是一个成年男子，  
时候不早了，清醒吧，别误事！  
快率领士卒向莫斯科进军，  
占领克里姆林宫，登上王位，  
然后再给我写求婚信。

普希金在这场人性和野心的搏斗中展现出了多么复杂而又真实的生活、多么丰富的性格啊！

如同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一样，《鲍里斯·戈都诺夫》有些特点对于俄罗斯戏剧来说是具有全新的意义。普希金打破了宫廷悲剧的古典主义的陈套，创造出人民的悲剧。而这首先与普希金对于戏剧特别是悲剧的观念相关。

普希金写道：“悲剧的含义是什么？目的又在哪里？个人同人民，个人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所以，虽然拉辛的悲剧形式不够丰富，但他仍是个伟人；莎士比亚亦是如此，虽然他的剧本不够规范，有疏忽之处，唱词也不够理想，但莎士比亚仍旧是个伟人。

“悲剧作家需要哪些素质呢？哲理、公正、具有历史学家的政治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对自己心爱的事物不抱成见和自由的创作环境。

“我们认为，真实是悲剧的第一条原则和根本。

“环境的逼真和对话的真实，这是写剧本的真正法则。”

普希金正是在自己的剧作中贯彻了上述见解，其核心是真实。换句话说，普希金从叙事长诗的领域走进戏剧园地时，已俨然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了。

在回答友人关于这部剧作的性质的询问时，普希金这样回答：“您问我：您的剧本是性格剧本还是服装剧本？我选择了最省力的形式，但我将设法将二者结合起来。……这种写作方法是一种全新的方法。”普希金的剧本是综合了莎士比亚和拉辛剧作的特点。在自由的舞台和众多的群众场面这些特点上，是莎士比亚式的手法。而在人物性格设计方面，却吸取了拉辛的艺术经验。如果再联系到这部作品的深刻的历史感，我们说《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一部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也并不过分。

剧本的人物性格丰满，没有古典主义类型化毛病。

普希金曾多次说过，无论是莫里哀也好，还是拜伦也好，他们都只是理解和创造一种性格，在创造性格上，普希金非常欣赏莎士比亚，他说：“莫里哀的守财奴只不过是吝啬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既吝啬，同时又灵敏，机智，报复心重，而且爱子女。”他认为悲剧作家拜伦在莎士比亚面前是渺小的，这是因为浪漫主义者拜伦的人物缺乏多面性和丰富性（尽管他对拜伦十分敬仰）。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性格的单一性，而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丰富性。从多方面去表现性格，这正是现实主义的标记。

作品在语言上也很有特点：人物的语言符合自己的身份，富于个性

化，既没有古典主义的套话，也很少浪漫主义的华丽词藻。这方面也体现出莎士比亚的特点，普希金是这样谈莎士比亚的语言的：“请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从不担心自由交谈会损伤主人公的形象。他总是让主人公随心所欲地交谈。因为他知道，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总可以找到符合主人公个性的语言的。”

此外，在戏剧的结构上，普希金也作了许多改革，他摒弃了古典主义戏剧的分幕法，不把悲剧分成五幕，却写了 23 个不大的场景，把悲剧和喜剧的样式混合在这些场景之中。同时他否定了“三一律”，使剧情的发展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作品的时间跨度很大，明亮的大厅和昏暗的小屋交替出现。普希金也没有人为地把中心人物突出出来，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强调一下而已。在剧本中我们看的时而是中心人物，时而是全体人物出场。风格也随剧情的需要而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格式，贵族的语言和平民的语言并用，韵文和散文并重，并且用五音步抑扬格的诗体代替传统的“亚历山大体”即所谓六音步抑扬格。从表面看来，剧本似乎有点杂乱，但实则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每个人，每张面孔，每句话都有其特定的作用，缺一不可。

别林斯基后来这样评论：“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依然挺立在众多的‘俄罗斯悲剧’之林，犹如鹤立鸡群。他的笔法十分纯正，语言简练、典范，同其他人的剧作相比，真是小人国里的巨人。”

## 第十二章 “我不会不参加的！”

1825年年底，当俄罗斯即将走完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時候，这个国家陷入了动荡。

11月7日，当普希金的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落下最后的帷幕，剧中的沙皇倒地身亡时，现实中的沙皇已经奄奄一息了。

12天以后，即11月19日，流放普希金的亚历山大一世病死于俄国海港城市塔干罗格。

在专制的俄罗斯，沙皇的逝世总是最大的政治事件。在这以前，有三位沙皇先后“驾崩”，都导致国家的大政方针的重大变化。消息在月底传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普希金十分高兴。沙皇的猝死，点燃了他心底的自由的火种，他似乎觉得他的命运会有所改变。

12月初，普希金打算秘密回到彼得堡去。他先打算化名冒充一个与他模样相像的农民出发，后又考虑到这样做可能会给邻村的女主人招来麻烦，便放弃了这一打算。后来，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又萌发了去彼得堡的念头。11日，他决定动身，当他去三山村辞行时，有只野兔从他面前穿过。而在回来的时候，又有一只野兔在他面前跳个不停。据说，在俄罗斯，兔子出现是不祥之兆。也许是老奶妈的故事里的神秘气氛影响了普希金，也许是缪斯的暗示，使得他当时有一种不祥之感而最终未能成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看，普希金的“撤退”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他哪里知道，在首都一场比沙皇“驾崩”的消息更猛烈的风暴正在酝酿、生成，而普希金此次一旦成行，必将要卷入这场风暴。从结果上看，也许俄罗斯历史上会多一位英雄，然而俄罗斯文学也许就要失去自己的“太阳”，那样，19世纪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格局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真是难以预料！

为了消磨这乡间的难捱的日子，普希金决定利用临近的诺沃尔县发生的一件“诱骗事件”的素材，写一部诙谐作品。12月13日和14日，当普希金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一间烟气腾腾的房间静下心来写成这部后来定名为《努林伯爵》的长诗时，彼得堡却是一片血气：

一方面，老沙皇已死，新沙皇未定，权力出现真空，人心惶惶不宁。其实，按照俄国的法律和教规，亚历山大死后，应由康斯坦丁继位而不应是其弟尼古拉登基，但自古以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大有人在，康斯坦丁找了个波兰女子为妻，住在华沙不肯回国当皇帝，而要弟弟为皇。可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宗教情绪极浓，教民不愿违反教规而拥戴尼古拉。此外，军队也不支持尼古拉。于是，亚历山大一世死后近一个月，沙皇继承人一事仍悬而未决。最后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了眉目：尼古拉定于12月14日宣誓登基。

另一方面，北方和南方的十二月党人此时正在策划一场武装暴动，也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3日夜晩，十二月党人的骨干分子在首领雷列耶夫家中开会（而雷列耶夫正是普希金要到彼得堡拜访的人），与会者中有许多就是普希金的同学和朋友，如别斯土舍夫、普希钦、丘赫尔别凯、奥陀耶夫斯基等等。会上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尼古拉一世，不成功便成仁。雷列耶夫说：“成功的可能很小，但也应试一试，这次

试验将为后人做出榜样，迟早定会有所收获……宁可在现场被捕，也不能死在自己床头。”

第二天，也就是 1825 年 12 月 14 日，当尼古拉一世准备对东正教主教会议成员宣誓登基时，警报传入冬宫，称莫斯科驻军军官禁止士兵向新沙皇尼古拉宣誓，称康斯坦丁被尼古拉关进了监狱，并包围了上议院广场，其他的参加起义的士兵正陆续到达。起义者高呼：“康斯坦丁万岁！宪法万岁！”其实，一些士兵还以为他们所呼喊的“宪法”是康斯坦丁的妻子。

大臣米洛拉多维奇伯爵想劝阻起义者，但被起义者的头领卡霍夫斯基的手枪击中，落于马下。此时，几支效忠于皇室的军队赶到，与起义者形成对垒。起义者组织不力，又缺乏“粮草”，时值寒冬腊月，饥寒交加，军心动摇。下午三点，对垒之势被打破，尼古拉一世下令骑兵向起义者发动攻击，并下令开炮，起义者队伍大乱，士兵们再也不听头领的命令，争相逃命。他们想从涅瓦河的薄冰上逃到对岸去，但人多冰薄，冰层开裂，大多数人都掉进冰河中淹死。入暮时分，战斗已平息，冬宫四周躺卧着一具具尸体，起义者的头领也差不多都被抓获。

12 月 14 日至 15 日夜间，尼古拉一世亲自逐一审讯起义者的首领，他软硬兼施，两面三刀，像一个演员一样施展他的表演天才：他答应给雷列耶夫的家属 2 000 卢布，换得雷列耶夫的口供；他对卡霍夫斯基痛哭流涕，称这是为了俄国的不幸；他允诺给奥波连斯基的父亲写信，从而赢得这个年轻军官的好感；他答应原谅别斯土舍夫，但要后者答应今后要效忠皇室，可遭到拒绝。尼古拉一世后来对普希金也是这样软硬兼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竭尽“表演”之能事。1855 年，尼古拉一世“驾崩”，诗人丘特切夫为这个沙皇写了一首“墓志铭”：

你没有为上帝也没有为俄罗斯服务过，  
你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  
你的全部作为，无论善事还是恶行，  
全都是谎言，全都是空虚的幻影，  
你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优伶。

在多次审讯之后，公布了判决的结果：121 名被告几乎都是贵族，雷列耶夫、彼斯杰尔、别斯土舍夫、卡霍夫斯基和姆拉维耶夫-阿勃斯杜尔等 5 名起义者首领被判死刑，其余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

普希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起义，但在许多起义者的身上都搜出普希金的诗稿，而沙皇尼古拉在一些“要犯”的审讯中和交代材料中，不断地听到和见到普希金的名字：

别斯土舍夫说：“我是在读了普希金的一些手抄诗后产生自由思想的，如《自由颂》《乡村》《我的阿波罗》，还有几首讽刺诗，就是曾让普希金吃过苦头的那几首。”

迪沃夫称：“我的自由思想是从某些作品中得来的，特别是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的颠覆诗。”

斯坦吉尔则写道：“在有文化的青年人当中，谁没有读过、又有谁不赞赏普希金的自由诗歌呢？”

一份密探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看到著名的普希金，大家都吃了一惊。他的颠覆思想众所周知，可为什么在审讯案件时，他却能逍遥法外呢？”

而在这时，警方在莫斯科发现一首题名为《十二月十四日》的诗，内容是谩骂沙皇和宪兵头子本肯多夫的，据查，这是普希金的诗，在这样的时候，普希金竟敢这样写：

我们推翻了国王，  
但却推举凶手成为皇上，  
让刽子手们称王称霸，  
这是多大的耻辱，何等的荒唐！

这首诗的确是普希金所写，但与眼前的事件无关，它是普希金以前的诗作《安德烈·谢尼埃》中的一段，是写法国革命的。但当时这首诗的出处并未真正弄清，所以给尼古拉一世的印象太深。新沙皇除了“表演”天才以外，还有些骑士心理，因此他想亲自见见普希金，亲口盘问他几句，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置他。于是，尼古拉下令召见普希金。

1926年9月8日，普希金从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被带到莫斯科，下午四时，他又被带到克里姆林宫沙皇的书房。

此时，诗人的心情有些紧张，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不过，他也做好了精神准备，一旦沙皇要威胁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决不屈服，他就把他随身所带的一首他预先准备好的诗交给沙皇，然后转身就走，这首名为《先知》的诗是这样写的：

俄罗斯的先知，挺起了腰，  
在可恶的刽子手面前，  
穿上耻辱的祭袍，  
脖子上套根绳套。

普希金走进书房，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壁炉前，他的脸丰满、白净，目光炯炯有神。据说，尼古拉一世长得十分英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他的美好的长相和他的残酷的作为实在太不相称。此时，新沙皇在仔细打量面前的这位著名诗人，看到他一副衣冠不整的狼狈样子，尼古拉一世不免感到好笑，他首先发话：“你好，普希金！能返回首都你高兴吗？”

普希金为皇上一口纯正、洪亮的声音感到惊讶，还未等到他回话，尼古拉又继续说道：“已故的沙皇、我的兄长将你流放到乡村。但我，只要你不再写反政府的作品，我决定赦免你。”

普希金回答道：“陛下，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反政府的诗歌了，可以说，从《匕首》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沙皇：“在被我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当中，听说有不少人是你的朋友？”

普希金：“是的，陛下，我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很要好，我敬仰过他们，至今依然如此。”

沙皇：“你怎么会喜欢丘赫尔别凯这样的流氓呢？”

普希金：“您把他当作疯子，我感到惊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都是聪慧和善于思考的人。”

尼古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也许是他很少听到如此直率而大胆的言谈的缘故，此刻他甚至觉得普希金很可爱，于是变换了一个话题，他问普希金：“你最近写了什么？”

普希金：“什么也没有写，陛下，审查得太严了。”

沙皇：“你为什么要写审查通不过的东西呢？”

普希金：“有许多无辜的作品在审查时被扣压。所以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沙皇走近了桌子，从纸堆里翻出了《十二月十四日》那首诗的副本。此时，普希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一口气向沙皇叙述了这首诗选于他的未能出版的《安德烈·谢尼埃》一诗，诗中提到的是法国恐怖分子。尼古拉对普希金的这一解释似乎很满意，脸上再一次露出了微笑，他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想看看普希金会怎么回答：“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会参加12月14日的暴动吗？”

普希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回答道：“毫无疑问，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不会不参加的。我之所以没参加，只是因为我当时不在彼得堡。”

这一大胆的回答并未激怒沙皇，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沙皇感到普希金是把他看成可信任的大人物才这样毫无顾忌地讲实话。他感到这位诗人的性格确实特别，在社会上影响又大，能不能利用他来为皇室服务呢？况且，他马上就要举行加冕，要制造一种温和的社会气氛。于是，沙皇把自己的白嫩的手伸向了普希金，对诗人说：“你做了不少蠢事，希望你今后能聪明起来。我们不要再争吵了，你把所写的诗稿都寄给我，今后我就是你的检查官。”

当天晚上，在法国大使举行的舞会上，尼古拉一世宣布：“今天，我和俄国最聪明的人普希金谈了很久。……”

这样，普希金便获得了自由，可以回到莫斯科了。

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成为社会上最大的新闻。他是9月8日回到莫斯科的，10日就在朋友家朗诵他的作品。12日他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古希腊喜剧，他刚一出现，就成为剧院的中心，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位被流放过的诗人身上。一位同时代作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剧场里尽是大臣、军人、文官和外交官，还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名流及显赫人物。普希金走进剧场时……整个剧场一片喧哗。大家不停地重复他的名字，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被他所吸引。散场时，有一群人围住了他。人们在远处就认出了他，因为他的浅色帽子很容易辨认。那时他的声望处于鼎盛时期。”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记述了普希金走在大街上的情景：“密密麻麻的人群陪着诗人，有些人还欣喜若狂地喊道：‘让我们看看他，让我们看看他！’”

10月12日，是普希金回莫斯科后第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普希金要在维涅维季诺夫家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从一大早，就有许



多人聚集在这里，仿佛是用来参加音乐会或听讲座，盛况空前。中午时分，普希金出现在客厅里，他穿戴整洁，神情庄重，用悦耳的声音开始了朗诵，我们援引一位当年在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的回忆来描述当年激动人心的情景：

我对那天的朗诵会的情景难以言表。如今，尽管40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但每当想起那次朗诵会，我仍然感到热血沸腾。当时，我们期待这位艺术大师早日出现。我们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走进来，确切说是个比较矮小的人。他长发鬃曲，甩向脑后，目光炯炯有神，反应敏捷。他好动，手势急剧而不连贯，声音十分悦耳。他身穿黑色燕尾服，里面是件深色背心，领带系得有些漫不经心……起初，人们安静地听着，或者说有些惊讶。但渐渐地人们的印象越来越强烈。僧侣的故事和格利戈里的情节使大家惊愕。有的人身上发热，有的起鸡皮疙瘩。人们怒发冲冠，难以自制。有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有的发出叫声，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则在微笑。诗终于读完了，先是一片寂静，然后是一片掌声。我们相互注视，然后涌向普希金。数不清的拥抱、笑声、叫声、眼泪和恭维话，连成一片……香槟酒送来了，普希金看到他的诗歌能被那么多的有文化的年轻人所理解，无比激动……我忘记当时是怎样告别、怎样回去睡觉的情景了。但那天夜里很少有人能入睡，因为我们的机体都被他的诗歌所震撼。

刚刚回到首都和文学界的普希金似乎生活得很开心，他出席各种欢迎会，到处朗诵自己的作品，此间普希金在莫斯科结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他们相处得很好，都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可他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呢？

这样的自由的日子并不长久，当宪兵头子本肯多夫得知普希金常常在莫斯科的沙龙里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时，立刻进行干预。他告诉普希金，他的任何作品在皇上未批准之前不得发表或在公众中朗诵。这样，普希金只好把他的悲剧交上去审查。此外，对那首被人加上《十二月十四日》的题名的诗的审查又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诗人。此时，普希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处在沙皇的直接监视之中。

### 第十三章 唱着颂歌的阿里昂

1826年12月26日，身处沙皇直接监视之下的普希金在莫斯科经历了一次不平常的会见：在沃尔康斯卡娅家他遇见了南方克里米亚之行的旅伴——拉耶夫斯基将军之女玛丽亚·拉耶夫斯卡娅，在流放到南方的初期，诗人曾暗自深深地爱过这位少女。玛丽亚后来按照父亲的意愿，嫁给了谢尔盖·沃尔康斯基公爵。公爵的年龄差不多是她的一倍，玛丽亚并不爱他。但是，当这位十二月党人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作为一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玛丽娅不顾父亲的反对、兄长的劝阻和亲人的威胁，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和孩子，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生活。望着这位自己深深爱过的女子，想起他们一起在南方度过的快乐的日子，普希金不禁感慨万端：人的命运是多么不可预测啊！几年前，这个天真的少女还和他一起在南方的夏夜，对着满天的星斗，兴致勃勃地数着星星，给星星命名，而如今，她却迈出了这样勇敢的一步，明天就要奔赴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普希金紧握着玛丽娅发烫的小手，口中不断地喃喃自语，仿佛一些诗句就要从他的口中蹦出。他告诉她，他最近为西伯利亚的苦役犯写了一首诗。几天后，当另一位十二月党人尼·穆拉维约夫的妻子也要去“千里寻夫”时，普希金请她把一首诗带到流放地，这就是著名的《寄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坑中，  
你们要坚持高傲的忍耐。  
你们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落空。

不幸的忠贞的姐妹——希望  
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潜行，  
它将唤醒你们的刚毅和欢欣，  
那盼望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爱情和友谊将会穿过  
幽暗的铁门向你们传送，  
就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到你们的苦役的黑洞。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交到你们手上。

这首充满着友情、理解、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心的诗，令人想起诗人在1818年写的那首《致察尔达耶夫》，也可以说这两首诗是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中的姊妹篇。它给那些在“深深的矿坑中”受难的革命志士以巨大的鼓舞。十二月党人诗人奥陀耶夫斯基写了一首诗来回答普希金，诗中有这样两句：

我们悲惨的事业不会落空：  
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

列宁在 1900 年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上，曾用“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作为刊头题词。这句著名的诗在中国也有译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827 年 7 月 16 日，这一天是十二月党人的五位领袖被沙皇政府处决一周年的纪念日。处在专制政府直接监视之下的诗人，不能公开地表达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对共同事业的忠诚，于是使用隐喻的手法写了一首诗《阿里昂》：

我们很多人一同坐在木船上，  
有些人紧拉着帆，  
另一些人同心协力地  
摇动着插在深水里的桨。  
我们聪明的舵手，在寂静中倚着舵，  
一声不响地驾驶着满载的船；  
而我——充满着毫无忧虑的信心，  
在向水手们歌唱……  
突然间，喧嚣的旋风狂袭过来，  
皱起波涛的胸膛……  
舵手死了，水手也死了——  
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  
被暴风雨扔到海岸上。  
我一边唱着往日的颂歌，  
一边把我潮湿的衣裳，  
晾晒在太阳下的岩石旁。

阿里昂传说是公元前 7 至 6 世纪古希腊的一位诗人和音乐家，一次他带了许多财宝从意大利乘船到科林斯去，在途中水手要抢掠他的财宝，还准备把他推入大海。阿里昂请求再让他唱一首歌，然后便跳入大海自尽。可海豚听了他的歌声，深受感动，便把阿里昂接住，并一直送他到岸边。普希金在诗中以阿里昂自况，水手指十二月党人，而舵手则是指五位起义者领袖中的诗人雷列耶夫。起义爆发时，普希金正被流放在米哈洛夫斯克村，因此才幸免于难，也就是诗中所说的“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可诗人不能够忘记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更不会放弃他们曾一道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仍一如既往地“唱着往日的颂歌”，晾干衣服，继续奋斗。

写完《阿里昂》之后，普希金离开了莫斯科，又回到了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如今，虽说他已经获得了自由，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气氛实在令他感到窒息。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后，他的大部分好友都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还留在京都的朋友寥寥无几，再加上当局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来骚扰他，使他不得安宁，无法静心写作。他宁愿躲到这僻静的乡间，

听任缪斯抚慰他的心灵。这时他开始构思和写作一部散文作品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按照普希金的构想，这部长篇小说以诗人的外曾祖父这一传奇式人物不平凡的命运为线索，展示彼得大帝这位改革者在那个时代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描画出当时的时代风貌。从普希金准备给这部作品加上的题词——“彼得用钢铁意志改造了的俄罗斯”来看，政治改革的主题是长篇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如何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入文学，普希金在戏剧这种形式中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鲍里斯·戈都诺夫》就证明了诗人的非凡才华。而现在普希金要用长篇小说来表现历史人物，这可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须知在当时的俄国，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就是在欧洲，现实主义的长篇叙事作品也未真正出现。据普希金对一位同时代人透露，他这部作品的“主要引子，写的是黑奴的妻子不贞，给他生了个白小孩，因此被送进修道院。”从这样一个构思出发，联系到普希金关于作品主题的设想，可以看出普希金是在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写作方法的基础上来创作的。由此也可以预示他未来的散文作品的路子。不过，非常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篇小说没有最后完成，只写了六章。仅从这六章来看，可以推想作品是一部非凡之作。要不是诗人后来死于非命，而最终把这部作品完成的话，说不定俄罗斯小说史乃至整个欧洲的小说史的格局都要重新规划了。

10月中旬，普希金离开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在去彼得堡途中的一个驿站上，他突然发现席勒的一篇故事，于是便打开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正在这时，窗前响起了官府的车马声，普希金后来这样回忆道：“我刚读几页，一名警官护送的四辆三套马车来到了驿站。我出去一看，见一名囚犯靠柱子站立着。这是个年轻人，身材高大，脸色苍白，消瘦，一把黑胡子……突然，年轻人向我投来一个热切的目光，我情不自禁地转向他。我们相互长时间地打量着……我认出了他，原来是老同学丘赫尔别凯。我们相互拥抱在一起。宪兵把我们分开，警官抓着我的胳膊，威胁和辱骂我。但我都当做没有听见。丘赫尔别凯昏倒了。宪兵给了他一点水，把他架上马车，车队又出发了。”

普希金望着远去的囚车，不禁悲痛欲绝。这位皇村中学的同窗好友，如今成了一个国家“要犯”，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正是普希金在诗歌中热情鼓吹的，他现在正走向那黑暗潮湿的地堡，而普希金却还算是“自由之躯”。此刻，普希金也许在想：“本来我也应该……”此刻，他为自己接受了沙皇的“赦免”而感到羞愧。两年以后，丘赫尔别凯在监狱里写信说道，他很奇怪，他那么一副模样普希金竟还能把他认出来。另外，据押车的士兵报告，普希金曾打算交一笔钱给这个囚犯使用，但遭到拒绝。

几天后，即1827年10月19日，普希金在纪念皇村中学校庆日的诗中写道：

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朋友，  
安然度过风暴和日常的忧愁，  
无论在异乡或荒凉的海角，

或是在人间幽暗的地牢！

这最后一行诗显然是献给丘赫尔别凯和普希金的。

这段时间，普希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在老朋友中，值得一提的是与著名的《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的会见，他们已有十余年未见面了。格里鲍耶陀夫是俄国驻波斯的外交官，这次因公务回国，普希金才得以和他见面。两位老朋友都非常激动，谈的最多的还是各自的创作情况。两个朋友都喜欢音乐，与年轻的音乐家格林卡都是至交。格林卡根据格里鲍耶陀夫提供的一支格鲁吉亚歌曲的旋律，谱成一支钢琴曲，普希金很喜欢这个曲子，特意按照曲调，写下这样的诗句：

美人啊，那格鲁吉亚的歌  
请别在我面前吟唱，  
那忧郁的歌使我想起了  
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地方。

啊，你的残酷的曲调  
使我的记忆浮起了  
草原和黑夜——在月光下  
那遥远的可怜的少女的容貌……  
看见了你，我就忘记了  
那可爱的、磨人的幻影，  
然而你唱起来——那影子  
就又呈现在我的脑中。

美人啊，那格鲁吉亚的歌  
请别在我面前吟唱，  
那忧郁的歌使我想起了  
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地方。

这就是由格里鲍耶陀夫、格林卡和普希金共同创作的俄罗斯最杰出的浪漫曲之一。诗中所写到的“那遥远的可怜的少女”是指不久前随丈夫去西伯利亚的拉耶夫斯卡娅。

在诗人新结识的朋友当中，值得一书的是叶丽扎维塔·希特罗沃，她是库图佐夫元帅的女儿，交际广泛，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知识。据说是她向普希金提供了司汤达的创作，并为诗人弄到了长篇小说《红与黑》，从而使普希金了解到欧洲最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动态。普希金读了《红与黑》后，对司汤达的才华赞叹不已。

1828年7月31日，普希金的老奶妈不幸病逝。这位农奴妇女的离去，使诗人异常悲痛。她的葬礼十分简单，她的墓前也没有留下墓志铭，可是她的姓名——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将与普希金的名字乃至俄罗斯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一年夏天，当普希金正“沉醉于彼得堡繁忙的社交生活”时，他

丝毫没有想到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他的头上。8月，他接到通知，要他去见彼得堡总督。这不禁使他想起8年前他也是被这个总督传见的情景，那次传见之后，他被流放到南方……而这一次，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

他走进米洛拉多维奇的办公室，这位总督脸色阴沉，他手举一份文件，以严厉的口吻对普希金称他是“遵从皇上的旨意”来讯问他：有一篇题为《加甫利颂》的长诗，是不是他写的？

普希金沉默了片刻，断然否认他是这部长诗的作者，只承认他在皇村中学时曾把这部长诗亲笔手抄过一份。

过了两个星期，普希金又被总督传见，总督声称：“皇帝陛下要我询问，您在1815年或1816年，在皇村中学是从谁的手中得到长诗《加甫利颂》的。如您能够找到作者，此事便与您无关，要知道社会上有大量手抄稿是以您的名字到处流传。”

普希金心里十分清楚，尼古拉一世不相信他第一次供词，但此时他也无法再改口，只得写下如下含糊其词的供词：“这份手稿曾在骠骑兵军官中流传，但我已记不得是从谁的手中弄到手稿的。我抄的那份大约在1820年就烧掉了。”

《加甫利颂》是普希金在1821年4月写成的，即在复活节前和复活节中写成，作品充满反教会的情绪和精神，它揶揄了圣经中关于圣母纯净受孕和亚当及夏娃被逐出乐园的故事。作品以手抄本广为流行，尤其是得到十二月党人的欢迎。1826年，在沙皇政府追捕十二月党人时，警察机关就收到对这部作品的密告，称它为“叛逆的诗”，在社会中传播了“叛逆的火种”。但这一密告当时未得到重视。1828年，发生了“退伍大尉米契诶夫诵读《加甫利颂》败坏其奴仆的宗教观念”的轰动一时的事件，为此，尼古拉一世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事。于是很自然地牵涉到了普希金。《加甫利颂》的正式出版，是在1861年的英国。在俄国，1908年经大量删节后出版。十月革命后，《加甫利颂》才得以全文发表。

尼古拉一世执意要查清事情的原委。他先后两次接到普希金的“抵赖”的供词，很不满意，下令第三次传见普希金。在这种情况下，普希金便直接写信沙皇，承认是他写了《加甫利颂》。

又像上次那样，沙皇“赦免”了普希金。

而普希金则深深地感到，他已被专制政权牢牢地控制住，动弹不得，他惟一可做的就是用他的诗篇来控诉专制制度的残暴。在交代《加甫利颂》的供词的草稿上，诗人满含着悲愤，写下了抗议专制政权的著名的诗篇《毒树》：

在枯干而贫瘠荒原上，  
酷热灼烤着泥土的地面，  
一棵毒树，像森严的守卫  
傲然独立于天地间。

连小鸟都不朝向它飞，  
虎也不来——只有旋风  
有时朝这死亡之树猛吹，

然后跑开，但已染上疫症。

然而，人却能以威严的目光  
把别人派到毒树那里，  
那人立刻俯顺地前往，  
次日一早，带回了毒剂。

他献上了致命的树脂  
和叶子已枯萎的枝干，  
啊，他苍白的额头尽湿，  
汁水流下来有如冷泉。  
献完了，接着虚弱地倒在  
帐篷里的树皮地面，  
这可怜的奴隶于是死在  
无敌的主子的脚前。

## 第十四章 美人冈察洛娃

时间老人的步伐已迈进了 1829 年的门槛。年过 30 的普希金像他笔下的奥涅金一样，还在过着独身的生活。虽说他的行动总是被沙皇的密探监视着，每有一个大的走动事先都要报告、批准才能成行，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总算是自由的。他的友人，除了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大都过着有家室的生活，而他，却还是形影相吊，孑然一身。

他爱过不少女子，算起来少说也有一二十人，所以有人把他比作拜伦笔下的唐璜。其实，他有时是逢场作戏，有时则是一时感情冲动，而真正使他动心的女子却很少。作为诗人，爱情是他的一种对生活和情感的体验，而真正的爱情在他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到的：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它不是  
忧郁的愁思，不是无望的迷误，  
我知道，爱情就是美好的理想，  
是陶醉，是心灵的满足。

可以作为明证的便是他所创作的大量的爱情诗，这是他的一次次恋爱的果实，而它们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是欲望，更不是感官的冲动，而是一种美好的优雅的情感，是一种回忆、一种憧憬。也许在他所爱过的女子中，只有坚强而又勇敢的拉耶夫斯卡娅能够真正地理解他的爱情的奥秘，所以这位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奇女子”竟否认她曾爱过这位诗人。

而现在，一位让诗人怦然心动的美丽女子向他走过来了……

那是在 1828 年到 1829 年冬季莫斯科的一个舞会上，出现了一个“身穿轻盈的白色连衣裙、头戴金箍”的绝色美女，她的面容有一种古典式的端庄，目光中透露出一种深邃的沉思，她翩翩而至，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倾倒。而此时的普希金，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头开始眩晕了！”

她就是娜塔丽娅·冈察洛娃，这时她才 16 岁。对于普希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犹豫的了。冈察洛娃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

关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美丽，当年见过她的人们留下许多描述：

作家索洛古勃写道：“我一生见过许多美女，有的也比她更迷人。但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完美的女性。她的小脸和身腰看上去十分典雅。她身材高大，十分苗条，胸部丰满，迷人的脑袋像朵百合花晃来晃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动人的身段和如此标致的女性。她的皮肤多么娇嫩，眼睛多么迷人，一口银齿晶莹剔透，两只耳朵小巧俊美！是的，这是个真正的人间尤物。她的出现令群芳失色，这理所当然。即使姿容相当秀丽的女性也会自惭形秽。”

菲格蒙伯爵夫人写道：“她的身腰和长相完美无缺。”

作家布尔加科夫写道：“仙女的身段，美妙的小脸。”

诗人图曼斯基写道：“她年轻漂亮，洁白如玉，棱角分明，目光狡黠。”



如今，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有一座普希金纪念馆，普希金和冈察洛娃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每天，纪念馆允许 200 名参观者进入馆内。馆内的陈设据说和当年一样，在大厅里悬挂着普希金和冈察洛娃的画像。参观者特别是女性，总是在冈察洛娃的像前驻足不前，常常能听见“真美”或“美人”的赞叹。

但对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性格和智力，却很少有人赞扬。

冈察洛夫一家原是卡卢加的富商和工厂主，家资可观，但到了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祖父的手里，资财却挥霍一空。娜塔丽娅的父亲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从很早就患上忧郁症，后来又得了精神病。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从小在祖父的工厂里长大，6 岁时才回到莫斯科自己的家中生活。她的母亲年轻时也非常漂亮，有过一些风流韵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情变得越来越乖张古怪，成为家里的暴君。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便形成了一种孤僻和胆小的性格，无怪在她的前额上常常会有一种“痛苦的表情”。

普希金同冈察洛娃一家结识后，经常到她家来作客。娜塔丽娅的姐姐、18 岁的亚历山德拉很崇拜普希金，能够背诵出普希金的许多诗歌，她甚至还偷偷地爱上了普希金。至于娜塔丽娅，她过于腼腆，在普希金面前感到受宠若惊，她虽对这个向她献殷勤的人也很感兴趣，知道他发表过许多优美的诗歌，但也不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使她喜欢，她只觉得他很古怪，指甲留得那么长，甚至连舞都不会跳。

1829 年 4 月底，普希金请托尔斯泰伯爵去为他作媒，向娜塔丽娅的母亲老冈察洛娃求婚。但老夫人并不喜欢普希金，在她看来，普希金只是个舞文弄墨的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况且，官方还对他这个人很恼火；而她的女儿又年轻又漂亮，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人家。于是她便以女儿的年龄还小暂时把事情搁置下来。普希金在接到这样的答复的当天用法文给冈察洛夫夫人写信说：“我屈膝下拜，流着感激的眼泪给您写信。如今，托尔斯泰伯爵带来了您的答复，您没有拒绝，给我留有一线希望。但是，假如我仍然低声抱怨和悲伤，痛苦与幸福交织在一起，请不要责备我忘恩负义。我理解母亲的谨慎和对女儿的偏爱！但请您原谅我的焦急心情，这是沉醉于幸福之中的病态心理。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由于求婚不顺利，普希金心绪不佳，他想换一个环境，在这里他天天都要见到心上人，不免会感到莫名的惆怅。他想去南方，去高加索，去大自然的怀抱里，让大自然、让冒险的生活冲淡他对冈察洛娃的相思。后来，他又给冈察洛夫夫人写信，解释他“出走”的原因：“我第一次见到她（指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笔者），就爱上了她，她使我头晕目眩，我便向她求婚，但您的答复含糊不清，使我几乎发疯。当晚我就来到了部队上，您问我来部队干什么？我发誓，我自己也不知道。一种不由自主的苦恼驱使我离开了莫斯科。经常看到您和她，我会受不了的。我给您写过信，等待您的答复，但什么也没有等到。青春期的放荡生活闪现在脑际，我的确有些放荡，但谣言夸大了事实。遗憾的是，这些传闻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了，您当然可以相信。我不敢抱怨，但这叫我极度失望。”

当普希金想离开莫斯科去南方时，曾有人以南方是不祥之地为由劝说普希金放弃此行，并还举出拜伦和格里鲍耶陀夫都死于南方的例子。

但普希金执意南下，谁也劝阻不了。

大自然永远是诗人的朋友。从普希金第一次到南方时算起，到如今差不多快 10 个年头了，诗人宝贵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而现在，诗人已是“而立之年”了。南方，这个普希金的诗歌的摇篮，又一次以其雄奇壮丽的美景吸引着普希金，它唤醒了诗人的缪斯，诗情在诗人的胸中奔涌，诗句在诗人笔下流淌，南方的奇美风光展现在我们面前：

高加索在我身下。我兀立山巅，  
在悬崖边沿的积雪之上出现，  
一只苍鹰从远方的峰顶腾起，  
几乎不动地翱翔在我的眼前……

——《高加索》

巨浪拍打阴郁的峭岩，  
喧闹不息，飞沫四溅，  
苍鹰在我头顶上鸣叫，  
松林在哀怨，  
在雾海浮沉的崇山峻岭  
正亮着银冠。  
突然从峰顶之上塌落  
一大堆冰雪，它隆隆作响，  
在峭壁间的深谷夹道中  
筑起了屏障，  
于是便挡住了捷列克河  
滔滔的巨浪……

——《雪崩》

这熟悉的大自然又唤起了诗人的回忆：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人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英武和豪放的将军，性格迥异的两兄弟，更还有坚强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玛丽娅·拉耶夫斯卡娅……可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诗人怎么也摆不脱另外一个倩影，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倩影，虽说他已远离了莫斯科，然而这个美丽的影子却总是紧紧地把他追随。娜塔丽娅·冈察洛娃，莫非你注定了要永远折磨着诗人……

然而，在莫斯科，冈察洛夫夫人对普希金的几次来信根本不予理会，相反，她倒希望普希金走得越远越好，越久越好。看着自己的女儿娜塔丽娅在社交场上越来越走红，母亲暗自得意，当有人告诉她，梅谢尔斯基公爵准备向娜塔丽娅求婚时，冈察洛夫夫人欣喜若狂。现在她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那个黑皮肤的矮小的诗人再来纠缠。

然而她担心的事情却发生了。9 月间，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冈察洛夫夫人还在床上休息，突然有人用拳头敲打大门，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来人已急冲冲地闯了进来，走进前厅，脱下大衣，这个面容憔悴、衣冠不整的人就是普希金。他刚从高加索回来，就直奔冈察洛夫夫人家里来。他在喘息间询问娜塔丽娅是否在家，孩子们赶忙去告诉他们的姐姐和母亲。冈察洛夫夫人躺在床上，得知普希金来到的消息，很不高兴，她打定主意要甩掉这个穷鬼，于是便让普希金进到她的卧室里来。普希金进

来后，她仍不起身，躺在床上一副睡意朦胧、漫不经心的样子，只是寒暄了几句，根本不触及正题，谈到的是她女儿现在在社交界是如何风光。而娜塔丽娅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再三训斥，对待普希金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冷淡。

此时，普希金感到，他在高加索朝思暮想的一切就要破灭了。他离开冈察洛夫家，惘然若失地走到大街上，他仿佛觉得活在人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个念头又在他脑中蹦出：“走，随便到哪儿去，只要不再见到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他甚至想过要去中国一趟：

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朋友们，随便你们想到什么地方，  
为了远离骄傲的人儿，我都愿意奉陪：  
不管是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边上，  
也不管是去人声鼎沸的巴黎市街，  
到塔索不再歌唱夜间船夫的地方，  
那里在古城的灰烬下力量还在昏睡，  
只有柏树林子还在散发馨香，  
哪里我都愿去。走吧……但朋友们，  
请问我的热情在飘泊中可会消亡？  
我将要忘却骄傲而折磨人的姑娘，  
还是仍要到她跟前忍受她的怒气，  
把我的爱情作为通常的献礼捧上？

上述的部分内容又以散文的形式被写进他给警察头子本肯多夫的信中，在封这信中，普希金央求道：“就让我到中国去出一次差吧！”可是，普希金的想法太天真，沙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放到国外去的。

不过，这期间普希金的求婚一事开始出现了转机，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好事多磨。

当时正逢沙皇皇宫迁移到莫斯科，莫斯科城天天都在过“狂欢节”。在各种沙龙集会上，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风头正足，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这个美丽的姑娘，甚至连尼古拉一世也注意到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美貌。冈察洛夫夫人原以为这一下求婚者会络绎不绝，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众人只是前来捧场和献花，或者只是向娜塔丽娅暗送秋波，真正的求婚者却寥寥无几，甚至连那位梅谢尔斯基公爵也开始打退堂鼓了。在这种情势下，冈察洛夫夫人开始后悔赶走了普希金。再加上在“狂欢节”期间，普希金的一些朋友又不断地在这母女俩面前赞扬普希金，使得老夫人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于是她便请诗人的朋友代她向普希金致意问候。

处在绝望之中的普希金此时正在彼得堡，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即赶到莫斯科。几天后，普希金写道：“自由、舒适和冈察洛娃小姐把我留在了莫斯科。”他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了。

普希金每天都在冈察洛娃家周旋，他很少动笔创作，以至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担心。而另一方面，婚姻的事情也未最后确定下来。老夫人很世故，又很厉害，普希金一直不敢正式提起结婚的事情。大约在1830年4月初，普希金终于鼓起勇气向老夫人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她显然是已老

谋深算，反而向普希金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他过去行为不检点，今后是否能做到痛改前非，使她的女儿幸福；二是他是否有经济能力让她女儿能过上优裕的生活；三是他能否改善与政府的紧张关系。

真是“姜还是老的辣”。普希金能让单纯的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对他产生好感，但面对老夫人这三个问题，一时间他竟心慌意乱，无以对答。第一个问题还好说一点，那是他个人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则由不得他作主，他的收入有限，这是明摆着的；第三个问题很麻烦，他知道他一直处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而他是绝不会与政府妥协的。在复杂的心情下，普希金摊开纸，给冈察洛夫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如下内容：

夫人，现在请允许我给您写这封信，我一拿起笔来就感到激动，如同站在您面前一样。我有许多话要讲，我越是仔细考虑，就越感到忧郁和失望……听我慢慢告诉您。

要赢得令爱的欢心，我只有常去府上，并经常同令爱在一起。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能爱上我，但我没有任何能使她高兴的东西。假如她肯嫁给我，那只能是把她那冷漠的心交给我。但在众人的赞扬声中，在荣誉面前，在别人的引诱面前，她那颗冷漠的心能挺得住吗？别人会说她命运不济，没有找到同她般配的丈夫。她本该找个更出类拔萃、更配得上她的男人。这种说法也许是真心话，至少可以肯定，她会这么认为。到那时，她不会后悔吗？她会不会把我看成是绊脚石，看成可恶的骗子呢？她会不会转而厌恶我呢？我愿为她上刀山下火海，上帝可以为此作证。

但我一想到我死之后她就成了新寡，会更加引人注目，会在我尸骨未寒又嫁他人。想到这里，我就十分痛苦。

现在再谈财产问题。我对财富一向不怎么看重。

到目前为止，我的财产足够我享用。但结婚之后呢？

世界上叫我感到痛苦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妻子不能到她可以抛头露面 and 可以玩耍的地方去。她有权提出这种要求。为使她满意，我情愿作出牺牲，放弃自己的一切乐趣和爱好，放弃自由和冒险的生活。但是，她会不会在我耳边唠叨，说我的社会地位配不上她的长相呢？

这就是我所忧虑的几个问题。要是您认为这些忧虑合乎情理，我会害怕地发抖。还有一种忧虑，但我不能在信中写出来……

普希金在信中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看来，他的考虑还是比较深远的，而且，这封信里似乎还包含着某种预感，从以后发生的情形看，有些事情确实是被他不幸言中。至于第三个问题，普希金则不便和老夫人去谈。不过，诗人为了这场婚事，不得不忍受妥协的痛苦给警察头子本肯多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包涵，不要把他受政府监视的情况透露出来而“成全”这场婚姻。

冈察洛夫夫人最后终于应允了这场婚事。不过，在嫁妆方面，这位老太太却丝毫不让步，普希金没有办法，只得四处张罗。

当普希金的父母接到儿子要成婚的消息，便把祖传的一份产业拨给儿子，那就是包括 200 农奴在内的波尔金诺庄园，每年大约有 4000 卢布的收入。为此，普希金还要去波尔金诺一趟，办理财产过户的手续。

看来，一切总算快要结束了，30 出头的诗人就要结束单身汉的生活了。然而前面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呢？是幸福还是不幸？是快乐还是痛

苦？

有人为“莫斯科的第一号美女”嫁给了普希金而惋惜；有人则为普希金“将要变得平庸”而担心；然而，普希金自己感觉又是怎样的呢？虽然他也有种种不祥的预感，不过，当他面对和拥抱娇美的未婚妻时，他的心里是幸福的，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荒唐的过去，而这就是幸福的证明：

当我紧紧拥抱着  
你苗条的身躯，  
兴奋地向你倾诉  
温柔的爱的话语，  
你却默然，从我的怀里  
挣脱出柔软的身躯。  
亲爱的人儿，你对我  
报以不信任的微笑；  
负心的可悲的流言，  
你却总是忘不掉，  
你漠然地听我说话，  
既不动心，也不在意……  
我诅咒青年时代  
那些讨厌的恶作剧：在夜阑人静的花园里  
多少次的约人相聚。  
我诅咒那调情的细语，  
那弦外之音的诗句，  
那轻信的姑娘们的眷恋，  
她们的泪水和迟来的幽怨

## 第十五章 波尔金诺的秋天

1830年8月31日，普希金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波尔金诺办理财产过户手续。这件事在他看来很简单，因此他根本没想在那儿久留，况且，娇美的未婚妻还在盼着他赶快回来举行婚礼，所以除了通常都随身带着的几本写满提纲和草稿的笔记本外，他什么都没有带。

波尔金诺与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样子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广袤的湖水，高耸的山峦，也没有成片的树林和花园。普希金这样描写过波尔金诺：

请看这样的景象：一排残破的村屋，  
后面是一片黑土，平缓的坡地，  
房顶上飘着一片灰暗的乌云。  
哪里有明媚的田野、翠绿的树林？  
哪里又会有淙淙作响的小溪？  
触目的仅仅是两株可怜的小树……

可是命运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缪斯又以她无比的温存让普希金留在了这个偏僻的乡村。

先是财产过户的手续不像普希金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告诉她：“我原以为父亲留给我的地产是单独一片土地，谁知土地同这500户的小村庄是一个整体，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开……”这件事就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办好。

另外，普希金告诉他的未婚妻，这里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他“只好在这里多呆上几天”。这“意外的事件”是什么，也许是怕未婚妻担心，普希金没有说得很清楚。而在给他的一位朋友信中，普希金则说得很明白：“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在流行。您听说过这种病吗？它随时都可能侵扰波尔金诺村，把我们全村人全部吃掉，一个不剩……”

等到财产方面的手续办理完毕，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已被封锁。事实上普希金已不可能马上回到莫斯科去了。

此时，在这寂静的乡村，普希金的心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这些年来，从他重新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后，他还没有过这样平静的日子。他独自一人，有时骑着马在草原上飞驰，有时也到庄园附近随心所欲地徜徉，但更多的是在桌上摊开一张白纸，一面听着秋雨敲打着门窗，一面与缪斯女神倾诉衷肠：

头脑里装满着各种幻想，  
轻快的韵脚跃然纸上，  
手握着笔，笔压着纸，  
美好的诗句如泉水流淌。  
如同大船沉睡在海上，  
水手猛然间拉起风帆，  
自下而上，迎风飘扬，

于是大船便开始启动：  
乘风破浪，奔向远方。

在波尔金诺，普希金的创作热情迅速地高涨，创作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9月25日，他给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代表着他创作最高成就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划上了句号，确切地说，是完成了这部诗体长篇小说的第八、九两章。写完这部作品，普希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知道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描画了当代青年的肖像，放入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许多思考；此外，他也十分清楚，这部作品的形式对整个俄罗斯文学而言也是全新的，就连诗的格式和韵律也是全新的。他不知道文学界将会怎样评价他的这部作品，尽管这部作品在这以前就零星地发表过或在朋友们当中朗诵过，获得过大家的赞扬。但他这次带回的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评论界会如何看待它呢？不过，诗人也不愿意去多想了，此时，他几乎什么也不想干了：

我渴望的时刻来到了：多年的创作终于完成。  
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感伤悄悄烦扰着我？  
是由于功业告成，我便如多余的短工般呆立着，  
领取报酬后，却不愿意去从事另一项工作？

然而，波尔金诺的空间和时间太适合写作了，在这里，普希金无法与缪斯分手，甚至连短暂的告别也不能够：他的心田感受着缪斯的阳光，他的灵感沐浴着缪斯的甘露，他的佳句妙语信手拈来，他的神来之笔游走自如，在普希金身上，莫非真如希腊人柏拉图所言，确有“神灵凭附”？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创作的全面丰收，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给普列特涅夫的信来说明，这封信写于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12月5日的第四天，即12月9日，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要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在波尔金诺写了不少东西，好久以来我没有写过东西了。我要给您带去的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九两章（已准备排版付印）；一篇用八行诗写成的诗体小说（共400行），发表时不拟署名了；几个悲剧剧本（或者叫小悲剧），有《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唐璜》。另外，我还写了30首小诗。这不算少了吧，怎么样？但我还没有讲完呢。

这是悄悄话，我还写了五篇故事。这些故事会气得巴拉丁斯基 嗷嗷乱叫。发表这几篇故事时，也不要刊登作者的姓名。

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的时间里，普希金创作了这样多的作品，并且，除了数量的惊人之外，作品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成熟。“波尔金诺之秋”以其丰硕和辉煌在普希金的创作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普列特涅夫（1792—1869），诗人和批评家，普希金的朋友。

巴拉丁斯基（1800—1844），诗人，普希金的朋友。

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巨著，我们暂且不提，在后面我们将要专门分析这部作品。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所创作的几个小悲剧都十分精彩，就情节而言，它们各不相同：《吝啬的骑士》写的是中世纪的故事，《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把读者带到了英国，《石客》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死亡，剧中人都围绕着死亡展开了自己的演出，可以说死亡就是这些剧作的共同的主角。颇具趣味的是，普希金在创作《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时，剧中的情境与他所在的波尔金诺的气氛何其相似乃尔！或者说，正是波尔金诺发生的事件诱发普希金创作了这个小悲剧。从艺术上看，这些剧作都极为紧凑、凝练。它们的故事不是“展开式”，而是“压缩式”，丰富的戏剧性情节通过精妙的构思被浓缩为精彩的一幕，戏剧的矛盾冲突在瞬间展开和完成，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效果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普希金在上面的信中所提到的“五篇故事”，就是后来以一个地主别尔金的名义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如果说普希金的小悲剧是以死亡作为主角的话，那么在《别尔金小说集》中，主角可以说就是爱情。而在情节的生动和构思的精巧上，与小悲剧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射击》的主角是一个小城军官希尔沃，他收入不多，但喜欢请客豪饮；他的剑术高明，爱好争斗，但又嫉妒成性。后来兵团里来了一个出身富豪之家的青年人，动摇了希尔沃的威望和自尊，希尔沃对他十分嫉恨，要和他决斗。可是在决斗中，他发现小伙子毫不在乎，在先开枪未中后，他居然一面吃着樱桃，并把樱桃吐向对手，听任希尔沃开枪。此时，希尔沃感到就是把那个不爱惜生命的家伙打死也没有意思，于是便忍耐了一下，保留他报复的权力。

后来，小伙子结了婚，过着幸福的生活。希尔沃认为报仇的时机已到，他找到这个仇人，把枪对准他。现在，这个青年人和当年时那个光棍军官已是判若俩人，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生命无比眷恋，想到要被打死便全身发抖。希尔沃见此状十分高兴，认为自己报复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他一枪朝墙上的画射去，便扬长而去。作品的情节看似有些奇巧，但其中包含某种生活的哲理。

《暴风雪》和《村姑小姐》在情节上都极富戏剧性，讲的都是青年人的恋爱和结婚的故事。在《暴风雪》中，玛丽娅与一个掌旗官相爱，但玛丽娅的父母不同意，于是两位年轻人决定私下成婚，一位神甫答应为他们主婚。可是一场暴风雪使得掌旗官未能赶到预定的教堂，玛丽娅悲痛欲绝。后来她的父母见女儿一病不起，就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掌旗官已在1812年战争中阵亡。后来玛丽娅和一个名叫勃尔明的骑兵上校相爱，但想到过去的恋人，她不敢提结婚一事。而勃尔明也记得自己曾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中迷了路，糊里糊涂地被人拉入一个小教堂里，与一个泪流满面女子举行过一次“婚礼”，当时他只觉得好玩而并不在意。当勃尔明向玛丽娅讲起这个奇特的经历时，玛丽娅突然记起来了，“天啊，原来那个人就是您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结过婚了。

《村姑小姐》的故事也情趣盎然。丽莎和阿列克赛相爱，但他们的家长都反对这门亲事。丽莎化装成一个村姑模样到树林里和阿列克赛相会，阿列克赛爱上了这个自称是铁匠女儿的村姑小姐，并打算与她结婚。



不料他们的父母又和好了，准备同意儿女的亲事。这一下反而让阿列克赛为难起来，他已舍不得那个在林中遇到的村姑小姐。他来到丽莎家，准备把事情和盘托出，表示不能娶丽莎，但是一进门便发现，村姑小姐就是丽莎。于是故事的结局也像《暴风雪》中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

《棺材匠》描写的则是另一种故事。棺材匠人由于职业的特点而形成了自私和孤僻的性格，他不由自主地希望病人快死，好让他的生意兴隆，以使用次木料代替好木料去做棺材，作者通过棺材匠宴请死人的情节，揶揄了市民自私、狭隘的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驿站长》这个短篇小说。就外部情节而言，它与上述故事有相近之处，但就其所包含的思想来说，却更为丰富和深刻。作品通过一个小官员的悲剧，揭示出小人物脆弱的地位，展示出小人物心灵的颤动。

俄罗斯某驿站的站长维林，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早年丧妻，惟一的安慰便是他的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儿冬尼娅。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热情照顾过路留宿的客人。一个冬天的晚上，站上来了一个“体格匀称，留着黑胡子的年轻的骠骑兵”，叫明斯基。他看中了驿站长的女儿，装病在站上住了两天，冬尼娅一直侍候着他。到第三天早上，当他离开驿站时，把冬尼娅拐跑了。驿站长气急成病。病愈后他从驿马使用证上查找到骑兵上尉明斯基的住址，便去彼得堡找女儿。头两次，在明斯基的住所都被赶了出来，没有见到冬尼娅。第三次，他设法找到了女儿的住处，冬尼娅一见到父亲，一声惊叫便昏倒在地，明斯基又把老人赶了出来。老人回来后，为女儿的命运忧伤不已，以至一蹶不振，郁郁而死。事实上，冬尼娅的情况和他父亲所担忧的恰恰相反，她并不是违反自己的心愿被骠骑兵拐走的。据马车夫说，虽然她哭了一路，可她却还是“心甘情愿”去的。后来她成了明斯基的妻子，和他过着优裕的生活。老人去世后，冬尼娅带着孩子们给父亲上坟。

小说充满了人道精神。十四等文官驿站长维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小人物”，一个贵族的专横和暴虐的牺牲品。普希金以前，俄国文学中已有描写“小人物”的尝试，如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但只有普希金所描写的“小人物”才空前成功地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真实性。普希金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驿站长的遭遇和他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社会地位，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对“小人物”的人格和命运的真挚同情。

在贵族主人公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学画廊的时候，普希金把“小人物”引进文学，并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描写他，这样的描写促进了俄国文学的民主主义化，确立了俄国文学的社会性传统。如果没有《驿站长》的影响，就难以有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这样的作品。

此外，作品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即冬尼娅与明斯基的行为也都是根据心灵的直接要求而作出的，并不考虑理性和一般生活道德原则，作品对以真挚感情为基础的爱情是肯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品的意义也就扩大了，它缓和了对明斯基的谴责。作品引起的是同情和叹息，而不是愤怒的抗议。

《别尔金小说集》的创作，标志着普希金的艺术探索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如果说以往普希金还只是在诗歌的王国里独领风骚，那么他现在又在散文的领海中扬帆起程了。

从艺术上看，《别尔金小说集》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小型散文作品。普希金当时不愿意用真名发表这些作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想避免引起文学界甚至是朋友们的惊异，但事实上，人们仅凭作品本身所显示出的种种迹象就猜出了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普希金把平凡的事物提升到诗意的高度，结构单纯紧凑，无一点多余之处，情节发展一气呵成，语言朴素、明快，心理描写简洁而又传神。在叙事方式上，作者本人不出面，而是通过叙述中介人来讲述故事，这在俄罗斯文学中也是一种创造。总之，关于《别尔金小说集》，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它在各个方面都“值得每一个作家反复研究、学习”。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所写的抒情诗，可以说是用韵文写成的私人日记。处在特定的心境之中，又置身于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普希金的思绪万千，生与死，爱与恨，过去和未来，喜悦和忧虑，构成了普希金这个时期的抒情诗的主题。

诗人想起了已经离开人世的过去的恋人，不免有些伤感：

你离开了这异邦的土地，  
向祖国遥远的海岸驶去。  
在那永世难忘的悲伤时刻，  
我在你面前抑制不住地哭泣。……

……

就在那个地方，  
天穹蔚蓝，一片光明，  
水中倒映着橄榄树影，  
你却长眠，一梦不醒。  
你的美貌，你的苦痛，  
全都消失在墓穴之中，  
连同那再会时的拥吻……  
可是我等着它——  
因为你曾经应允……

他忆起了过去，又想到了未来，不免感慨万端：

想起过去荒唐岁月的那种作乐，  
我就心情沉重，像醉酒般受折磨。  
对时日飞逝的伤怀也像酒一样：  
时间过得越久，心头越觉苦涩。  
我的道路坎坷难行。未来啊，  
滔滔大海只会带给我悲哀和劳作。

但是，我的朋友啊，我不想离开人世；  
我愿意活着，思考和经受苦难；  
我相信，生活不仅是操劳、灾难和烦扰，  
总有赏新悦目的事情会和我相伴：  
有时我会再次在和谐的生活中陶醉，  
有时会因为捏造、中伤而泪洒胸前，  
也许，在我悲苦一生的晚年，  
爱情会微笑着同我再见。在莫斯科，是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普希金呢？洞房花烛、新婚燕尔？老友分别、新朋欢聚？恶人中伤、歹徒暗算？对这一切，诗人似乎都已考虑到了，然而在波尔金诺，诗人却没有想到，这一切会来得这样快，还远没有等到那“悲苦一生的晚年”。

## 第十六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

还是在 1823 年冬天，身处南方的普希金在信中告诉他的朋友：“我正在写小说，但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诗体小说。诗体小说类似《唐璜》那类作品。”第二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部诗作是我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一部……”从南方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诗体小说一章接着一章地写就，但是始终没有最后完成。直到 1830 年秋，诗人才在波尔金诺给这部作品画上句号。算起来，用普希金自己的话说，这部作品用的时间是“7 年 4 个月零 17 天”。

这将近 8 个年头的的时间，正是诗人逐步走向人民、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思考的时期，也是诗人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时期。可以说诗人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才华全都倾注到了这部作品之中，它是诗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别林斯基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真诚的作品，是他幻想的宠儿，很少作品能这样充分、明确、清晰地反映一个诗人的个性。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全部生涯、他的心灵、他的爱情。我们也看到他的种种情感、观念和理想。”批评家进一步明确指出：“衡量这样一部作品意味着衡量诗人的全部创作活动。”

从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最早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他与司汤达著名的被认为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开山之作”的《红与黑》在同年（1830）完成，它甚至比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早问世好些年头。

诗体小说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一个贵族青年，正当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时候，他那年迈的伯父突然病故，于是他因继承遗产来到伯父的庄园。在乡下，奥涅金与另一位贵族青年连斯基结为朋友，并认识了邻村地主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达吉雅娜和小女儿奥丽嘉。达吉雅娜爱上了奥涅金，她一时感情冲动，给奥涅金写了一封充满天真、纯洁的感情的信，可遭到奥涅金冷淡的拒绝。这时，连斯基正狂热地爱上了奥丽嘉。而奥涅金在一次舞会上，故意不断地找奥丽嘉跳舞，和她表示亲近，这便激怒了连斯基，于是他提出要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在决斗中打死了连斯基，良心受到谴责，便离开庄园到四处漂泊。几年以后，当他回到上流社会，在莫斯科的一个晚会上重又见到达吉雅娜时，达吉雅娜已成了一位将军夫人。这时，奥涅金心中燃起了爱情，也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给她。可达吉雅娜回答他说，她承认她还爱他，但出于道德和尊严而不能属于他。这以后奥涅金又离开上流社会到四处漂泊。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再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别林斯基曾称它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20 年代，正是俄罗斯解放运动第一代战士——贵族革命家成长的时期，同时也是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酝酿、爆发和失败的时期。当时，俄罗斯经历了 1812 年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

---

《唐璜》，拜伦的长诗。

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称之的“时代的忧郁病”。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正是后一类贵族青年的典型。他是一个退職官员的儿子，从小受着传统的贵族教育，在法国籍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这种脱离祖国文化的环境，自然不会给奥涅金带来什么好处。当他到了“心猿意马的青春”时期，便终日在上流社会中鬼混，成了一个纨绔少年。他一天要赴三个宴会，梳妆台上摆着几十种化妆刷子，每天要在各种镜子面前至少花费三个钟头。他善于在谈吐中卖弄学问和随机应变，也善于在沙龙里用法语说些俏皮话，换取太太、小姐们的微笑。他甚至还会一点拉丁文。然而他最擅长的学问还是“情场上的把戏”，社交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可爱”的人。

上流社会的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虽然使这个花花公子沉湎一时，但他终于也厌倦起来，害上了“时代的忧郁病”。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漠然置之，既看不起周围的朋友，也不满意自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打着呵欠，拿起笔来，想要写作，可艰难的工作使他厌烦”。于是他便试着读书，可“读来读去，全无道理”。对上流社会的逃避，并没有使他摆脱这种“忧郁病”，反而病入膏肓，几乎是无可救药了。

但他毕竟还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他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反对抵押土地，主张重农主义，并且还在农村进行过自由主义改革；他还与连斯基争论过有关历史、政治和科学等问题；甚至卢梭的民主思想也鼓舞过他。这些都说明奥涅金比那些醉生梦死、沉湎于灯红酒绿的贵族青年要高一头。

自然，奥涅金在农村进行的改革，并不能说明他真想为人民做些什么，那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事实上他很快就抛开了这件事。他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明确的理想和追求，只不过是他厌倦了这种多情表白。他低估了达吉雅娜的真诚，他甚至也不明白在爱情中应该追求什么。他鄙视上流社会，却又不得不服从它的陈规陋习，和自己的好朋友决斗，结果把好朋友打死。他在重又遇见达吉雅娜并遭到她的拒绝后，便四处漂泊，结果是一事无成。普希金通过奥涅金的形象提出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即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

像奥涅金这样的徒有聪明才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爱情中也遭失败的贵族青年，在当年的俄罗斯是很多的，所以这一文学形象具有极大的概括性。赫尔岑曾说过“像奥涅金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每走一步路都会碰见他”，赫尔岑还承认：“我们只要不愿意做官或当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别林斯基称这类人为“聪明的废物”。后来人们都把这类人称作“多余人”。

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说这一称谓

是在屠格涅夫 1850 年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确定下来了。杜勃罗留波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而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诸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奥涅金的影子。“多余人”人物系列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诗体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一个拥有一个“俄罗斯灵魂”的迷人的艺术形象。别林斯基曾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在达吉雅娜身上给了我们关于俄罗斯女性的诗的描绘”。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在许多方面与男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他们又相互烘托，相互解释。

如果说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着重突出的是他与人民的脱离，那么在达吉雅娜身上，诗人则着意表现的是她与人民深厚的联系。诗人给女主人公取了一个平民化的名字——达吉雅娜，这个在当年丫环们才使用的名字便暗示出她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和淳朴的人民之中。古老的俄罗斯民间风习，富于民族传统的家庭氛围，老奶奶在静夜所讲述的美丽的民间故事，培养了她与俄罗斯人民相通的感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和故事，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甚至还相信纸牌占卜和月亮的预兆，这些都是和俄罗斯人民淳朴的气质一脉相承的。

在达吉雅娜的生活中，大自然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它培育了女主人公真诚、善良的感情，造就了她淳朴、美好的气质。她喜欢在黎明之前在露台迎接朝霞，喜欢在幽静的花园里散步，她爱俄罗斯的夏夜的美妙，更爱俄罗斯冬天冰雪的灿烂。在她出发到莫斯科之前的时候，她是那样深情地和故乡的山丘、溪流、树林告别，就像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一样。在莫斯科，她已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但她却“憎恨上流社会的忙乱，梦想着乡下的生活，梦想着乡村和贫苦的农民，梦想着那流淌着清澈小溪的幽静的角落。”她后来拒绝奥涅金时，还这样表白：

如今我甘心情愿  
拿这些无聊的假面舞会，  
这浮华、繁忙、空虚的生活  
换回一架子书，一个荒芜的花园，  
换回我们寒酸的房子，  
换回我最初，奥涅金，  
同你见面的那些地方，  
换回那一个朴素的坟墓，  
那儿，在十字架和树阴下面  
躺着我的可怜的保姆。

可见，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大自然的影响，是形成达吉雅娜的个性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造就这个“俄罗斯的灵魂”的最坚实的基础。

自然，普希金多少也描写了当时席卷着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对

达吉雅娜的影响，不过应该指出，从总体上看，诗人基本上是在道德的范畴中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这一点上表现这种影响的，这与当时俄罗斯女性无权参与社会活动的地位是相符合的。如诗人也写到达吉雅娜最喜欢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尤其是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特别吸引着达吉雅娜。普希金描写达吉雅娜在花园里阅读《新爱洛绮丝》这本“危险的书”的情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花园里读《西厢记》的情节如出一辙，有同工异曲之妙：

达吉雅娜常带着一本危险的书  
独自在寂静的树林中漫步，  
她在这本书里寻找，找到了  
她的秘密的热情、她的渴望，  
找到了丰富的心灵的果实……  
她轻轻地叹息，接受了  
别人的悲哀，别人的欢欣，  
她不知不觉地背诵着  
一封写给那可爱的主角的信……

爱情推动达吉雅娜作出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勇敢的行为。她决定要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公开表露那些使她激动的感情。她的这一行动猛烈地破坏了支配贵族社会的习惯和规则。

奥涅金以其鄙视现实的态度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达吉雅娜，她在少女的真诚、纯洁的感情的驱使下，勇敢地写了一封信给奥涅金。从《叶甫盖尼·奥涅金》问世以来，俄罗斯的少男少女们对这封信几乎都能倒背如流。这里，我们不惜篇幅将这封信完整地引述如下，并在个别关键之处加上“点评”：

我是在给你写信——够了，  
这使我还能说什么话？  
现在，我知道，您已决定  
用沉默的蔑视给我惩罚。  
但只要您对我悲惨的命运  
能存着即使一丝儿怜悯，  
我相信，您就不会让我绝望。  
起初，我本想保持沉静：  
那么，一定的，您就看不出  
我有怎样难言的隐情。  
我会沉默，要是我能盼望：  
在我们村里可以看到您，  
哪怕一礼拜一次，时间短暂，  
只要我听见您的声音，  
并且能和您随意闲谈，

---

理查生（1689—1761），英国小说家。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作家。

以后就盘算这一件事情，  
茶思饭想，直到再一次会见；  
可是我听说，您不好交际，  
这荒僻的乡村会令您厌倦，  
而我们……尽管喜欢客人，  
却没有什么能让您垂青。

为什么您要来访问我们？  
否则，在这冷僻的乡村，  
我原不认识您，也就不会  
感到内心深深的苦痛。  
也许，这灵魂的初次波涛  
（谁知道？）会随着时间消沉，  
创伤会平复，而我将寻到  
另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成为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另一个人！……啊，绝不，我的心  
再没有别人可以拿走！  
这是上天的意旨，命中注定：  
我将永远是为你所有。

（从这里开始，达吉雅娜不由自主地把“您”写成了“你”，在欧洲和俄罗斯异性之间以“你”相称，就意味着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由此可见出写信人感情的变化，这也是普希金的匠心所在。——笔者）我过去的一切，整个生命

都指出要和你真正相见，  
我知道，是上帝把你送来  
保护我，直到坟墓的边沿……  
我在梦中早已看见你，  
就在梦里，你已经那么可亲，  
你动人的目光令我颤栗，  
你的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啊，不，谁说那只是一个梦！  
你才走来，我立刻感到熟悉，  
全身在燃烧，头晕目眩，  
我暗中说：这就是他，果然！  
可不是吗？每当我帮助  
穷苦人的时候，或者当心灵  
激动不安、感到思念的痛苦，  
只有在祈祷中寻求平静，  
那一刻，那可不是你的声音？  
我听着你轻轻地和我说话。  
在透明的夜里，那可不是你



亲爱的影子，在屋中掠过，  
在我的枕边悄悄伫立？  
可不是你在温柔地絮语，  
给我希望和爱情的安慰？  
啊，你是谁？我的安琪儿，  
我的保护人，还是骗人的魔鬼？  
告诉我吧，免得我猜疑。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虚无，  
是少女的心灵的梦幻！  
而命运另有它的摆布……  
那就随它去吧！从现在起  
我把命运交在你手里，  
我信任你，恳求你的保护……  
我哭了，我不愿意对你隐瞒；  
请想想，我是这么孤独，  
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理解  
我的思索，任由它枯萎，  
我也将随着无言地憔悴。  
我在等待：只有你的目光  
能够点燃我内心的希望，  
或者，唉，给我应受的谴责，  
让这沉重的梦永远断丧！

写完了。我不敢重读一遍……  
羞耻、恐惧令我难以支持……  
但我只有信赖你的正直，  
我对你卤莽地呈献了自己……

达吉雅娜的信充溢着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纯洁和真挚，它和普希金的爱情诗一样，也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每一个灵魂的纯洁度：少年面对着它会怦然心跳；少女会在它里面听见自己的心声；中年人读了它会回忆起自己的初恋；就是老年人也会禁不住浮想联翩，而更加热爱和珍惜生命。谁在它面前无动于衷，那他多半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要么就是一个轻浮的玩世不恭的人，甚至是一个灵魂肮脏的人。

达吉雅娜的真诚和纯洁检验了奥涅金的性格和灵魂，一向冷漠的奥涅金一时间也感动起来。可是，达吉雅娜终究是不幸的，她爱上的是一个精神生活比她要空虚得多的人，是一个不能够理解她的纯洁和真诚的人，是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承受真正爱情的人，是一个自视很高、但在那个时代注定了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人。达吉雅娜终究也只能像当时其他的少女一样，被带到那“嫁人的市场”上，嫁给了一个“肥胖的将军”。她所追求的自由纯洁的爱情生活终究也没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达吉雅娜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达吉雅娜后来成为了一位将军夫人，她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和落落大方的风度，使她在充满虚伪龌龊的上流社会中像一株“出水芙蓉”一样

亭亭玉立。特别是她对待奥涅金的追求的态度更显示出她精神世界的纯洁和高尚：

我爱你（何必要装假呢？）  
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  
我就要一辈子对他忠诚。

她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愿过二重的精神生活，这种对自己的行为的负责态度集中地体现出她的精神美，而这种精神美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的。别林斯基说：“在这个道德沦丧的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些稀有的、可喜的特殊人物，……这就是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达吉雅娜是一朵碰巧茁生于嶙峋的岩缝中的鲜花。”达吉雅娜这一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的创造，对后来许多俄罗斯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产生重大的影响，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动人的女性形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脱胎”于达吉雅娜。

诗体长篇小说中另外两个人物——连斯基和奥丽嘉也是诗人着意刻画的人物。

连斯基年轻而又热情，有着崇高的理想，但他好像是生活在现实之外。他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一切事物，这就决定了他的冲动性格。在连斯基身上，诗人着重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情的、浪漫主义的态度，这与奥涅金的怀疑的、现实主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说，在根据《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同名歌剧中，青年诗人“连斯基的咏叹调”是歌剧中最为动人的一曲，连斯基的激情打动了无数听众。）

在奥丽嘉身上，普希金则着重展示出直率动人的外貌与贫乏的内心世界的反差，从而凸现了达吉雅娜表里如一的性格。连斯基死后，她很痛苦，可不久她嫁给了一个军官，从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太太，成了她母亲的“翻版”。

作为一部特殊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总的特色就是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

在普希金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虽也出现过有一定的人物和情节的长诗，但其中基本上没有性格的创造，更不必说到典型性格的自觉的塑造。普希金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诗的抒情性和散文的叙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他自己所称之的“自由的形式”的“诗体长篇小说”，其中既有浓郁的抒情性，又有对性格的精细的刻画。这是一种全新的独创性的艺术形式，是普希金在艺术形式上对俄罗斯文学的重大贡献。

具体说来，《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便是它的抒情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诗人自己的形象，贯穿着“作者的声音”。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抒情插笔”，较大型的“插笔”有27处之多，只有两三句的“插笔”竟有50多处。这些“抒情插笔”，有时是作者对人物的贬褒，有时是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有时是对往事的追忆；有的严肃庄重、富于哲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有些“插笔”，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些“插笔”，看似与人物或事件

无关，其实并未离题万里。正是这些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笔”，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但《叶甫盖尼·奥涅金》毕竟又是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大型的叙事作品，它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典型性格的塑造上、环境和场景的描写上都达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水平，也不逊色于欧洲现实主义奠基者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别林斯基说它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原因正在于此。在诗体长篇小说中，普希金围绕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一主线，巧妙地穿插着上流社会的场景和乡村的风俗画面，这些初看起来仿佛是诗人信手拈来的无意之笔，却包含着真正的艺术家的着意安排和匠心。如作品中描写地主庄园中农奴少女边采果子边唱歌的片断，就包含着真正的讽刺力量和幽默效果：

……只有一群使女  
在花园，在山坡的丛林间，  
一面采野果，一面合唱：（这歌唱是遵照主人的命令，  
她们唱着，主人才能放心，  
因为这样，就没有狡猾的嘴  
能够得空偷吃他的野果：  
请看乡村的智谋也很出色！）

我们看到，普希金以诗歌特有的抒情效果赋予作品以一般散文作品难以达到的感染力。

## 第十七章 婚后彼得堡

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和冈察洛娃在莫斯科耶稣升天大教堂举行婚礼。

当盛装的新娘款款而行、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只听见一片啧啧声,人们无不对冈察洛娃的美貌赞叹不已。普希金高兴异常,神采奕奕地与新娘并肩而行,他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胸膛,这样才可以与身材高大的冈察洛娃平头。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神甫主持了结婚仪式,他宣布这对新人结为夫妻后,新人开始交换戒指。突然,一只戒指滚到地上,普希金俯身去捡,一只手扶着圣经桌。据一位目击者说,当普希金俯身时,不小心把十字架和福音书碰落在地,这时,代表普希金的那枝蜡烛被打熄了。普希金立起身来,一脸苍白,他低声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不祥之兆!”

新婚夫妇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安了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在新婚的第二天,普希金就同朋友们外出了,把冈察洛娃一人留在家里,她感到十分寂寞,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眼泪禁不住往下直流。但这以后普希金便不再出门了。婚后第六天,普希金给彼得堡的普特列涅夫写信说:“我已结婚,十分幸福。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因为这种生活不能再好了。我的生活十分新鲜,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结婚、安家和婚后的各种应酬,把普希金准备的积蓄花费殆尽,蜜月还未过完,普希金就没有钱了。于是他打算到皇村去住,这样花费要小许多,同时也利于他的写作。

5月15日,普希金和妻子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半个月后,他们在皇村找到房子,安居下来。

从普希金的一生来看,1831年可能是普希金少有的幸福时期。这一年,他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组建了家庭。也许是家庭生活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使他觉得这种生活既新鲜又温馨,从而让他这颗骚动不安的心灵暂时得到平静;也许是家庭多少也缓和了当局对他的监控,让他的行动多少也有一些自由。普希金十分爱他的“小妻子”,那时,冈察洛娃虽说有点孩子脾气,但毕竟是单纯而又可爱的,再说,“岳母大人”又不在身边,也少了不少纠纷。普希金这一时期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这样说:“我觉得,我好像完全变了……”

居住在皇村的普希金常常忆起少年时期在这里学习的情景,忆起他的同学和朋友,特别是经常忆起这时已离开人世的杰尔维格。他时常走进皇村中学,看看他过去学习和居住的地方。每次,小同学们总是热烈地欢迎他,他和他们亲切地交谈,向他们讲述当年的趣闻逸事。

不过,随着外部和家庭内部情况的不断变化,普希金的“好景”并不长久。

7月下旬,皇宫也迁到皇村,达官贵人们纷纷到达,一时间皇村简直成了“临时首都”。

普希金暗自诅咒皇室的“驾到”,他本以为他可以在皇村过上安宁的日子,可这些宫廷人士蜂拥而至,带来了享乐和倾轧,搅乱了他的安宁。不过,“小妻子”冈察洛娃却暗自高兴,她本来就在这里感到寂寞,而现在好了,她又可以在舞会上和各种公共场合中展露她的风采了。

现在,普希金的客人多起来了,他和他的美貌的“小妻子”成为了

人们注目的中心。

常来普希金这里的有茹科夫斯基，这位温和、善良的宫廷诗人一向十分关心普希金，珍惜他的才华，又常常为普希金刚直不阿的性格惹出麻烦而担忧，现在，他看到普希金变得温顺多了，小夫妻过得很和睦，心里十分高兴。他在给亚·伊·屠格涅夫的信中写到了他所见到的普希金：“普希金是我的邻居，我们经常见面。自从你说我望着他的妻子流涎水之后，我就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条年老的丹麦狗。丹麦老狗坐在那里，眯着眼睛，流着涎水，望着别人在他面前品尝美酒佳肴。普希金的小媳妇长得实在可爱，我很喜欢看见他俩走在一起的神态。得知他结婚的消息之后，我一天比一天高兴。结婚对他的灵魂、生活和创作都有好处。”

此间，常有一个矮个子的青年人到普希金那儿去，把自己写的一些故事给普希金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果戈理。普希金对果戈理的短篇故事非常欣赏，在读了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后，普希金写道：“我刚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叫我大吃一惊，这是真正的欢乐，诚直和自觉的欢乐，毫无矫揉造作，不见鬼脸怪相！它包含着多少诗情画意！这一切都是我国文学中的新鲜事物，叫我望尘莫及！”

普希金对果戈理的才华十分欣赏，但他们在性格上却少有共同之处。就才能的特点而言，普希金善于发现生活中诗意的东西，即使是颇为平凡的事物，普希金也能把它提高到诗的高度。而果戈理却不是这样，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幽默，善于发现生活中畸形的被扭曲的现象，他善于讽刺和挖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善于把“丑恶的集成一堆”加以揭露和抨击。

普希金和果戈理后来分别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两大流派就是以他们的姓氏来命名的，即“普希金流派”和“果戈理流派”，又称“心理学流派”和“社会学流派”。几乎后来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划入这两个流派。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的两部名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题材都是普希金提供的，如果普希金自己来处理这两个题材，则可以肯定，那将是另一种境界和情趣。

常到普希金这儿来的宫廷人士，除茹科夫斯基以外，还有皇后的女官罗谢特。这个聪慧而又可爱的女子，博学多才，并且十分喜爱诗歌。在宫廷中，许多人都暗自爱着这位小姐，甚至连沙皇本人也悄悄地爱着她。茹科夫斯基则称她为“天上的小鬼”。

罗谢特和普希金是1828年在彼得堡结识的，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现在他们又都到皇村来了，所以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天上的小鬼”总是在早晨来访，而每次都是“小妻子”在小客厅里接待她。

每次，娜塔丽娅总是多少有点儿“醋意”地对罗谢特说：“你不是来看我的，而是来看我丈夫的。”

而罗谢特也总是落落大方地回答：“当然是来看你丈夫的。去问问他有没有工夫见我。”

普希金总是在这个时候推开书房的门，招呼着朋友和妻子。常常，

---

此处的亚·伊·屠格涅夫是俄国历史学家，而不是后来的文学家伊·谢·屠格涅夫。

普希金拿出自己新写的诗稿，给罗谢特朗诵，而罗谢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娜塔丽娅有时会有些不解，像罗谢特这样漂亮的小姐，怎么会喜欢那些诗文呢？有时她又会羡慕罗谢特，要是她也能像她那样和丈夫一起讨论起诗歌来，那该多好啊！然而她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丈夫写的那些分行的文字。不过，看到丈夫和这位漂亮小姐一起那么高兴，心中总免不了有些酸酸的感觉。

可“天上的小鬼”却对她说：“你没有必要嫉妒我。难道你不知道，在我眼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普列特涅夫都是我的朋友吗？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没有爱上普希金，他也没有爱上我吗？”

娜塔丽娅回答说：“这些我全知道。但叫我生气的是，你一来，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他同我在一起时，老打呵欠。”

娜塔丽娅说的完全是实话。

不过在另一种情形下，普希金和娜塔丽娅则交换了角色：娜塔丽娅兴致勃勃，而普希金却百无聊赖。这就是在皇宫的舞会上。

娜塔丽娅被众人包围着，她在舞厅中旋转着，不停地旋转着，而普希金则坐在某个角落里打瞌睡。他又不能离去，按照上流社会的惯例，丈夫始终要陪着妻子的。无怪果戈理在1833年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到普希金：“除了舞会上，任何地方你都不会遇到普希金。只有在发生重要事情和在迫不得已时，他才会去乡村，否则，他会在舞会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一次，沙皇和皇后在皇村花园散步时，遇见了普希金夫妇。尼古拉一世早在莫斯科时就认识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如今在皇村见到她，发现她越来越漂亮，便有意要让她经常出入宫廷，以便可以经常看到这个美貌的人儿。皇后也邀请娜塔丽娅到后宫去看看她，这一下令娜塔丽娅受宠若惊。另外，沙皇为了讨好娜塔丽娅，还把普希金安排到外交部任职，每年可得到5000卢布的薪水。

普希金在皇村住了三个多月，便感到不得安宁，同时，娜塔丽娅经常出入宫廷，花费太大，普希金的收入有限，常常入不敷出，此时，普希金常常面对着一大堆账单，不知所措。于是他决定离开皇村，搬到彼得堡居住。

普希金在加林大街安下了家，此时，娜塔丽娅已怀孕，而普希金的手中已是空空如也。他想搬到米哈依洛夫斯克去，那样花费会少许多，但娜塔丽娅一听就眼泪直流，她实在舍不得离开都市，离开这诱人的社交活动。而普希金在彼得堡已弄不到钱了，只得到莫斯科去想办法。娜塔丽娅尽管身怀六甲，依然纵情玩乐，她身穿紧身上衣，仍旧显得十分漂亮。并且她此时正春风得意，常常和皇上跳舞。当皇上把她轻轻地搂在怀里，随着华尔兹舞曲的旋律悠悠旋转时，她感到自己就是这舞会上的皇后。

1832年5月19日，娜塔丽娅生下一个女孩。但一等到体力恢复，她又一头扎进无休无止的舞会之中。从普希金这个时期的书信乃至诗作来看，他和娜塔丽娅之间多少也发生了一些“感情危机”：

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普希金写道：“你同所有的外交官挤眉弄眼，但还不知足！……我的小娘子，小太太，别这样生活了！”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普希金写道：“在彼得堡的生活毫无意义。终

日为生活奔忙，顾不上发愁。我是个作家，独立活动对我必不可少，但在这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只有天天在人群中奔波。我妻子打扮得很时髦，这都需要钱，而我只能靠写作挣钱，而写作又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

在一首给妻子的诗中普希金这样写道：

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了！  
我的心早就渴望得到安宁……  
世上毫无幸福可言，但安宁与自由还有。  
我早已向往得到这令人羡慕的自由——

普希金深知，作为一个作家，没有安宁就无法写作；作为一个丈夫，他的自由差不多已经全部奉献给了妻子。而要想获得这些，就必须离开彼得堡。这个时期，摊在他的书桌上已有一些未最后完成的书稿，他的脑海中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思，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大型散文作品。而在彼得堡，除了忙乱就是陪妻子去舞会，想完成这些作品，简直是不可能的。普希金决定离开彼得堡一段时间，他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写道：“也许陛下想了解我准备到乡下写些什么作品。我要脱稿的是一部小说，主要故事发生在喀山和奥伦堡，所以我想到这两个省份去采访一下。我重复一遍，除陛下慷慨许给我的俸禄之外，我没有其他收入，而在首都生活的费用昂贵，开销直线上升。”

沙皇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普希金，只好答应。不过，他命令警察在奥伦堡加强对普希金的监视。这样，为了安宁和自由，为了创作，普希金便于1833年8月18日离开彼得堡。

在喀山和奥伦堡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后，普希金来到了他的文学圣地波尔金诺。在这里，他仿佛又找到了感觉。波尔金诺的秋天赋予诗人以激情和灵感，让他文思如泉，得心应手。在这里，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除了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长诗《青铜骑士》和小说《黑桃皇后》外，诗人还写了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死公主的故事》。

经过艰苦但又是快乐的创作劳动后，普希金的内心得到了充实，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信心。然而，他的内心也不时地被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占据着。虽说波尔金诺依旧如前，可如今，他毕竟不是几年前的他了。现在他有家室，还有孩子，他的妻子既美丽又可爱，他是那样爱她，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他对她的爱有多深。可是，他的“小妻子”是那样单纯，那样容易被诱惑，在那险恶的环境里，她被人们“群星捧月”般地包围着，这些人中自然也有许多善良的好人，然而小人和居心不良的恶人也不少。一想起已分别数月的妻子，普希金又不免担心起来，他应该回彼得堡去了。况且，他的假期也完了，不回去，说不准又要惹出什么麻烦来的。

11月20日，普希金回到彼得堡。娜塔丽娅并不知道他回来，她正在别人家跳舞呢！在普希金离家的日子里，她多半是这样打发日子的。丈夫的归来，并不能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不过，使她感到高兴的是，丈夫这次创作的丰收，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她也可以多添制一些漂亮的衣裙。她的漂亮的衣裙增加了她的美丽，她的美丽又增加了许多流言，而流言

又增加了丈夫的苦恼。此刻，一个不大不小的苦恼正在折磨着普希金：

尼古拉一世对冈察洛娃的美色觊觎已久，可他近来发现在宫廷的舞会上很少有冈察洛娃的身影，便询问此事缘由。原来，冈察洛娃不能够经常出入宫廷舞会，是因为她丈夫普希金的职衔太低，无权得到邀请。于是沙皇想出了一个点子，就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这样，冈察洛娃就可以有资格在皇家舞会上露面了，他也就可以把这个美人搂在怀里跳舞了。

通常，宫廷近侍这一职衔，是授与小青年的。现在要早已年过三十、头发已经花白的普希金站在一排十八岁以下小青年当中，而这一切还是为了让皇上能够常在宫廷舞会上见到他的妻子，可想而知，普希金会是怎样心情。可是，普希金又不能拒绝，拒绝不但会引起家庭的不和和不快，更会引起皇上的不满。况且，社会上已是流言四起，说普希金是通过阴谋获得这个闲职的，伴随着这些流言，自然还有更加难听的话。

普希金婚后在彼得堡的生活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的生活中还埋藏着不幸的火花，它随时都可能引发成为一场灾难。

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作家索洛古勃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一点时有过中肯的分析，他写道：

说实话，普希金是极端不幸的，他的主要不幸就是，他住在彼得堡，过着足以毁灭他的上流社会生活。普希金处在那样一些人中间，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同时又感到自己在这个贵族上流社会中在待遇和所起作用方面一贯是受屈辱的。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官衔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在官方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比一个最低级的司书还要低。……他对上流社会的一些规矩表面上也表现出似乎是蔑视的态度：不赶时髦，参加舞会总是带着黑领带，穿斜襟的坎肩，领子是可以折起的，没有浆硬，这也许是无意模仿拜伦的绅士风度；其他规矩他还是服从的。他的妻子是一位美女，是所有集会的装饰品，因而也是她的同年的女士的嫉妒对象。为了能邀请她参加宫廷舞会，普希金被封为宫中低级侍从。为伴随美丽的妻子穿着宫廷礼服的这位自由的歌手，扮演了一个可怜的、几乎是可笑的角色。普希金不是本来的普希金，而是一个普通的廷臣和丈夫。

他热爱妻子，为她的美丽而自豪，他完全信任她。他嫉妒她，不是因为他对她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害怕上流社会的流言，害怕在上流社会的舆论面前成为更加可笑的人。他致死的原因就是这种害怕心理，而不是他无须害怕的丹特士先生。

普希金，正像他的悲剧的主角一样，不可抗拒地、一步步地走进了命定的悲剧矛盾和冲突之中；也正像那支婚礼上的蜡烛一样，生活的风暴随时都可能把它扑灭。



## 第十八章 《青铜骑士》

《青铜骑士》是普希金“彼得堡时期”的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普希金最后一部长诗。就内容而言，在这部作品中，历史和现实并存，颂扬与谴责共在，表现了诗人凝重的历史观和鲜明的现实感；就艺术而言，在这部长诗中，叙事与抒情相互交融、补充，淳朴的散文风格与庄严的颂歌格调相互交替、转换，展露了诗人炉火纯青的诗歌天才的最后一次“喷发”的奇光异彩。

长诗以 1824 年彼得堡洪水泛滥作为情节线索，在展开历史与现实的画面的同时，提出了彼得堡的主题。或者，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长诗的“真正主人公”就是彼得堡。

在作品的具体情节中出现两个人物，一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彼得大帝，一是现实中的小人物叶甫盖尼。而他们的故事又都是和彼得堡紧密相连的。所以有的学者又说这部作品有三个主人公。

长诗开头的序诗以庄严明朗的音调颂扬彼得大帝的功勋，以绚丽多彩的语言描绘了彼得堡的雄姿。历史上的大人物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发展和繁荣，毅然决定在这海口浪尖上兴建彼得堡城。他站在大海边，心里“充满了伟大的思想”：

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  
我们打开它便可通向欧洲。

而彼得堡城便是这一“伟大思想”的产物。诗人以充满热情的诗句表达了对这座“年轻的城”——这颗“北国的明珠”的爱：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  
我爱你庄严整齐的容颜，  
我爱涅瓦河雄伟的波涛  
和它大理石铺就的两岸。  
我爱你铁栏杆上的花纹，  
爱你的没有月光的夜晚。  
我爱你，俄罗斯的军事重镇，  
我爱你的堡垒巨炮轰鸣。  
……  
巍然矗立吧，彼得的城，  
像俄罗斯一样的屹立不动！

可是，和历史上的大人物彼得一世所想的不一樣，现实中的小人物想的只是一些小事，如个人的生活和安逸，爱情和婚姻。当一场罕见的洪水袭击彼得堡时，小人物叶甫盖尼在想些什么呢？

……叶甫盖尼回到了家，  
脱掉外套、衣服，上床去睡。  
但在胡思乱想的激动中

他很久很久不能够入睡。  
他到底想些什么？他在想，  
他是贫寒的，他必须，他想，  
用辛勤刻苦的劳力才能  
给自己赚得独立和荣光；  
他想，愿上帝给他增加些  
智慧和金钱……

这些事情是他这个小人物经常在想的，还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小人物也在天天想着这些事情。但在此时，叶甫盖尼最关心的还是外面的风和雨会不会停的问题：

他又想，风雨还没有停息，  
河水在高涨，快达到河沿；  
冲走了桥梁，使交通中断，  
他又想，他恐怕同巴拉莎  
两天或三天不能够见面……

巴拉莎是他的未婚妻，一个和他一样贫寒的姑娘，他们在准备结婚，结婚后好过日子。可是洪水在汹涌，淹没了街道，淹没了房屋：

盖着湿布的摊贩的木盘，  
小房子的碎片、木块、屋顶、  
商人囤集的各种什物杂件、  
可怜的穷人的日用家具、  
被雷雨冲坏的桥梁破片、  
冲坏了的坟墓中的棺木，  
都在大街上漂浮……

就连皇宫也“像一座孤岛一样被困在水中”，沙皇也面带惊慌的神色，说道：“沙皇没有办法管辖上帝不可抗拒的力量。”

后来，狂风渐息，暴雨渐停，叶甫盖尼乘船来到对岸，他来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巴拉莎的住处，但她的破旧的房子不知去向，只看见还剩下的一棵柳树。而四周尸体纵横，“就像战场上一样”。可怜的叶甫盖尼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精神有些错乱，他再也不回到自己租住的那间小屋，整天在街上流浪。

夏天就要过去，秋天即将来临，叶甫盖尼还在涅瓦河边流浪。一天晚上，又是大雨倾盆，他被惊醒后四处乱窜，不知不觉来到了参议院广场，面对着骑在马上彼得大帝的铜像，叶甫盖尼不禁浑身发抖：

叶甫盖尼打了一个寒噤，  
心中的思想异常地分明。  
他认出：洪水曾在此奔淌，  
这里汹涌的波涛曾在他的

身边怒不可遏、横冲直撞，  
他认出石狮，认出广场，  
还有那个把他的铜脑袋  
向着黑暗高高昂起的人，  
那个凭自己宿命的意志  
要在海边建立城市的人……  
他在昏暗中是多么地可怕！  
他头脑中有着怎样的思想！  
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力量！  
而那马燃烧着怎样的火焰！  
你要跑向哪里，高傲的马，  
你的蹄子要落到什么地方？  
啊，命运的有力的主宰者！  
你这样高临于这深渊之上，  
紧抖着铁的缰绳，也要让  
俄罗斯把他的前腿高扬？

叶甫盖尼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向黑暗之中的铜像，就是他，竟敢把城市建在这海口浪尖之上，以至于让这么多的无辜的生灵葬身汪洋。

围绕着这个铜像的座台，  
可怕的疯人不断地徘徊，  
他把他怯生的目光投向  
半个世界的统治者的脸上。  
他的心里燃烧起了烈焰，  
他的心里血已经在沸腾，  
他面对着这高傲的铜像  
咬紧了牙，举起了拳头，  
他为凶恶的力量所支配，  
念念有词，浑身在发抖：  
“好，你这奇迹的创造者！  
你等着瞧！……”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奇怪而又可怕的一幕：

……突然间，他飞快地  
转身便跑。他仿佛听见：  
这位威严的沙皇转过脸，  
脸上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而他在空旷的广场上  
拼命奔跑，只听见后面——  
一声巨响——把整个的  
石铺路面震得微微发颤。  
在惨淡无光的月亮下面，

只见青铜骑士伸出长臂，  
骑着快马紧紧把他追赶。  
而可怜的疯人整整一夜  
不管向着什么地方跑去，  
青铜骑士那沉重的马蹄  
总是在他身后紧紧跟随。最后，人们在一个岛上的破屋

前发现了叶甫盖尼冰冷的尸体。

《青铜骑士》是一部十分成熟的作品，它里面包含有极为丰富的深刻乃至复杂的思想。在彼得大帝的“伟大思想”和叶甫盖尼的“胡思乱想”的对照中，普希金歌颂了彼得大帝的历史业绩，同时，也对现实中的小人物抱以同情的态度。别林斯基在分析作品的思想时，很准确地指出了普希金的意图，他说：“体现在青铜骑士中的不是暴虐专横，而是合理的意志……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公战胜了私，虽然不否认对这个私的同情……我们抬头瞻仰这位伟人时，也承认这个铜铸的巨人，为了保证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保证个人的命运。”

上述思想在《青铜骑士》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相当深刻的。普希金在描写历史的选择和个人命运的冲突时，他的态度是明显的，虽说他对叶甫盖尼抱以同情，但他的客观描写中多少也包含有对叶甫盖尼的批判态度。自然，普希金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把历史的选择与个人的命运相统一的方案，不过，他在长诗中已含蓄地暗示出这个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思想的下面，还隐藏着另一思想线索，那就是诗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提出了个人命运与专制政权的冲突的思想，而在这一思想线索上，普希金是站在个人这一边的。历史上的沙皇彼得是伟大的，历史上的彼得堡也是伟大的；然而现实中的沙皇未必个个都伟大，流放普希金的亚历山大一世以及迫害普希金的尼古拉一世，都不能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历史上的彼得堡是雄伟的壮丽的，但现实中的彼得堡并非所有人的天堂，还有不少灾难和痛苦，还有像叶甫盖尼这样命运悲惨的小人物；当普希金描写叶甫盖尼与青铜骑士的冲突时，普希金自然是站在彼得大帝这一面的。可是叶甫盖尼在现实中与沙皇的冲突，就是他与专制政权的冲突，也被普希金或明或暗地放进了他与历史上的沙皇的冲突之中，这同时也是普希金与沙皇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普希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叶甫盖尼。难道不是这样吗？年方二十出头的普希金不也是被亚历山大一世流放到荒蛮的南方，像可怜的叶甫盖尼那样东奔西跑、心乱如麻吗？如今他不是又被尼古拉一世逼迫得几乎走投无路、快要精神失常了吗？

普希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双重的冲突写得虚虚实实、亦明亦暗、亦真亦假，使它们具有一种模糊性。他借叶甫盖尼诅咒青铜骑士来诅咒沙皇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可让人听来却又似乎并不是这么一事情。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叶甫盖尼对铜像所说的话，“是不能全在诗中写出来的”。事实上，尼古拉一世对诗中的反抗王权的思想也有所察觉，他在审查这部长诗时，读到叶甫盖尼诅咒铜像的那一段，气得暴跳如雷，但他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只得把它删掉。

《青铜骑士》在艺术上是相当成熟的。象征的手法和隐喻的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与诗人要表现双重的思想线索的意图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长诗的思想内涵。长诗的语言也十分精彩和灵活，因人物的不同而自然地变化。歌颂彼得大帝的诗行，用词典雅，格调庄严，铿锵有力；描写叶甫盖尼的部分则朴实而又通俗；二者之间的转换也十分自然。

写完《青铜骑士》，普希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散文创作上。而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又在困扰着他，他常常不得不停下笔来，去应付这忙乱的潜伏着各种陷阱的生活。

时序在流逝，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将会看到，生活中的普希金，正如他的长诗《青铜骑士》中那个叶甫盖尼一样，也始终是被那威严可怕的铁骑追赶着，直到坟墓的边沿……

## 第十九章 《上尉的女儿》

1936年，普希金完成了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这部被别林斯基称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整个创作的“压卷之作”。

普希金很早就打算写一部以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小说。由于写作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正面地去描写普加乔夫起义，而只能在有限制的“家庭纪事”的范围内，从一个侧面去展示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去描绘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

尽管如此，普希金在英国作家司各特首创的“家庭纪事”这种形式的框架里，仍然描绘出真实的历史画卷中的一些关键性场面。并且，由于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纠缠在一起，农民领袖的性格从多方面得到表现，从而使小说极富于人情味。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普希金花了很长时间去进行调查研究，他首先研究了与普加乔夫起义有关的档案材料，写出了一部学术著作《普加乔夫史》（后经沙皇尼古拉一世改名为《普加乔夫叛乱史》出版）。然后又参阅了那个时代各方面人物的回忆录，最后还亲自到起义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这样就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是一个以虚构主人公、贵族格里涅夫老年时回忆往事的形式写成的历史小说。青年格里涅夫在普加乔夫运动高潮时期正在奥伦堡省白山炮台任军职。在赴任途中，他遇上暴风雪，幸亏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搭救了他，把他领到附近的一家客店里。为了酬谢这个农民的救命之恩，格里涅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大衣送给了他，农民收下大衣，对格里涅夫说：“我终生不忘您的大恩。”第二天，格里涅夫经由奥伦堡赴白山炮台。这个炮台名义上是一个炮台，其实寒酸得像一个破落的村庄，总共也只是一门大炮。炮台的指挥名义上是米朗诺夫上尉，实际上主事的却是上尉的妻子，“她把公事看成是自己的私事，管理炮台如同管理自己的家务。”上尉有一个女儿，叫玛丽娅，虽不怎么漂亮，但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格里涅夫爱上了上尉的女儿，决定娶她为妻。

这时，普加乔夫从监狱中逃出，他招兵买马，自封为沙皇彼得三世，在攻克附近几个要塞后，向白山炮台进攻。米朗诺夫以身殉职，格里涅夫也被捕。格里涅夫被起义农民带到首领跟前审问，他发现这个首领竟是在暴风雪中遇见的那个农民。首领不忘前言，释放了他。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玛丽娅，又一次被农民起义军抓获，普加乔夫又一次释放了他，并帮他救出了玛丽娅。

从表面上看，小说主要情节是格里涅夫个人的经历和他与白山炮台长官米朗诺夫的女儿玛丽娅的爱情故事。但正是普加乔夫对格里涅夫的爱情和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三次救格里涅夫于危难之中。普希金通过对他们三次交往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展现了这位农民领袖的性格特征。越到后来，普加乔夫的形象越来越鲜明、生动和丰厚，实际上也就成了小说的中心人物。

占据小说的画面中心的是普加乔夫。普希金运用了“递进”描写法一步深入一步地塑造出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

格里涅夫第一次与普加乔夫相遇是赴奥伦堡省任职途中，当时他在

暴风雪中迷路，而普加乔夫正被官兵追捕。普加乔夫以“流浪汉”身份出现，帮助格里涅夫脱险。作家主要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感受来写普加乔夫的。沉着、机智、灵活、热心、质朴是“流浪汉”普加乔夫的主要特点。这次偶然相遇是普加乔夫的“非正式”亮相。虽笔墨不多，但普加乔夫禀赋上的特点却很突出，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他们第二次相遇是格里涅夫作为俘虏与作为声名显赫的起义军领袖的普加乔夫的重逢。普加乔夫认出格里涅夫后立即将其释放，去留自便。这一次相见主要还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所见所感来刻画普加乔夫的性格，在深度上要远远超过第一次。普加乔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冷酷无情。对于反动贵族军官，他毫不留情，“阴郁地蹙蹙眉头，挥挥白手帕”，他就立即被拉上绞刑架。对待部下，普加乔夫十分随和，他虽然自称“皇上”，却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至于连格里涅夫都能发现“他们彼此都以同伴对待，对自己的领袖都不特别恭敬。”对待老百姓，普加乔夫更加爱护，这从人民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当他的马车经过村庄时，老百姓便站在街道两旁向他鞠躬，而他也向两旁致意。

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自己的未婚妻返回白山要塞时，第二次被起义农民抓住，这样，他得以与普加乔夫第三次相见。通过这次相见的描绘，普加乔夫的性格得到多方面的展示。在这个被沙皇政府诬蔑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农民领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彩。当普加乔夫知道格里涅夫是要去要塞救一个受欺侮的孤女时，两眼便闪出光芒，激动地说：“我手下的人哪个敢欺侮孤女，不管他多狡猾，都逃脱不了我的审判。”同时立即同格里涅夫一道去白山要塞，解救了玛丽娅。后来，当普加乔夫知道玛丽娅就是上尉的女儿时，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成全了格里涅夫的婚事。

整部小说表现了普加乔夫自由、叛逆的精神，勇敢豪迈的气概——宁做一只喝活血的老鹰活33年，不愿做一只吃死尸的乌鸦活300年。

除普加乔夫以外，小说还描写许多普通人的生活 and 命运，或者说小说在描写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的同时，还广泛地描写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虽说作者花费的笔墨不多，但这些普通人的形象也都十分鲜明，他们围绕着普加乔夫这个中心人物，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内涵丰富的画面，生动地展示出俄国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页。

格里涅夫从情节线索上看，似乎也算得上一个主角。但从思想线索上看，仍属配角人物。他虽出身贵族之家，但仍属于普通人的行列。普希金在他身上合乎逻辑和极有分寸地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思想道德原则和人道感情。他把兔皮大衣赠与一个流浪汉，并非是在表现他的贵族式的慷慨，而实在是出于同情之心和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仆人的尊重，并非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出自一种真诚的人道感情；他不愿意像另一个贵族军官施瓦布林一样“归顺”普加乔夫，并未考虑他个人与普加乔夫的恩恩怨怨，而是出于他的贵族思想和原则。所以，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普希金的政治理想。在同样的意义上，普希金在上尉米朗诺夫的身上，也表现了这种理想。他为人朴实，文化教养、生活习性都与普通人差不多。他虽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忠于职守，在炮台失守后，他以身殉职。列夫·托尔斯泰对米朗诺夫上尉这个人物评价很高，称他为“真正的勇士”。

上尉的女儿玛丽娅也刻画得十分生动，她貌不惊人，但感情真挚。看起来像个弱女子，但在关键时刻却很有胆量。她宁可死去也不屈从施瓦布林，而在未婚夫有难时，便挺身而出，竟敢亲自去见女皇，请求赦免她的未婚夫。一旦风平浪静，她便安心去作她的“贤妻良母”。她的母亲、上尉的妻子的形象也很丰满，也很有个性。平日里，她包办丈夫的一切，甚至代他管理炮台公务。但当战斗打响，她便马上自然而然地“回归”她本来位置，把丈夫视为炮台的保卫者，并为之竭尽全力。此外，格里涅夫的仆人萨威里奇也很有特点，为了讨回主人的兔皮大衣，他准备同普加乔夫去争斗。为了保护主人不受父母的责备，他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上尉的女儿》就是以这样生动而真实的形象体系描写出俄罗斯人民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出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小说在艺术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对后世作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把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与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上尉的女儿》艺术上总体上的特点。这种写法，据说最早见于18世纪末期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普希金借鉴了这种写法，并对其加以灵活运用，使之达到了新的水平。

普加乔夫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格里涅夫则是一个被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自然，他也不是无中生有的人物，据说在历史上确有一个投靠了普加乔夫的名叫斯万维奇的军官，普希金把他“一分为二”，他的一部分经历给了格里涅夫，另一部分则体现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施瓦布林身上。历史人物和艺术人物走到一起，作家就可自如地安排他们之间的活动和交往，其中便有一种“假亦真来真亦假”的奥妙，这正是普希金的高明之处。

此外，小说的题名与它的实际内容也有一种“相游离”的倾向，其中也有某种奥妙之处，与上述方法都属“同工异曲之妙”。作品名为“上尉的女儿”，但“上尉的女儿”却并非主角，甚至连第二主角也算不上。自然，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里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便是。据说巴尔扎克在动笔之初，是想让书名与人物相统一的，也就是说要把高老头写成主角，但写着写着，作品的重心发生了偏离。而在普希金，情况却不相同：可以说他是有意这么做的，其目的无非是想制造一种烟幕，让人以为他写的是一部爱情小说，而并非在为普加乔夫“树碑立传”。

作品的结构匀称，布局周密，情节单纯、紧凑，语言简洁，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成为后来俄国小说的典范。

从结构和布局看，格里涅夫个人婚姻的线索贯穿全书，除此之外无任何枝蔓，沿着这条线索，先后展开普加乔夫的活动，人物和场景安排得有条不紊，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永远也不曾使人感到有什么多余的地方，或者什么不足的东西；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适得其所。既不能删掉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情节发展迅速，但又不使人感到简略，一切都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发生发展，比如，读者几乎读不到多少格里涅夫和玛丽娅恋爱的情节，但丝毫不会觉得他们的相爱有什么意外的和不可理解的。到第四章，作者就已让格里涅夫和施瓦布林为玛丽娅而决斗了，对此，读者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意外的。莫洛亚说屠格



涅夫的小说的情节发展速度快得“有如奔命”，其实，这一写法屠格涅夫是从他的老师普希金这儿学去的。

这种既简洁又充实的艺术效果显然也取决于作品的语言。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作者，普希金是把“准确、朴素和简洁”等要素放在首位的，这同时也是《上尉的女儿》语言上的特色。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这样写到草原上的天气变化：“……而这时，风越来越大，那朵小云变成白色的浓云，正沉沉地涌起、增多，逐渐布满天空，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而忽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了。风在呼啸，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搅在一起。万物都消失不见了……”这短短一百来字，就写尽一场暴风雪的骤起的过程。这一情景要是换别的作家来写，可能要上千或几千字才能完成。无怪果戈理这样说：“同《上尉的女儿》相比，别人的小说简直都成了一碗油腻的菜汤。”

差不多在创作《上尉的女儿》的同时，普希金还创办了《现代人》杂志。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茹科夫斯基的家是文学家活动的中心，每逢星期六，文学界的朋友们都在这里聚会，或朗读自己的新作，或畅谈文学界的逸事，或交流文化信息。一次，亚·屠格涅夫从巴黎的一封信激发了大家想办一份杂志的念头。在普希金的朋友之间，非常推崇像英国的《季刊》和法国的《历史年鉴》这一类综合性大型期刊。

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向本肯多夫提出创办一份杂志的申请。两周后，申请得到批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出政治专栏。这样，普希金便在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筹备刊物。

1836年4月11日，《现代人》杂志第一期正式出版。这期创刊号上刊登了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作品，还有果戈理的《马车》等。在发刊词《论杂志文学的发展》中提出“生动、新颖和敏锐”的方针。

6月间，《现代人》第二期通过了书刊检查，这一期刊载了普希金关于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的文章、维亚泽姆斯基评论《钦差大臣》的文章和柯尔卓夫的诗篇《收获》。柯尔卓夫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农村诗人，他的诗作有一种清新的生活气息。普希金非常欣赏他的诗才，鼓励他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勤奋写作。柯尔卓夫后来回忆起普希金对他的帮助，总是饱含泪水。这一期上还刊载了署名为费·丘的《寄自德国的诗》，这是当时还不知名的诗人丘特切夫最早的诗作，其中的《春潮》《喷泉》《沉默》和《大自然不像您想象那样……》等诗，后来都成为俄罗斯抒情诗中的精品。据普列特涅夫回忆，普希金当时偶然发现丘特切夫的这些诗作时非常“惊喜”，竟把这些诗稿带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

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开始。不过，他当时所进行的批评工作，基本上还是零星的。现在，他创办了杂志，存了阵地，他的批评活动也就得以全面展开。

批评家普希金的视野是很广泛的，他涉及的还不仅仅限于文学和诗

---

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诗人。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歌，有时候他也关心一些政治问题。如他在《现代人》上发表过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文明及社会制度的文章。而在纪念自由战士拉季舍夫的文章中，普希金是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出现的。至于在有关果戈理、巴拉丁斯基、杰尔维格乃至拜伦、司各特等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中，在有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述中，普希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表现出独到的审美力和历史主义眼光，他的见解，在俄国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有重要位置。

在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时，普希金还注意到青年别林斯基的批评活动，他赞扬别林斯基“有独立见解和机智”，预言这位“杰出的批评家”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还打算在莫斯科与别林斯基会面，可能是要向他约稿。普希金是有远见的，在他逝世以后，正是别林斯基接下《现代人》这份杂志，并把普希金的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使《现代人》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进步文学的战斗堡垒，为俄国革命和文学做出了不朽的功勋。第二十章 丹特士其人

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她以自己的美赢得了普希金的爱，他们俩一位是才子，一位是佳人，仅就这一点而言，确实是天生的一对。要是娜塔丽娅也有诗歌天才，普希金长得更为英俊，那就更加完美了。然而世间的事情总很难是十全十美的，并且造物主也是公平的，他赋予她以美貌，就再不给她以才华；他给她以才华，就不再赐予他以英俊。

不少善良的人都曾怀有过这样的善良的愿望或假设：要是娜塔丽娅不爱虚荣，不热衷于在舞会上炫耀自己的美貌，少给普希金惹麻烦，那普希金也许就不会死于非命；或者普希金不找这样一个妻子，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然而这都只是人们善良愿望而已，事实上在当年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可能的。从普希金的性格和娜塔丽娅的禀赋来看，普希金遇见了娜塔丽娅这样令他动心的美丽的女子而不去追求、更不“非她不娶”，与娜塔丽娅拥有如此的美貌而不频繁出入社交场所、成天呆在家中做“贤妻良母”，几乎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且不说这场悲剧后面种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仅就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结合一事而言，其中简直有一种“宿命”的力量在支配这一切。可不是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只有说是一种“宿命”的力量在“兴风作浪”。

如前所述，就是连地位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也觊觎着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美色。沙皇经常骑马走过小小的宫廷近侍的妻子的窗前，故意打马飞奔，想引起她的注意；而在晚上，在宫廷举办的舞会上，他搂着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柔软的腰肢，柔声地向她发问：“您为何总是拉紧窗帘？”关于沙皇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当时有不少流言，其中有这么一条，意思是沙皇在娜塔丽娅·冈察洛娃面前已不是沙皇，而是一个骑兵少尉。不过，据当年一些人的说法，尼古拉一世也并非那种好色之徒，他不过是喜欢和漂亮女子调情，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又正合他的口味。不过，对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来说，皇上的垂青令她受宠若惊，她甚至也感到骄傲，这符合她的教养和身份，而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她的丈夫会怎么样？大概她是考虑不到这么多的。

如果事情仅仅是目前的这个样子，那也许还不至于惹来更大的麻烦。因为沙皇只不过是要找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寻开心而已，他并非真心爱上了她，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不会也不可能爱上皇上，普希金也不会去找皇上决斗。

可是，一个翩翩少年就要取代沙皇的位置，他站在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面前，向她献上鲜花和他的殷勤。他身材高大，健壮而又英俊，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站在一起，招引着众人的目光。而在舞会上他们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对。这个青年人就是丹特士。

乔治-查理·丹特士，法国人，1812年2月5日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的苏尔兹，比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小几个月。他的父亲是约瑟夫-贡拉男爵。丹特士幼年在莱茵的封丹中学读书，1829年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圣西尔军校，1830年法国革命使他中断了学业。由于他出身于正统的贵族家庭，所以他参加了保皇军团，试图恢复查理十世的帝业。后来丹特士回到老家苏尔兹，但又受不了乡下的寂寞生活。他先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想到普鲁士军队里任职，但他又不愿意从下级军官干起。于是就通过普鲁士国王的介绍到俄国来碰碰运气。在途经德国时，他偶然间结识了一位显贵，这就是当时荷兰驻俄公使冯·盖克恩男爵。盖克恩当时已40多岁，仍过着独身生活，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便充当起他的保护人，后来又把他收为义子。关于盖克恩和丹特士的关系，当年有不少流言，有人说丹特士是这位公使的私生子或侄子，有人说丹特士是查理十世的私生子，还有人说他们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类似同性恋的关系。而据当时人们的观察，这位公使大人从不和任何女性交往，而丹特士却喜欢追逐女性，由此有人推断，在他们之间，丹特士只能是受害者。

自然，上述种种说法还只是流言，并无真凭实据。不过，丹特士英俊潇洒，招人喜爱，特别是招年轻女性的喜爱，却是事实。关于这个法国保皇党军官如何在俄国“如鱼得水”，屠贝茨科伊公爵这样说过：“他生得十分英俊，在女色方面的成功毁了他。他是外国人，所以对待女性十分大胆、十分放肆，胜过我们这些俄罗斯人。在女性的宠爱下，他更是得寸进尺，愈来愈猖狂，简直到了我们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地步。”另一个人则这样写道：“女人对他是你争我夺。”

在这些“你争我夺”的女人当中，有冈察洛娃两姐妹——娜塔丽娅和他的姐姐叶卡捷琳娜。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丹特士追逐的中心集中到这两姐妹特别是娜塔丽娅身上。他们两人，一是最时髦的夫人、舞会上的皇后，一是最受青睐的军官、女人們的宠儿。从丹特士方面讲，能把这个最迷人的女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从娜塔丽娅方面讲，让这个翩翩少年拜到自己的石榴裙下，也是很得意的，何况丹特士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男性。至于叶卡捷琳娜，则常常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她狂热地爱着丹特士，但丹特士的心思则放在她妹妹身上，对她只是敷衍一下，而她心里也清楚，但她又想经常看丹特士，所以人们总看见他们三人在一起。

关于娜塔丽娅和丹特士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们议论得很多的话题之一。如果说，丹特士追求娜塔丽娅，只是出于虚荣心和炫耀自己，而娜塔丽娅与丹特士眉来眼去，也只是为了消遣和解闷，为了弥补一些她

在丈夫那儿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人们谴责他们是不无理由的，而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牵涉到人们崇敬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不过，据后来披露的材料看，娜塔丽娅和丹特士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是那种轻浮和互相玩弄的调情关系，下面的一段话见于丹特士于1836年1月20日写给他的正在国外的养父的信中：

更糟的是，我已堕入情网，难以自拔！是的，我都快要发疯了，不知该怎么办。我不告诉你她是谁，因为信件有可能丢失。你就称她为彼得堡的第一美人儿吧。她叫什么，你能想起来。使我的处境更为发窘的是，她也爱我，但我们又不能经常相见，因为她的丈夫是个醋坛子。亲爱的朋友，我把这一秘密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分担我的忧愁。但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告诉别人，也不要打听我追逐的那人是哪一位，那你就会在无意中毁了她，而我也将无以自慰。因为，为了她，为了叫她高兴，我什么都肯干。

我近来的生活简直如同在受刑。两人相爱，但在四步舞的间隙里又不能挑明，这可真教人难受。……不过，请你放心，我会十分小心的。直到今天，我一直十分谨慎，这个秘密只有她知我知……

如果这些话基本可信的话，那可以认为丹特士是真的爱上娜塔丽娅而堕入情网了，从以上的话中还可以略为知道，娜塔丽娅差不多也是如此，而从丹特士另一封写给他的养父的信中，则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娜塔丽娅的态度。当丹特士要娜塔丽娅作他的情妇时，娜塔丽娅拒绝了：

这个女人，别人都说她头脑简单。但不知是否爱情的力量从中起了作用，反正在那次交谈中，她的谈吐很有分寸，十分优雅，很有头脑。她很难找出什么理由拒绝，因为她要拒绝的男子是喜欢她的，希望她为他做出牺牲。她十分从容地向我介绍了她的处境，并且十分天真地要我原谅。我的确被她说服了，无言以答。你知道她是怎么安慰我的吗？她说：“我爱您胜过任何人，但您永远只能够得到我的心，因为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属于我，我只有尽到作妻子的全部义务才会感到幸福。您可以抱怨我，但也请您一如既往地爱我。我的爱将是对您的报答。”瞧，假如周围没有别人，我真会扑倒在她脚下，吻她的双脚。我要告诉你，从那天起，我对她的爱进一步加深了，但现在情况有变化。我尊敬她，敬仰她，如同人们尊重和敬仰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样。

上两封信的内容看来基本上还是可信的，因为这些都是私人信件中谈及的，一般说来其中不会有其他目的。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丹特士和娜塔丽娅之间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如果把对普希金的敬意暂时放到一边，而单从事情本身来看，他们之间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后来的奥涅金和达吉雅娜差不多，而且娜塔丽娅在上面回答丹特士的一番话，几乎和达吉雅娜后来回答奥涅金的那段有名的诗行相去不远：“我爱你（何必要装假呢？）/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我就要对他一辈子忠诚。”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和同居以前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差不多。换句话说，普希金在这里面充当的便是一个痛苦的角色。

像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这种关系，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司空见

惯、不足为奇。仅从这种关系而言，他们也不应当遭受更多的谴责，何况他们之间还是有爱情的，何况娜塔丽娅还是有所克制的，最后并未把这种关系扩大化。如果普希金仅仅因为丹特士爱上娜塔丽娅而和他决斗，那丹特士也不应受到过多的谴责，因为当年普希金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和许多人如索洛古勃、克鲁斯金、赫比宁都决斗过，其中有的人还是他的朋友。

丹特士之所以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仅只是普希金的“情敌”，而且充当了整个上流社会乃至政府当局迫害普希金的工具；二是他最后成为了置普希金于死地的“杀手”，用诗人丘特切夫的话来说，就是刺杀人们心目中的“王者”的凶手，而不管是谁，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谁充当了这一角色，就不可能被人们饶恕。

现在，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戏也就得要演下去，冲突不断，高潮迭起，不到鱼死网破，戏是不会收场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剧中人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仍在扮演各自的角色。按照古典主义戏剧的套子，最后都差不多是皇权出来解决矛盾，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出现这一结果。可是，在这场悲剧中，皇权却一反常态，它不为真善美撑腰鼓气，却为假丑恶推波助澜。

当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关系公开化后，普希金非常痛苦。一次，维亚泽姆斯基目睹到这样一幅情景：丹特士和娜塔丽娅、叶卡捷琳娜在大街上散步，碰巧被普希金撞见，维亚泽姆斯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当时，普希金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犹如一阵风，马上消失在人群中去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的面部表情十分吓人。我当时就预感到要出事。”

如果丹特士追求的不是娜塔丽娅，或者如果娜塔丽娅的丈夫不是普希金，那事情也许不会发展成后来的样子；可是问题正出在这里，这个美人儿的丈夫正是政府当局和上层人士都不喜欢的普希金。盖克恩在国外接到义子丹特士告知他和娜塔丽娅的关系的信时，还告诫丹特士要小心行事；可是等到他回到彼得堡后，他反而为丹特士出谋划策，原因就是普希金是外交大臣的仇人，而他是外交大臣的朋友，所以普希金也就是他的仇人，而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普希金搞臭，让他抬不起头来。持有这样的想法的大有人在，包括最高当局在内。由此可见，情场上的角逐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迫害了，普希金面对的已不是丹特士一人，而是整个他曾经用他自由和战斗的诗歌抨击过的上流社会。

于是冲突也就愈演愈烈了：

10月间，丹特士患病，这场追逐本可以平息一阵子的，不料老盖克恩却亲自出马，顶替义子的角色。他追着娜塔丽娅，不断地在她耳边灌输他的义子如何如何爱着她之类的话，甚至还说，要是娜塔丽娅长久不答应丹特士的要求，那他可能会自杀。据说在一次舞会上，盖克恩还向娜塔丽娅出了这样一个鬼点子，要她离开普希金，和丹特士私奔到国外去，被娜塔丽娅拒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娜塔丽娅也开始有些害怕了。

然而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着、恶化着：

1836年11月4日，普希金收到一封用法文写的匿名信：

荣誉勋章协会，尊贵的绿帽子和骑士勋章协会，在其会长 S.E.D.L. 大勋章获得者纳雷什金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任命亚历山大·普希金为该协会副会长和勋章历史编纂家。

终身秘书长 鲍尔奇

同一天，普希金的一些朋友也收到了同一内容的匿名信。仅就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言，并未牵涉到丹特士。信中所说的纳雷什金的妻子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把普希金列入这个名单则是暗示娜塔丽娅和沙皇尼古拉有某种暧昧关系。但普希金下意识地意识到，这封信是盖克恩所为。据维亚泽姆斯基称：“一收到匿名信，普希金就认为盖克恩是匿名信的作者。直到咽气时，他都一直这么认为。”不过，从后来查明的情况看，普希金的直觉基本上还是对的，匿名信虽不是盖克恩亲笔所写，但却是他们一伙所为。1927年6月，也就是说在诗人逝世90年后，这封匿名信经鉴定是盖克恩的同伙弗·多尔戈鲁夫伯爵所写。

普希金接到匿名信后，愤怒异常。他把娜塔丽娅叫出来，把匿名信交给她，娜塔丽娅脸色苍白，吞吞吐吐，不敢承认她与丹特士的关系。而普希金则忍无可忍，在第二天就下书提出和丹特士决斗。

当盖克恩得知普希金要和丹特士决斗的消息，又害怕起来，他知道普希金是一位决斗高手，生怕他的义子死于普希金的枪下。他赶到普希金家中，请求延缓决斗时间。普希金看到他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禁起了怜悯之心，答应延缓两周的时间。此后，在盖克恩的奔走下，在忠厚善良的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调停下，事情出现了某种转机。

丹特士年轻气盛，面对着普希金的挑战，本来是非应战不可的，但在盖克恩的规劝、威胁和利诱下，终于作出了让步，转了一个弯子。他向外界承认，他并非是追求娜塔丽娅，而是爱她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并且在公开场合中与叶卡捷琳娜表示亲热，同时还正式向她求婚。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那就很有意思，丹特士就成了普希金的“连襟”，也就是说他们成了一家人了，那决斗的事便可迎刃而解了。

1837年，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按照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双重仪式举行了婚礼。普希金没有出席婚礼，而是让娜塔丽娅代表他出席。这样，决斗的事便不了了之。

从表面上看，在这个回合中，普希金多少也算占了一点上风，挽回了一点面子。但丹特士的贼心不死，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第二十一章 诗人之死

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冈察洛娃结婚后，试图与普希金和好；但普希金的态度很清楚：不与他打任何交道。丹特士在盖克恩的建议下，先后给普希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普希金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前收到的，他对信不屑一看，就把它撕得粉碎，并对当时在场的盖克恩说，他和丹特士没有任何关系。后来，丹特士上门来作婚后的拜访，普希金拒而不见。于是，丹特士又给普希金写了第二封信。普希金这次没有把信撕掉，而是想把信通过别人退给丹特士，却不料在朋友家中遇见盖克恩，

据当年在场的人回忆，普希金走到盖克恩跟前，从口袋里拿出信，请他退给写信人，但盖克恩回答，这信不是写给他的，他不能接受。此时，普希金勃然大怒，把信向盖克恩的脸上掷去，喊道：“你拿去吧，无赖。”

盖克恩之所以几次三番要丹特士忍让，是因为他心中有鬼，他虽然不是匿名信的书写者，但他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他自己心中是清楚的。他生怕万一这件事被查出来，名声不好，会影响他的仕途的。可丹特士少年气盛，本来就不情愿忍让，现在养父遭到如此侮辱，不禁怒火冲天。于是他便开始变本加厉地报复普希金。

这以后丹特士变得十分猖狂，不论是在舞会上，还是在剧场，只要娜塔丽娅一露面，丹特士便围着她转来转去，而把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晾在一边。这样，局面又仿佛回到了丹特士结婚以前。娜塔丽娅是这样一个人，当惹出麻烦的时候，她便向丈夫发誓，不再理睬丹特士。可事情一过，她又经不住丹特士的甜言蜜语，于是又像从前一样和丹特士说笑玩乐，况且她还会这么想，反正丹特士还是她的姐夫，和自己的姐夫说说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而丹特士也就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公开地挑逗起娜塔丽娅。一次，丹特士以修脚医生为话题用法语对娜塔丽娅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您的鸡眼比我妻子的漂亮。”这是一句双关语，在法语中“鸡眼”和“肉体”是谐音，所以这句话是挑逗性的和侮辱性的。娜塔丽娅当时脸色发白，不知所措。普希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气愤不已。

更有甚者，丹特士还设下圈套，诱骗娜塔丽娅与他幽会。事情是这样的：1837年1月25日，娜塔丽娅收到她的一位女友波列季卡的信，请娜塔丽娅马上到她家里去一趟。这个波列季卡对普希金不满，因为他拒绝过她的要求，所以她也想使普希金出丑，便充当起“皮条客”来。当娜塔丽娅到她家后，发现丹特士也在那里，知道中了圈套。而此时波列季卡却趁机溜走，让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独处。丹特士跪在娜塔丽娅面前，请求她答应他和他一道私奔到国外去。丹特士甚至还拿出手枪，威胁娜塔丽娅，说要是她不答应，他就在她面前自杀，娜塔丽娅吓得直叫。叫声惊动了波列季卡的女儿，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便一头闯了进去，这样，娜塔丽娅才趁机脱身而逃。

看来这一切都是预谋。当晚普希金便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称他的妻子在一朋友家与丹特士幽会，他已戴上绿帽子无疑。于是普希金就盘问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惊魂未定，把一切和盘托出，并委屈地倒在丈夫肩上大哭一场。此时，普希金怒火中烧，浑身发抖。他挥笔疾书，向盖克恩下了战书。这封信措辞猛烈，让盖克恩无退路可言，而此时，盖克恩也不想后退。普希金是冲着他来的，自然，他不会与普希金去决斗，他的义子丹特士将会上阵。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便不可避免了。

当局自然知道决斗一事。而且在决斗前夜，盖克恩一伙人还找过警察头子本肯多夫，请求他不要插手此事。本肯多夫接受了盖克恩一伙的建议。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要是普希金被打死，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政府就少了一个用自由思想来蛊惑人心的敌人；要是他没有被打死，那当局也可以对他绳之以法，把他治罪，或流放，或监禁。这就是政府方面对待这次决斗的态度。

1837年1月27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在彼得堡郊外的黑河边的雪地

上，普希金和丹特士举行了决斗。普希金的助手是他的皇村中学的同学、工程兵中校丹扎斯，丹特士的助手是法国驻俄大使馆随员达尔沙克子爵。按照决斗的规则：决斗双方的距离是 20 步，射击前双方的界桩离他们各 5 步，也就是说两个界桩相距有 10 步。决斗的信号一响，双方就可以相向而行，这时双方随时都可以开枪。如双方都未击中对方，则从头再来一次。这一决斗的规则是非常苛刻的，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凶多吉少。

双方助手把普希金和丹特士各领到离各自的界桩 5 步远的地方，并把手枪交给他们，助手就退下，此时，决斗的双方方便相向而立，等待决斗开始的信号。

丹扎斯把帽子一挥，宣布决斗开始。只见他们俩人都向界桩走去：普希金动作快捷，很快地就跑到临界线处，而丹特士略慢一些，离临界限还有一步之遥，他见普希金先行到达，便未等到达界线处就开了枪……

枪声响了……普希金摇晃了一下，倒了下去……他喃喃自语：“我觉得我的股骨被打碎了。”

两位助手向他奔去，丹特士也想向他走来，但普希金的神志很清楚，他制止丹特士，吃力地说：“等一等，我还有力气开枪。”

此时，丹特士面对着倒地的普希金，站在临界线处，用右手护住胸膛，等普希金开枪。

普希金倒下去的时候，枪掉在雪地上，这时丹扎斯递给他另一只手枪。普希金接过枪，用左手微撑起身子，瞄准丹特士……随着一声枪响，丹特士应声倒在雪地……普希金问丹特士伤在哪里，丹特士回答：“我想是伤在胸部。”普希金说了声：“太好了！”就把手枪扔到一边……

其实，普希金并非像他当时的感觉那样伤在右腿，而是伤在右腹，而且伤势很重。而丹特士也并非伤在胸部，他是侧身而站，子弹只从胸部擦过，打在手上。

两辆雪橇拉着两个受伤的决斗者向城里驶去，普希金在前，丹特士在后。路上遇见盖克恩派来的马车，丹特士和他的助手建议用马车把普希金拉回家，丹扎斯同意了，但他没有向普希金说明马车是盖克恩派来的，因为那样，普希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普希金就被抬上了马车。

普希金被家人安置在他的书房，他的伤势很重。他不愿意让娜塔丽娅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便叫她走开，不让她呆在他的身边。当天晚上，伤势进一步恶化，普希金疼痛难忍，甚至想开枪自杀。他叫仆人把抽屉里的手枪拿给他，仆人拿枪时预先告诉了丹扎斯，于是丹扎斯便过来把枪取走了。

第二天，即 1 月 28 日，早晨，普希金的伤痛有些减轻，他让人把娜塔丽娅和孩子们以及妻姐亚力山德拉叫进书房，和她们一一告别。娜塔丽娅一头扑到丈夫身上，握紧他苍白的手，她已是蓬头垢面，满脸倦容，悲痛欲绝。而孩子们也是睡眼惺忪，他们还太小，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午，医生让普希金服了几滴鸦片，普希金的感觉好了一些。

来看望普希金的人络绎不绝，一些好友像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亚·伊·屠格涅夫等人在普希金离开人世之前，几乎都没有离开过



诗人的家。而在大门口已是人山人海，大家都非常关心诗人的伤势，以至于连普希金家里的仆人都有些不解，到底他们的主人是何等伟大的人物，竟有这样多的人前来关注他的伤情。一个老人惊讶地说道：“天啊！我记得库图佐夫元帅逝世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1月29日早晨，普希金的病情越来越糟，医生们都说没有希望了，彼得堡最著名的阿连德医生则宣布病人活不过两小时。普希金吩咐，叫娜塔丽娅进来，他很平静地对她说：“我死后，你就住到乡下去吧！设法让他们忘掉你。你为我守孝两年后就改嫁吧，但要嫁个体面的男人。”中午时分，普希金突然提出要吃草莓，丹扎斯找来草莓，普希金要娜塔丽娅喂他吃，普希金吃得很有味，每吃一口就说：“真好吃。”

下午2时45分，当娜塔丽娅刚离开书房时，普希金就出现了临死的症状，他用逐渐无光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他的书柜，轻声地但清晰地说道：“别了，别了。”接着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正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娜塔丽娅回到了书房……她见丈夫死去，立刻扑向他，跪在他的床前，她一边推着普希金的身子，一边号啕大哭：“普希金，普希金，你还活着吗？”然而此时普希金再也不能回答她了……这时，大夫进来了，娜塔丽娅抓住大夫的手，大声喊道：“是我杀死了丈夫！我对他的死应当负责。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灵魂和我的良心都是纯洁的。”

诗人死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

朋友们为普希金洗身沐浴，梳头，换衣，为他穿上了那件代表着“幸福”的燕尾服，这是7年前他向娜塔丽娅求婚时所穿的衣服，现在要永远随他而去了。朋友们打开诗人的钱包，里面仅有75个卢布，大家把这75个卢布分掉，留作永久的纪念。

普希金的遗体停放在他家的前厅里，前来凭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多半是平民百姓，并不认识普希金，但都知道普希金的名字，或读过他的诗篇。此刻，这些陌生的人在哭泣，在呐喊。有人在高叫，要杀死凶手丹特士；有人则呼喊，要处死“笨蛋外科医生”。一位老者在普希金的棺木前失声痛哭，维亚泽姆斯基问他：“看来您一定认识普希金了？”老者回答道：“我不认识普希金，但我是俄国人。”

1月30日，普希金的遗体被移往御马厩街教堂。第二天，在这里举行安魂祭。由于前来参加仪式的人太多，不得不采取凭入场证才可进入教堂的办法，但教堂里还是人山人海，连街上都挤满了人。用一位当时在场者的话来说，整个彼得堡都出席了这个仪式。

1837年2月4日凌晨，普希金的灵柩在宪警的押送下被运往米哈依洛夫斯克村附近的圣山，2月6日在圣山修道院下葬。

上流社会对普希金的死无动于衷，相反，却对丹特士的伤情关怀备至。当局力图淡化诗人的死，却又没料到普希金的逝世引来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警察机关下令禁止发表任何悼念普希金的文章，销毁新印刷的普希金的画像，但这仍阻挡不了人民悼念诗人的浪潮。书店里，普希金的作品被抢购一空，当局乃至沙皇本人还通过各种方式收到不少匿名信，要他们“尊重人民的意志”。就在这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诗歌手抄本，它字字带血，句句含泪，每一个字母都如同一颗愤怒的子弹，射向那“蜂拥在宝座前贪婪的一群”：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子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蹂躏了  
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迹踪！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  
公证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

……

但还有神的裁判啊，荒淫无耻的嬖人！  
严厉的裁判者等着你们；  
他决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  
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径。  
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  
那鬼蜮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  
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黑的血  
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这就是普希金的继承者、诗人莱蒙托夫悼念普希金的著名的《诗人之死》中的诗句，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那“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杀死了普希金！杀人凶手即使在人世间逃避了惩罚，但天上的法庭却不会轻饶他们。莱蒙托夫的诗篇表达了人民的心声，给迫害普希金的专制政权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也激怒了统治者，使他们有一种“普希金又出现了”的恐惧感觉。像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也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俄罗斯的南方，但他的诗歌却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在数以万计的悼念普希金的诗篇里，还有一位诗人的诗作永远被人们所铭记，那就是丘特切夫的《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诗中有两行不朽的诗句，永远伴随着普希金的姓名，流传在俄罗斯和世界人民中间：

就像铭记自己的初恋一样，  
俄罗斯心中不会把你遗忘。

## 第二十二章 “我不会完全死去”

诗人死了，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不会完全死去”，他的诗歌将战胜腐朽而永远长存。

从1838年开始，经过茹科夫斯基删节过的普希金全集开始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40年代，别林斯基在一系列论著中全面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确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别林斯基断言，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他指出：“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跳动。这已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人认识俄国了。”别林斯基的论断，得到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普遍认同。还是在普希金在世时，俄国诗歌中便有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的流派即“普希金流派”出现，普希金逝世后，这一流派即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系列俄国大作家诸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都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老师，把自己归属于普希金的旗帜之下。

与此同时，普希金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崇高的位置是以往任何作家或诗人不曾有过的。而且，随着莫斯科普希金铜像的兴建以及普希金广场的命名，普希金在人民中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880年，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的揭幕典礼，数以万计的人拥向铜像坐落的普希金广场，参加这个盛典。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屠格涅夫指出：“普希金，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的第一位诗人——艺术家。他独自完成在别的国度要花费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分开完成的两件工作：建立语言和创造文学。……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此后，矗立着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广场便成为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圣地，每当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涌向普希金广场，聚集在诗人的塑像旁边，仿佛是要向自己的诗人寻求精神力量；而每当到了诗人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人们又会不约而同地自觉自愿地前来给诗人献上鲜花，这就是本书前面的序言中所介绍的情景。

西欧读者在普希金在世时就对他有所认识，当普希金还只有23岁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全书》上就出现过普希金的名字。1837年，波兰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友人密茨凯维奇在悼念诗人的文章《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运动》中向东欧读者介绍了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在西欧的传播，则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由于长期侨居在西欧的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学生屠格涅夫的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作品获得了西欧读者的赞赏，并在西欧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据屠格涅夫回忆，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曾当着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把普希金称为自己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则几乎被译成欧美各种文字。

我国读者第一次见到普希金的名字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俄国亦

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即普希金——笔者，下同）者，尤为名震一时。”而普希金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则是在1903年：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从日文转译为中文，书名为《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马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

1907年，鲁迅在他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和评述了普希金，文中称：“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独立。”“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分析俄国文学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时，着重谈到普希金的名诗《自由颂》。1827年，瞿秋白和蒋光慈在他们合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对普希金及其作品则有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瞿秋白后来还亲自翻译了普希金的长诗《茨冈》。

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我国首次集中介绍了普希金的作品，上海文化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两个纪念集：一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一是上海光明书店出版的《普式庚创作集》。

与此同时，在全世界都在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周年时，上海人民还建造了一座普希金的纪念碑，在纪念碑的石座托着一尊普希金的青铜塑像，面向北方——普希金的祖国俄罗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纪念碑毁于日寇的魔掌之下。抗日战争胜利两年后，即1947年，在纪念诗人逝世110周年的时候，上海人民又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纪念碑。

1949年以后，普希金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系统的介绍，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都由俄文译成了中文，并且，对普希金的研究也有了初步的进展。同时，普希金的诗作也被选进了中学课本。

十年“浩劫”中，普希金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一度中断。非但如此，普希金被“四人帮”列入“封资修”加以批判。就连坐落在上海街头的普希金纪念碑也像当年毁于日寇之手一样毁于“四人帮”之手，一切反人民的势力都害怕代表着自由和光明的普希金。普希金纪念碑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中国人民命运兴衰的晴雨表，这是意味深长的。

“文化大革命”后，对普希金的介绍和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普希金的作品大量地出版，光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有七八个译本之多，而首次介绍到我国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已有十多个译本，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已数不清究竟有多少种译文了。同时，不少出版社还出版了各种版本普希金的选集，还有两部普希金的全集也即将出版。普希金的作品成为我国读者精神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书的是，毁于十年“浩劫”中的上海普希金纪念碑，也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1987年重新修建。在绿树成荫的上海街头，在那高高的纪念碑石基上，普希金注视着正在为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的中国人民。

